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出版说明

这是一套在国外畅销多年而不衰的漫画系列丛书，由作者与读者出版公司出版，其原名为“文献幽默入门者丛书”。这套丛书经过出版社二十多年的精心策划和制作，终成今日的规模：有近百本图书，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社会学、艺术、文学、音乐等学科，还涉及了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我们之所以将这套漫画定名为“西方文化漫画集成”，也正是因为它在内容上涵盖了西方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其中个别图书虽然是以东方文化或东西方文化共通的内容为主题，但由于它们也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视域和思想进行的观察，故而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所以，“西方文化漫画集成”这一名称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反映了这套书最主要的内容。

这套丛书采用漫画形式，把丰富的知识和严肃的主题融入轻松诙谐的文字和图画中，图文并茂，风格独特。以漫画的形式详尽介绍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在我国尚属首次。正如当初蔡志忠先生以漫画形式介绍中国文化一样。但蔡志忠先生的漫画反映的毕竟只是华夏子孙一脉相传的传统文化之精华，而这套漫画集成既有西方人眼中的西方文化，也有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视野宽广独特。

这套丛书多由专业人士撰写和绘制，其中许多作者都是该专业领域的专家或资深人士（例如，《联合国入门》就是由前联合国记者协会主席伊恩·威廉姆斯撰写的）。因此，这套丛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学术价值。这大概也是它在国外多年畅销不衰的原因之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套漫画集成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的生活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观。为了使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丛书看到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和西方人的精神境界，我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了原书的风貌，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时会进行正确的比较和鉴别，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分析和认识那些不同的东西，甚至是我们不赞赏的东西，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增强自己的分析和辨别能力。

经作者与读者出版公司授权，东方出版社享有本套丛书的唯一合法全球中文版版权。

目　录

简介……1
诺姆是谁？……2
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过这位“活着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3
乔姆斯基的两段经历……7

乔姆斯基的档案：一个简明传记……9
在压抑下成长……10
纽约叔叔的小报亭……12
大学辍学……15
在以色列农庄……17
反越战讲演……19

巨人的肩膀：乔姆斯基思想的先驱……22
柏拉图……22
勒奈·笛卡尔……23
让·雅克·卢梭……28
威尔海姆·冯·洪堡特……31
卡尔·马克思……33
乔治·奥威尔……36
无政府主义的传统……42
泽林·哈里斯……42
附注……44

语言学……45
什么是语言学……45
语言学的演进……46
作为科学的语言学……51
普遍性的生成语法……54
生成语法之内在性的证据……55
语法是可以习得的吗？……58

语言的无限多变性 ……61
什么是源初状态的本质? ……63
乔姆斯基论斯金纳和行为主义 ……65

谐谑:乔姆斯基和媒体:你能相信你所看到和听到的吗? ……69

必要的幻象:宣传的科学 ……70
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功能是什么? ……71
控制性赞同 ……74
瓦尔特·李普曼 ……75
莱因赫尔德·尼布尔 ……76
乔姆斯基观点提要 ……77
宣传的标靶 ……78
民主的威胁 ……80
“媒体所有权怎样决定内容”?——宣传的模式 ……82
过滤层 1:金钱——“有权势之人的媒介” ……83
过滤层 2 :广告——广告怎样扭曲新闻 ……87
过滤层 3:“专家”——他们为谁工作以及为什么同样人物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91
过滤层 4:“传声筒”——谁写了这些给编辑的信? ……94
过滤层 5:反共产主义——创造一个恶魔 ……96
简洁:零敲碎打怎样被用来扼杀相反的观点 ……97
控制住羊群,使它们规规矩矩 ……98
不要简单地接受乔姆斯基的话——要亲自检验 ……99
他们隐瞒的是什么? ……101

乔姆斯基论政治 ……103

乔姆斯基关于新闻检查者的第一手经验 ……103
新闻为什么不计算 ……105
无阶级社会的神话 ……106
自由市场制度的神话 ……110
为富人谋福利——它是怎样运作的 ……112
蝶螈叔叔的双重标准 ……116

"国家防卫是一个病态的笑话"……117
殖民主义的过去和现在……118
对外政策:友善的独裁者和顾主的国家……120
真正的新世界秩序——它是怎样开始的……121
新世界秩序的真正目标……122
"公司的利益"还是"美国的利益"……124
历史——他们忘记告诉你的二三事……127
自食其果……137

乔姆斯基论反击:个人能做些什么?……139
承担责任——个人能做些什么?……139
思想自卫……140
知识和信息……140

诺姆·乔姆斯基访谈录……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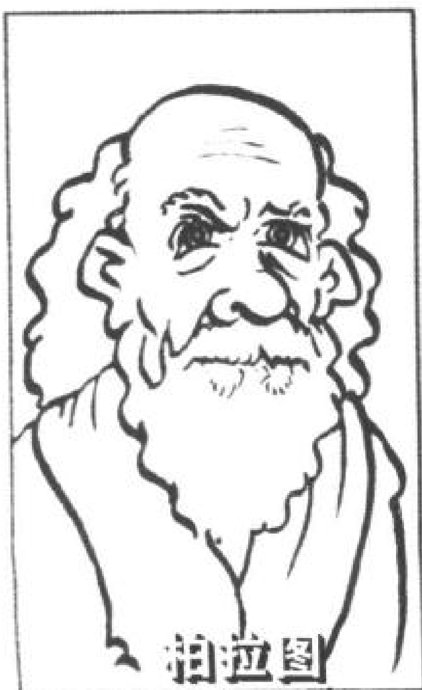
简　　介

诺姆·乔姆斯基是所有时代中被引用最多的十位作家之一。



《芝加哥论坛报》称乔姆斯基教授为**“被引用最多的活着的作家”**，并且在所有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中，乔姆斯基排位第八，仅次于柏拉图和弗洛伊德。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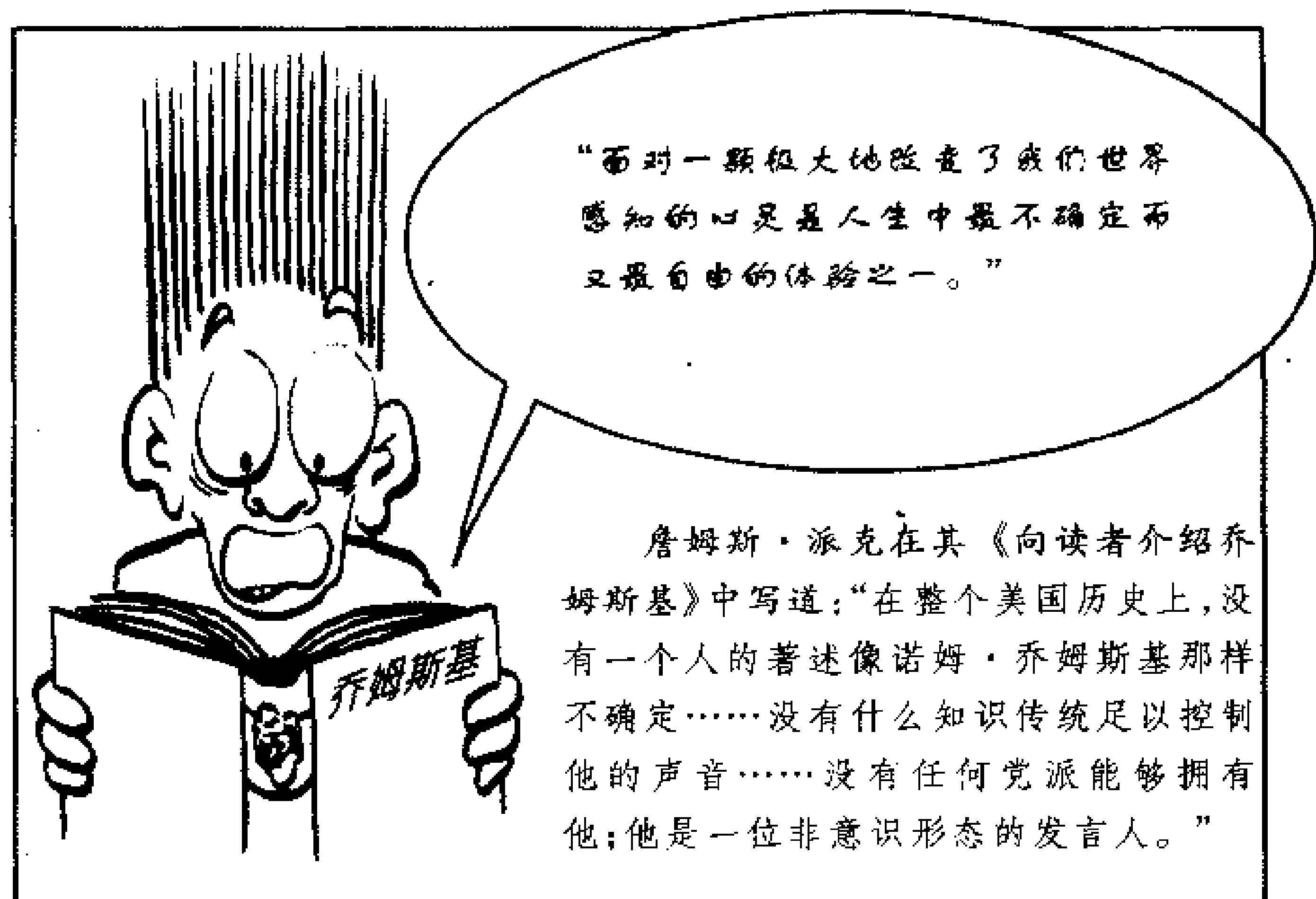


7



8





美国报纸的先驱《纽约时报》称诺姆·乔姆斯基为**“无可辩驳的活着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诺姆是谁？

直到90年代，这种观点仍然是有关**诺姆·乔姆斯基**这个名字的最流行的反应：一个儒雅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

（或许你会感到不解，为什么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从未听说过某个如此“出名”的人？这就是那种基本的瑜珈－贝拉主义——他是那样有名，有名到谁也没有听说过他吗？）



你没有听说过诺姆·乔姆斯基的原因在于那些拥有大众传媒的先生们不想让你知道他（顺例来说，这就实际证明着诺姆的理论：传媒操纵/扭曲/控制着信息以使信息适应自己）。

如果有更多的人以开放的心灵来倾听乔姆斯基关于大公司操纵着国家、世界、政党和大众传媒……以及为什么的言论，那我们被灌输的关于美国的华而不实的幻想会如同皇帝的新衣那样烟消云散。





关于乔姆斯基的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是他使我们感到聪明。尽管美国政府总是对我们撒谎并愚弄我们,但媒体对他们的谎言鹦鹉学舌,甚至我们中间最天真的人也知道我们并没有被给予"真相,毫无保留的真相"。虽然我们并不一定完全理解,但我们可以直觉地抓住乔姆斯基观点由以构成的最基本原则。虽然我们可能并不理解控制我们生活的那些系统的精微之处,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至少已部分地注意到了几条重要的真理:



我们的政府常常对我们撒谎。

我们的政府为一些人的需要服务，对其他人的需要则置之不理。

我们的经济系统是被暗中操纵的。

考虑到影响多数人的主要因素，主要政党其实是一丘之貉。





新闻媒体并不对政治事件提供一个完整的、公正的图像。

虽然美国被称为一个民主社会，但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却被关在我们自己国家决策过程的任何有意义的参与之外。

总而言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媒体，无视多数人的需要，只为富人的需要服务。

事情似乎正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注：以上观点并不是乔姆斯基本人的原话，也不是对乔姆斯基原话的缩写——它们是本书作者的演绎。



诺姆·乔姆斯基创制了一个观念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帮助我们理清我们的直觉和失误——从而知道什么是正当的，什么不是 因为乔姆斯基的政治观点与大众传媒的目的是正相反的，而对于那些拥有大众传媒的富人来说，他的观点正好与主流观点之间是相互抵触的（“毕竟，这些机构不会自我解体。”他说 ）

这本漫画性的资料书试图把乔姆斯基的观点呈现在那些对他还不了解的人面前。这部书并不打算对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作简介，而只是作一个一般性的介绍，来回答“谁”是乔姆斯基，并激发那些还不熟悉他的观点的人自己去探索乔姆斯基提出的那些最紧迫的问题。



对于那些完全不了解诺姆·乔姆斯基的人，让我们这样来开始介绍他：乔姆斯基被世人知道是因为他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工作。最初他闻名于世是因为他的语言学，即对语言自身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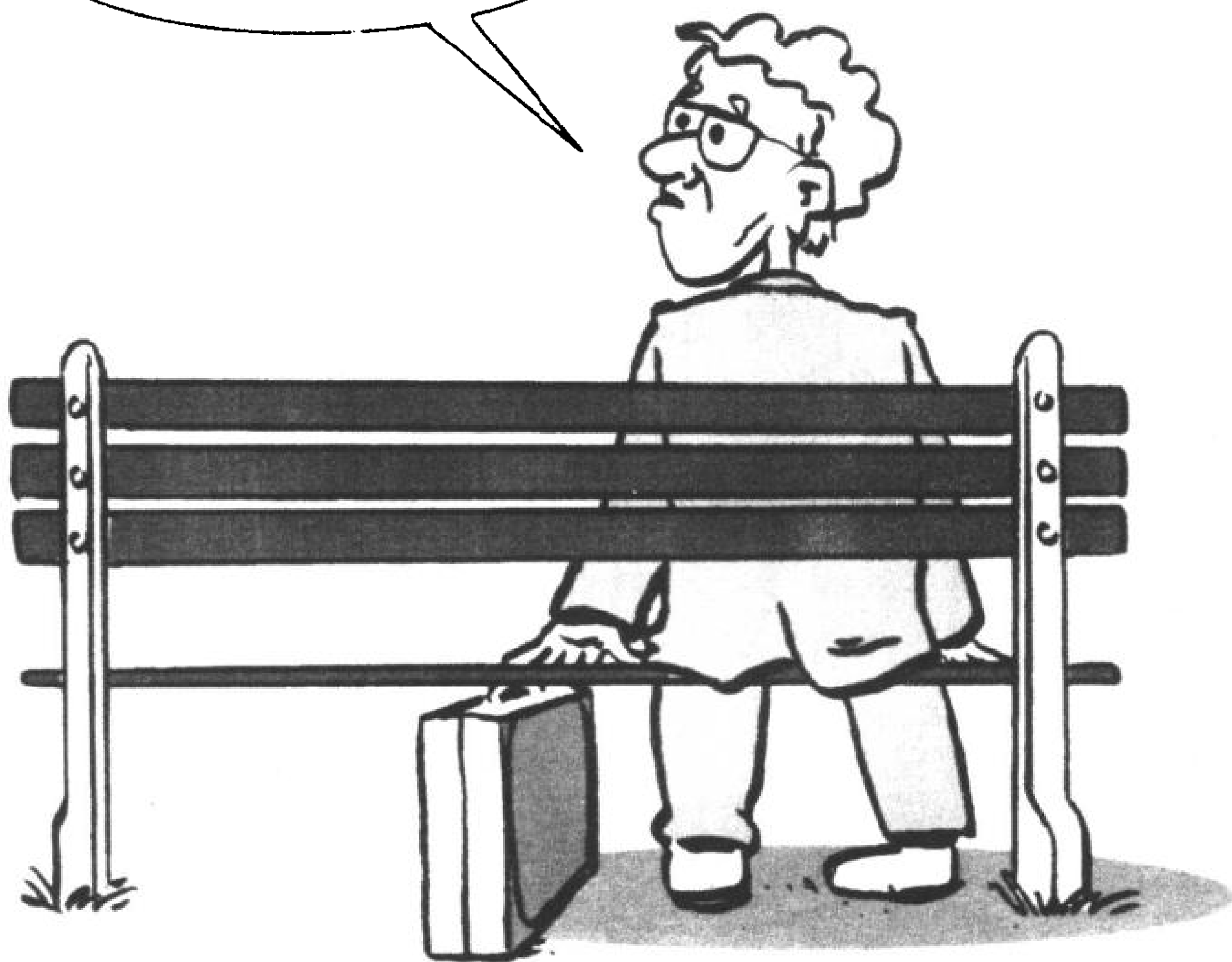
乔姆斯基的第二段生涯则是作为政治和社会分析家、批评家，这段时期很难定义。那是早在他卷入语言学之前就有的一种激情，也是他写出的大多数著作所关注的东西。但是如果乔姆斯基不是建立起了作为科学家的如此独特的名声，他的政治观点在主流派那里就可能更难听到了。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观点因其影响而广为传播，并逐渐渗透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但是他作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以及作为一个"媒体批评家"的工作，则给那些关心民主制度的存亡、保护人权和自由、以及环境保护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这方面的工作与普通民众紧密相关。乔姆斯基并不是你可以抛在教室里的哲学家，他帮助你过你自己的生活。



别担心——乔姆斯基的著作并不难读。

乔姆斯基给人上升到天才的共同感觉。





首先，有一个小背景：诺姆·乔姆斯基怎样成为所有时代中被引用最多的十位作家之一，成为“无可争辩的活着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好了，理由有许多，其中之一是，他是一位大学辍学者……

乔姆斯基的档案：一个简明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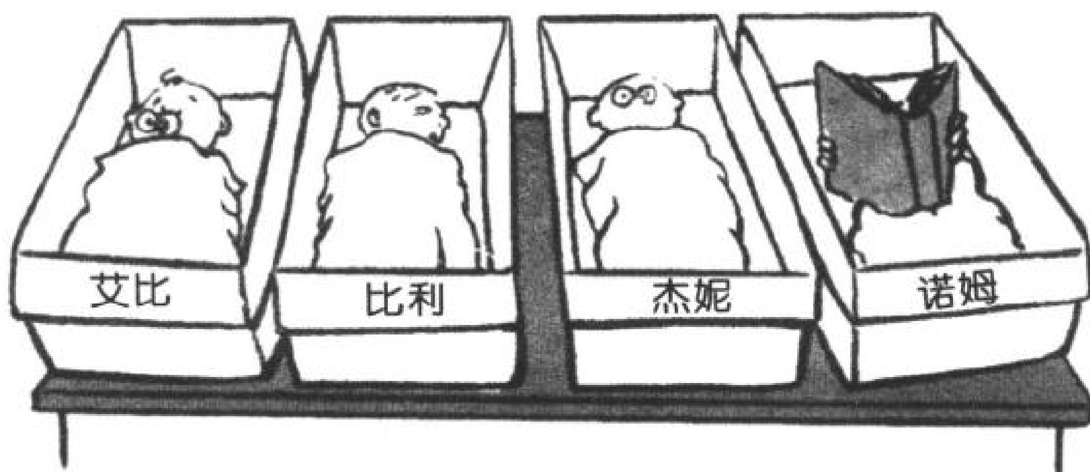


乔姆斯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我坚决反对制造公众人格，使某些人成为明星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想法。”他说。人格崇拜总是把人们诱离真相。媒体对这种公众人格总是大加使用，以致“时代气氛”也几乎全部被闲谈、邪恶的暴力犯罪或者体育所统治。这里面很少有建设性的信息给你，包括你们的政府正在做的大部分工作。

虽然乔姆斯基本人认为他的生活的传记性细节可能把人们诱离他想讨论的真正话题，但人们还是好奇于他那些了不起的观点的起源。

因此，我们将对此做一个扫描，但不会为此花费太多的笔墨。





阿维纳姆·诺姆·乔姆斯基 1928 年 12 月 7 日降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这个家庭中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乔姆斯基是大萧条时代的儿童，这次大萧条始于 1929 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一直持续到上次世界大战。乔姆斯基家得以度过大萧条的最困难时期，是因为他的父母都有工作。这次危机的影响相当深广，乔姆斯基自己说，他的最早的记忆是大萧条的景象：人们在家门口卖破衣服，警察粗暴地冲散罢工队伍等等。



他的父母都做着希伯来语教师的工作。父亲威廉姆·乔姆斯基是一位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是《希伯来语，永恒的语言》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是 1958 年出版的，在关于希伯来语的最为流行的著作中，这本书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家庭深深地卷入了犹太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及希伯来语的复活之中。

从 2 岁至 12 岁，乔姆斯基就读于一个实验学校，这个学校没有年级，没有诸如竞争、做“好学生”这样的事情。

他的家庭是极端反犹太人的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邻里环境中的唯一一家犹太家庭，这里的人公开支持纳粹，直到美国介入二次世界大战。乔姆斯基在整个30年代面对着街头的反犹主义并深受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影响。



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为学校的报纸编写的关于巴塞罗那沦陷的文章。12岁时，他就写出了一个西班牙内战史。



小报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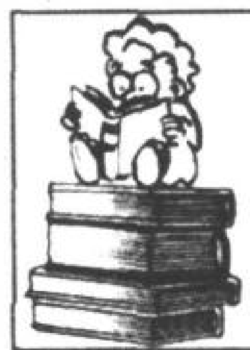


他常访问住在纽约市的一位叔叔，这位叔叔在72街和百老汇相交的地铁出口开有一个小报亭。乔姆斯基自己说这位叔叔是个驼背，并有“犯罪和左翼政治”的背景。由于没有技能，他就开了个小报亭。小报亭的位置不好，所以生意也很清淡。但到30年代后期，它成了欧洲难民的聚集场所，年轻的乔姆斯基在这里花费了许多时间，参与到那些有关时事的生动讨论之中。乔姆斯基说，他正是在小报亭接受了他的政治教育。他的叔叔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非常精通，乔姆斯基在少年时代即显现出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广泛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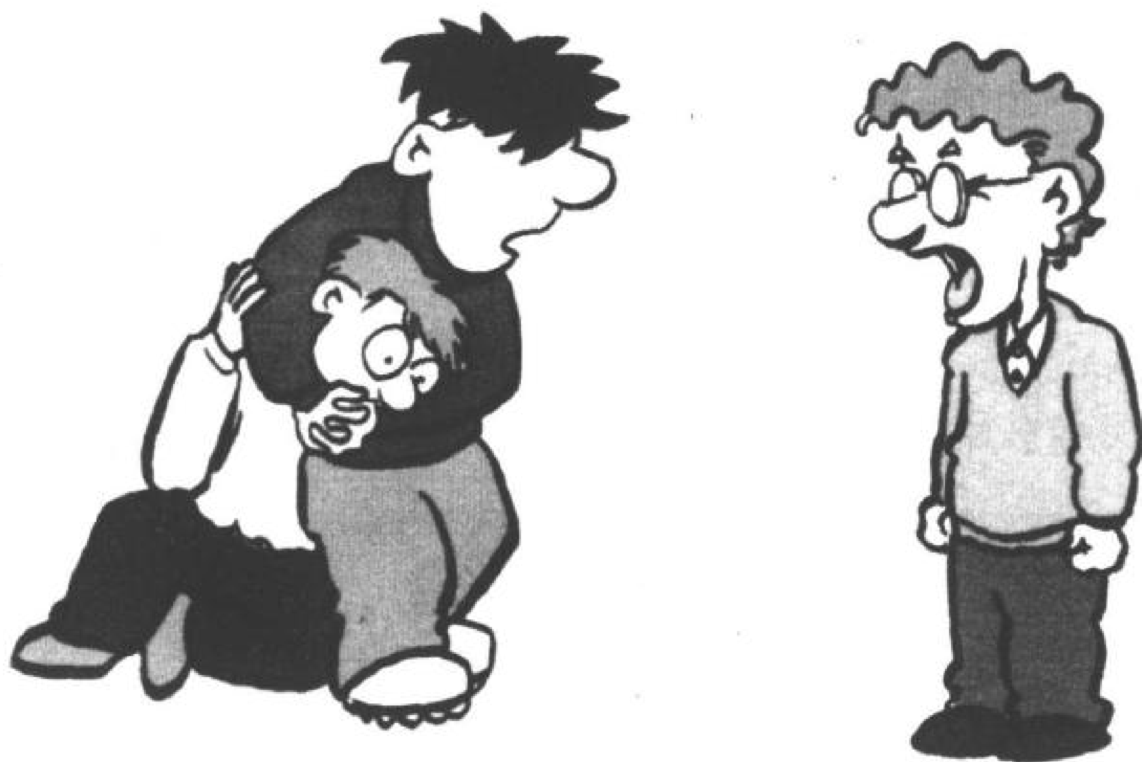


在纽约，他接触到了犹太工人阶级的知识文化，包括其中的团队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他的姨妈和叔叔们在物质上是贫乏的，但在精神上却很富有，并保持着富有活力的讨论、参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传统。

在纽约第四路，他发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店，他常常在那里浏览和阅读。



乔姆斯基曾经描述过一个对他影响很深的经历：一个恶棍在羞辱一个“善良的胖孩子”，所有的人都支持恶棍，却没有人来帮助那个受害者。



“我为那胖子站了一会儿，”他说，“我感到很受震动。”后来，他感到羞愧，并决定将来要支持那些弱者和被压迫者。“我总是站在失败者一方，”他说，“就像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



尽管乔姆斯基因他的智识而闻名，但他的政治观点却更多地由道德原则所驱使。他也同样为人们透过监狱营地的铁丝网痛骂德国犯人而深感震惊，这个监狱就在他的中学附近，虽然他也知道这痛骂出自爱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乔姆斯基比那些痛骂士兵的人在反纳粹主义上更充满热情。

乔姆斯基说：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我不能和任何人说任何话。没有人能够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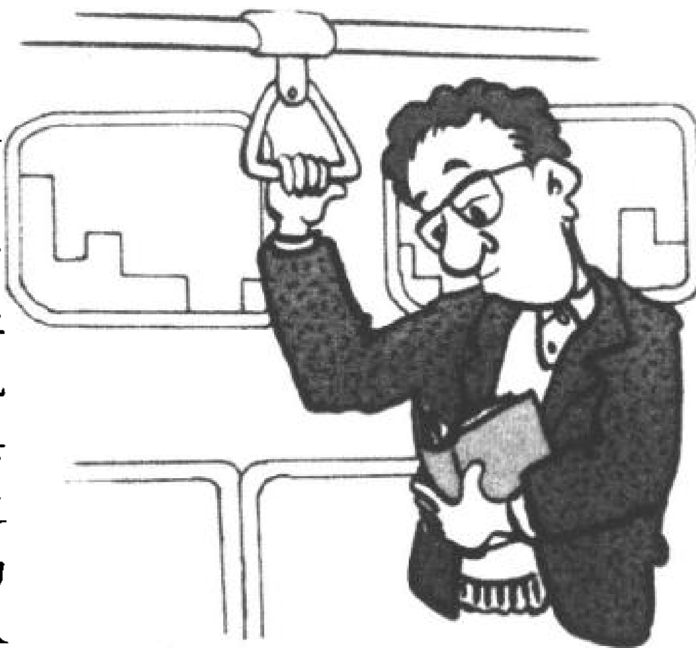
我只是一个人走开。……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论它，也不能理解任何人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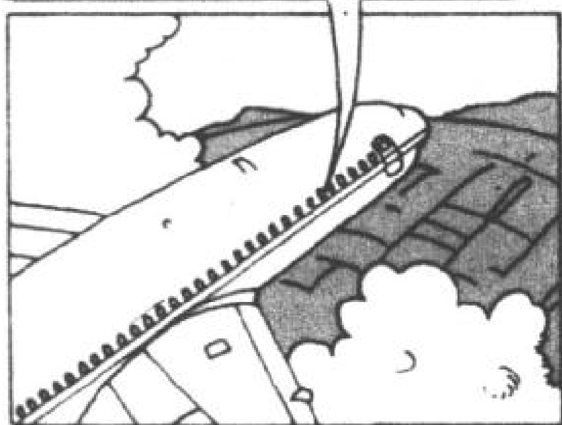




退 学

为了安排好学院的费用，乔姆斯基每天在学院呆几个小时，同时在家里住宿。他还在晚上、下午和星期天做希伯来语教师。但是他对大学的热情却减弱了，他对选修的每一门课程都丧失了兴趣。在大学呆了两年之后，他决定退学。但他保持了对激进政治的终生兴趣，并且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犹太复国运动。许多年之后，虽然他们抱有许多相同的原则，他却被称为反犹太复国者。





乔姆斯基决定去巴勒斯坦，以帮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一种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更进一步合作。但是他的行动却被一种犹太国的“彻底反民主”的观念耽搁下来。

由于他的政治兴趣，乔姆斯基见到了**泽林·哈里斯**，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教师。乔姆斯基是许多发现哈里斯有巨大魅力的人之一。哈里斯拥有与乔姆斯基相同的政治热情，所以乔姆斯基参加了哈里斯的研究生班。他在语言学领域最先读到的就是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方法》，此书数年之后才得以出版。

在哈里斯的建议下，乔姆斯基开始选修哲学和数学等课程。他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基础，但发现它们极有意思。



在哈里斯的影响下，乔姆斯基返回大学并研究起了语言学。他称自己的大学经历是“非正规的”。语言学系是由研究生组成的小团体，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兴趣，经常整天在饭店或哈里斯的公寓中讨论问题。乔姆斯基自己沉迷于语言学、哲学和逻辑学。虽然他与大学的教育系统接触甚少，但他还是很快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乔姆斯基于 1949 年与语言学家卡罗尔·舍兹结婚，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乔姆斯基的哲学老师中有一位是尼尔生·古德曼，是他把乔姆斯基介绍到了哈佛的同仁学会。乔姆斯基在 1951 年获得接纳和一笔研究经费，这使他生平第一次从求生存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自己的研究。

1953年，作为同仁学会的一名成员，乔姆斯基去了以色列，在一个农庄生活了几个月。那里食物缺乏，工作艰辛，但乔姆斯基自己很欣赏这里的生活。他把农庄看作一个有效的和成功的自由人的集体。



乔姆斯基和他的妻子曾考虑要生活在这个集体农庄，他对学术生涯既不抱什么希望也没有兴趣，美国也没有什么能拴住他的心。但是，他对于这种农庄中的盲从主义和种族主义原则感到不舒服。乔姆斯基对1947—1948年犹太国的形式持反对态度，因为他觉得，以前居住于巴勒斯坦的前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机构不能使国家制度得以持存。



当他的会员研究期限将于1954年结束时，他并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安排，所以他请求研究期限延长。他的妻子先行返回集体农庄并作较长时间的访问，他们俩打算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但是乔姆斯基获得了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作研究的位置，从此，他沉湎于语言学研究。

1955年，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所提交的论文是他正在写作中的一部书稿的一章。虽然这部书稿实际完成于1956年，但它在那时是那样的不合时宜，以致于直到1975年才得以出版，并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语言学理论的逻辑结构》。





政治行动主义

60年代，越战的升级迫使乔姆斯基必须做出一种道德上的抉择。他开始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这场战争，哪怕为此而蹲监狱。他采取了一种非常恰当的学术姿态来反对战争。当问到乔姆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曾这样说过："**这样做是为了早晨醒来能正眼瞧自己。**"

1966年，乔姆斯基在《纽约图书评论》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篇文章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在出版这篇论文时，乔姆斯基用行动承担着这样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暴露政府的谎言，根据政府行动的原因、动机和通常是隐蔽的意图来分析他们的行为。至少在西方世界，知识分子拥有来自政治自由、接近信息和传达自由的权力。对于这少数精英来说，西方的民主提供了闲暇、方便和训练，使他们能够去寻求隐蔽在扭曲、误导、意识形态和阶级趣味等面纱背后的真理，当代历史事件就是由此呈现给我们的。"





“美国的侵略性，无论它戴有怎样的虚诚的修辞面具，总是一种独霸世界事务的力量，必须对其原因和动机做出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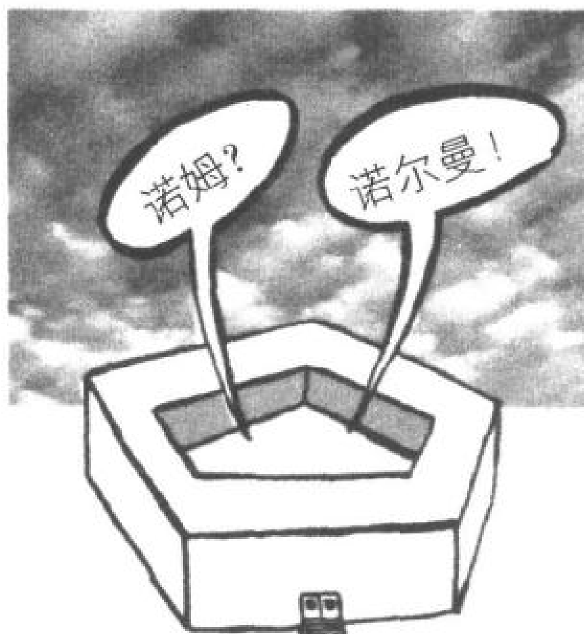
[《纽约图书评论》]

这篇文章出版不久，《纽约图书评论》即停止刊登乔姆斯基撰写的稿件。因为美国高层知识分子并不接受这样的劝告，即他们就像仆役一样，只接受统治阶层可笑的谎言，并只有在他们自己的政府承认某种暴行，而如果他们自己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这种侵犯，他们都将毫不犹豫地对之进行谴责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另寻他路。对于彻底诚实的乔姆斯基来说，无论你是评判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抑或评判你自己，都必须使用相同的原则。



任何事情都有欺诈性，难道不是这样吗？

1967年10月，乔姆斯基参加了五角大楼和法院的听证会，他是许多被关起来的人之一。他与著名小说家诺尔曼·梅勒同居一间狱室。在《夜晚的行军》一书中，梅勒是这样描述乔姆斯基的：“干瘦、棱角分明，有一幅苦修者的表情，常有儒雅之气，但有一种绝对的道德自足力量。”



自60年代末期卷入政治行动起，乔姆斯基教授撰写了一系列风格稳健的书、文章和小册子，来表现自己的观点。他受邀到哪里，就在哪里讲演或讨论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仍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



尽管乔姆斯基的兴趣和探寻变化多端，但他的研究神奇地保持着一种连续性。**他把同样的逻辑毫不留情地，诚实地应用于他所研究的每一种事物**。也就是说，他在形式上并没有完全改变自己，仍然是完全“乔姆斯基式的”。

正如每个重要的思想家一样，乔姆斯基的思想体系也是建立在他之前的那些重要的思想家的工作之上的。

我们来看看其中那些最著名的思想家。

巨人的肩膀——

乔姆斯基思想的先驱



柏拉图
（公元前428—公元前354年）

虽然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每一位思想家都保持着联系，但乔姆斯基还是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归在柏拉图的名下：柏拉图对真理的探索和对发展一种理性的道德人格的关怀都为哲学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曾这样问过：**“人类怎样才能只靠一点点证据就能知道很多？”**乔姆斯基针对儿童能轻易地驾驭语言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在乔姆斯基研究语言学和认知过程时，他就像柏拉图那样，注重探索作为解释抽象的、理想的形式，而不是仅从观察出发进行归纳。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构想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公正是统治的原则。乔姆斯基后来采纳了这种观念。

但是，乔姆斯基背离了柏拉图下面这种信念，即建立一种独裁制度，这种制度把知识分子置于一种特权地位。

柏拉图拒绝民主，因为民主会使政治权力与特殊的品质脱节。乔姆斯基则高度评价民主原则。但他们两人都拒绝暴政，以及由有邪恶意志的不道德的人所进行的不负责任的独裁统治。



勒奈·笛卡尔
(1596—1650)

笛卡尔经常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



乔姆斯基自己说过，他相信“笛卡尔式的共通感，”即笛卡尔在其《方法论》一书中展现出来的科学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笛卡尔提出一些规则来帮助人们通过逻辑的链条达到虽然有限但可靠的结论。

笛卡尔从拒绝他以前的所有哲学开始，试图建立一种基础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上，能建立一种产生真理的思想体系。



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此梦使他相信，因为感觉可能欺骗我们，所有真知只能从理性中来。他曾为了发现最基本的原则而使所有的一切都在他面前崩溃。他说，他所能确信的只是他在思想。由此他推断，说“思”确定了他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我思故我在”**即变成了他的哲学的起始前提。



他的能达成可靠结论的逻辑思维方法包括以下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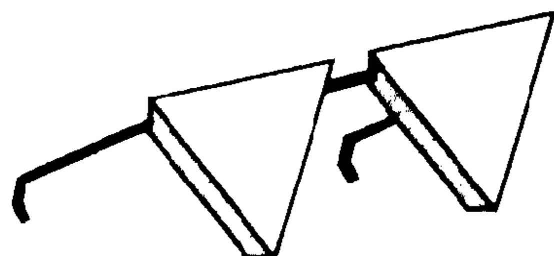
- 只接受清晰而明确的结论。
- 把每一个问题按需要分解成许多部分来加以解决。
- 工作要从简单到复杂。
- 每走一步都要检查有无错误。



乔姆斯基的所有思想都与这些基本原则紧密地相关。在语言学研究中，他超越简单的观察后试图建立解释性的原则。他也把科学的原则带入他的政治学观察和对媒体运作的分析之中。

笛卡尔还试图去发现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决定着我们怎样能从观察资料(输入)和知识(体现为输出)之间的区别中学到一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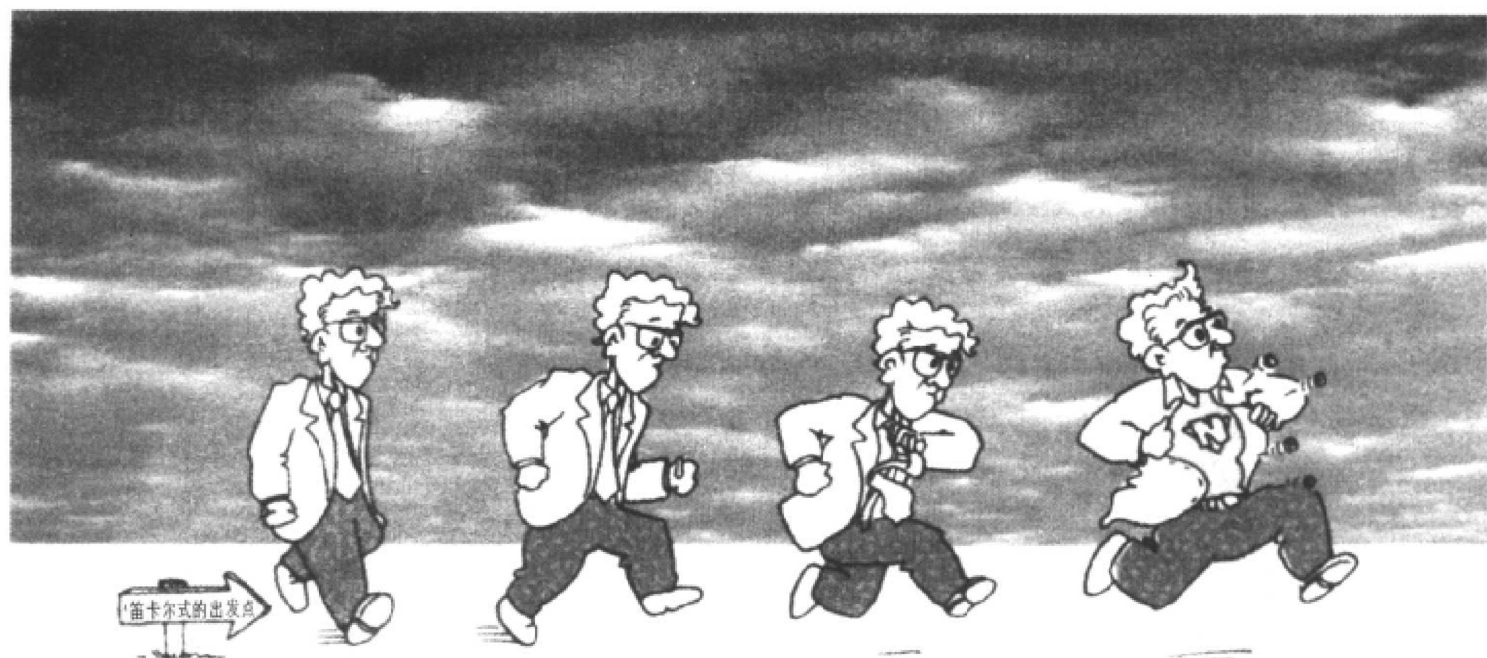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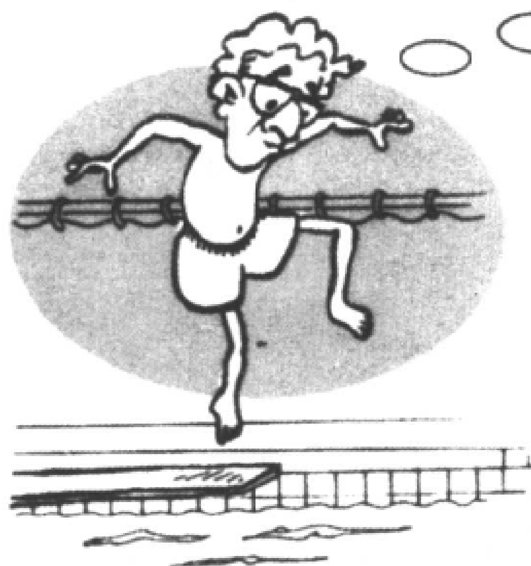
笛卡尔发现，在我们面前的三角形和我们在心里构建的三角形之间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我们的心理有这样的本质来构造一个三角形的意象，并把这理想的意象加在那些感性的材料之上。

乔姆斯基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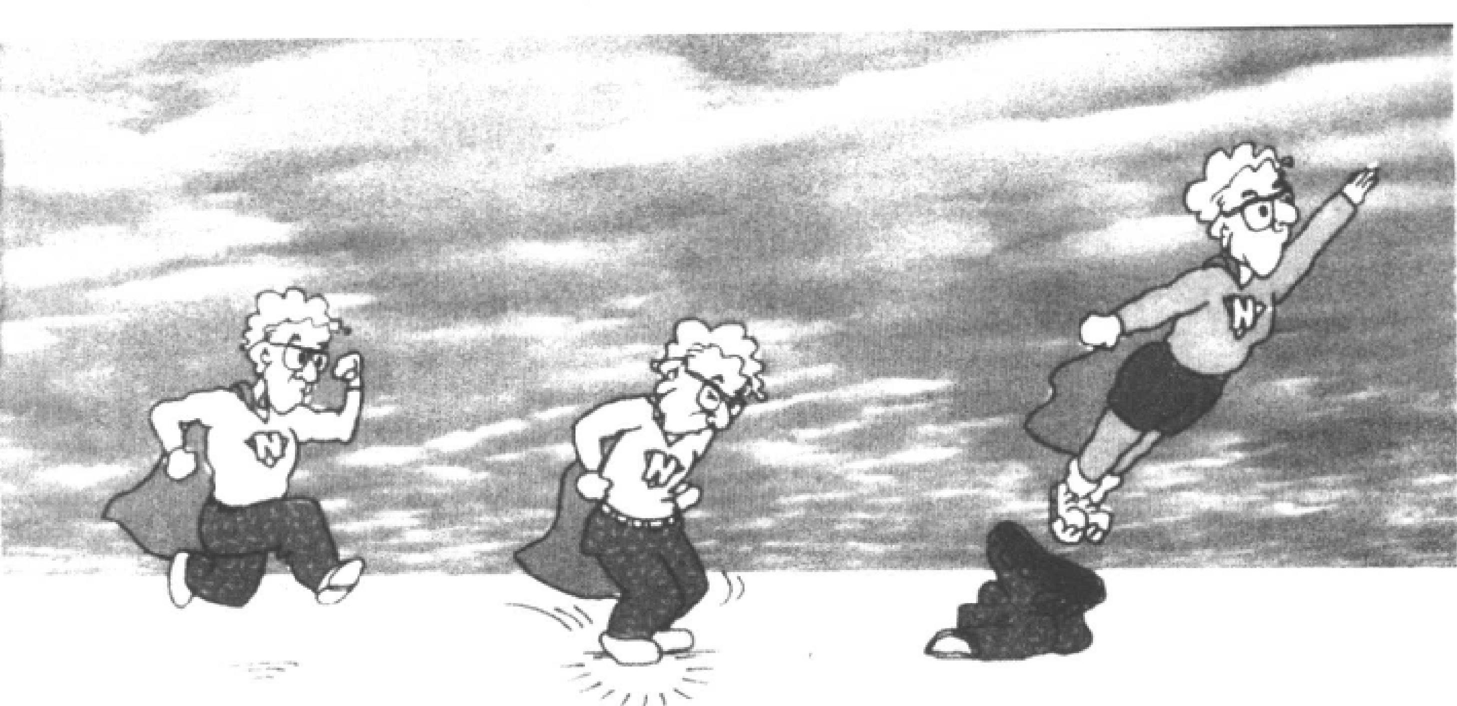


在语言学的研究中，乔姆斯基遵循着笛卡尔的道路。他用他的观察材料作为跳板以达到抽象的思维，并试图建立抽象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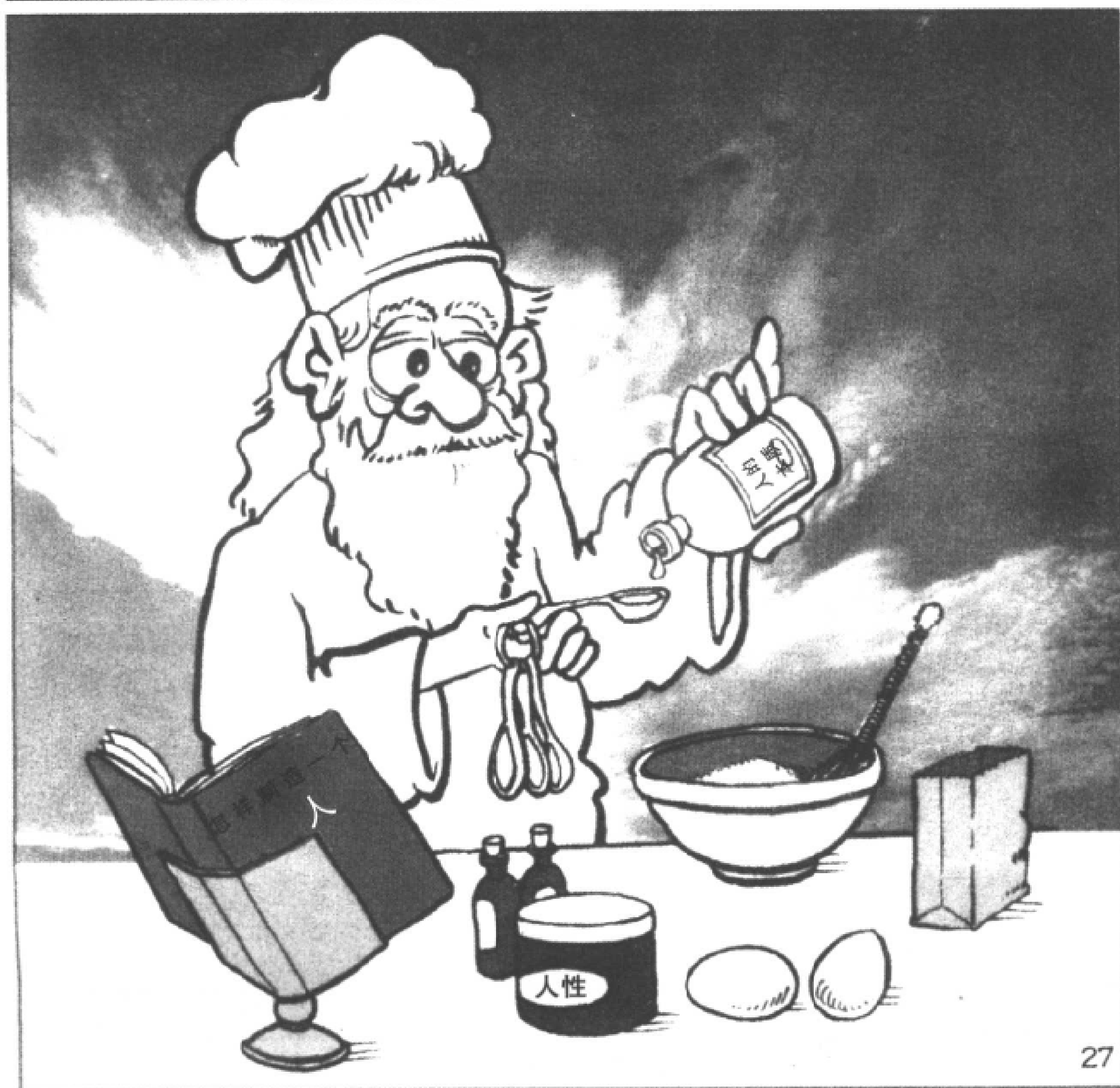


在《第一哲学沉思：关于真理和谬误》一书中，笛卡尔说，





对笛卡尔来说，人的本质在本质上是卓越的，而且它是来自上帝的。



经过思考，乔姆斯基把这些观念引入现代科学之中，并认为，突然而戏剧性的变化会产生出某些认识能力；就我们所知，这些认识能力是人类独有的。



语言就是这些认识能力的最普遍的标志，虽然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认识能力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可以发现。他说，语言研究可以提供一种契机或者一种模式，通过它可以获得对人类卓越能力的更为广泛的理解。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

在《论平等》一书中，卢梭向几乎每一个社会机构的合法性发出挑战。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核心主题，向每一个机构的合法性挑战，并且如乔姆斯基所做的那样，用永恒的警惕继续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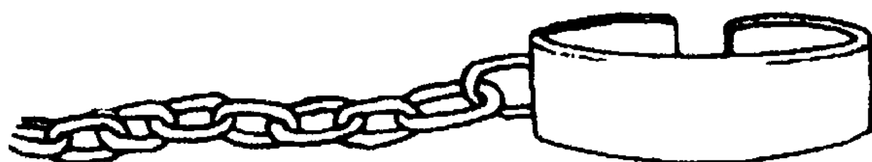
美国的制度是从一种并不纯洁的人类机构的视角来加以设计的。权力是腐败的，所以要监督它。自由不可能是一种恩赐。



卢梭对个人控制财富也持谴责态度。他声称富人们“通过富裕来掠取，通过暴力来建立，当然暴力也能剥夺他们，而他们没有申诉之地”。

乔姆斯基的社会正义感主要归功于卢梭——他不能想象为什么一个充满自由人的社会会容忍“少数人”“吞食过多，而同时饥饿的多数人却缺乏生活必需品”。

卢梭说过，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富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掠夺品而达成的一种共谋。富人“设立起正义和和平的规则以便所有人都去遵守”。（如同安纳托尔·法朗士后来所说的，这些法律拒绝富人和穷人有晚上睡在桥下的同等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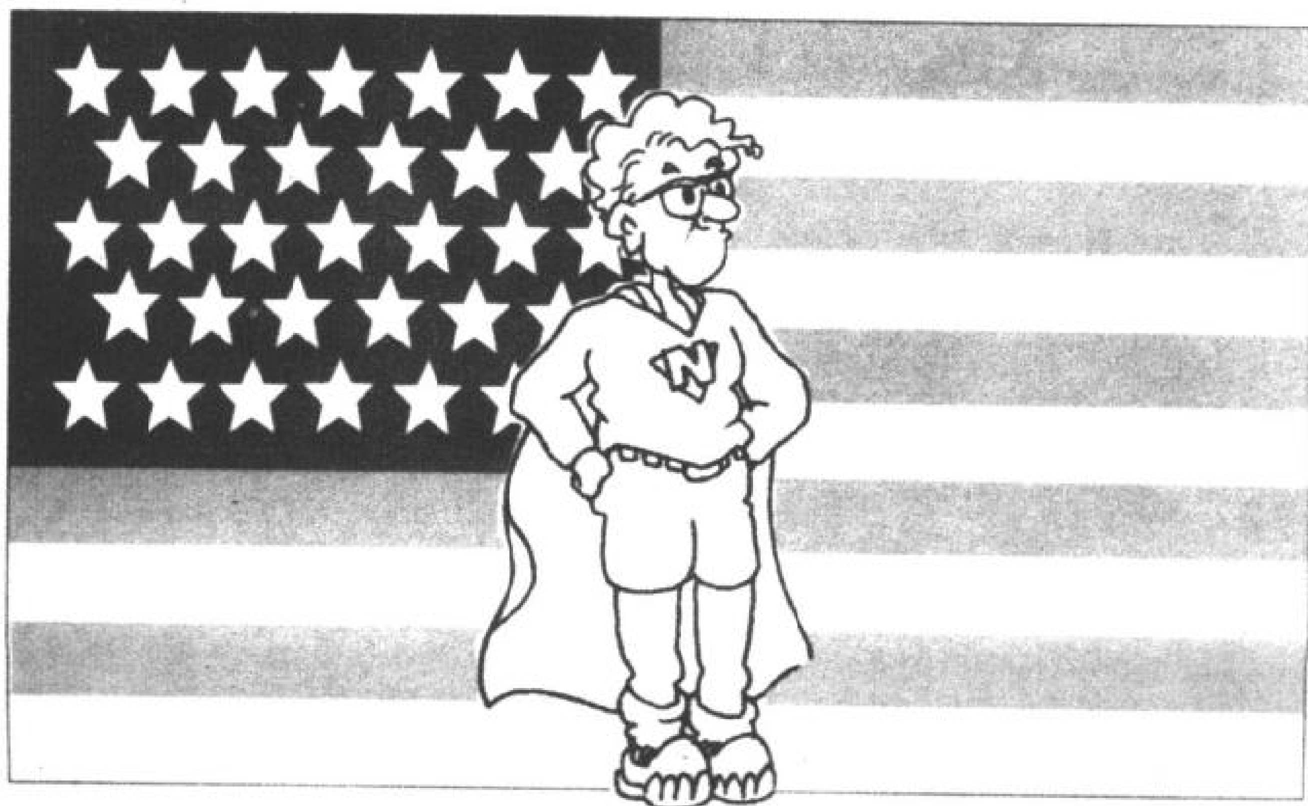
贫穷者和弱者被这样的法律所诱惑，卢梭说，“所有人都遇到了锁链，却以为它们是保护他们的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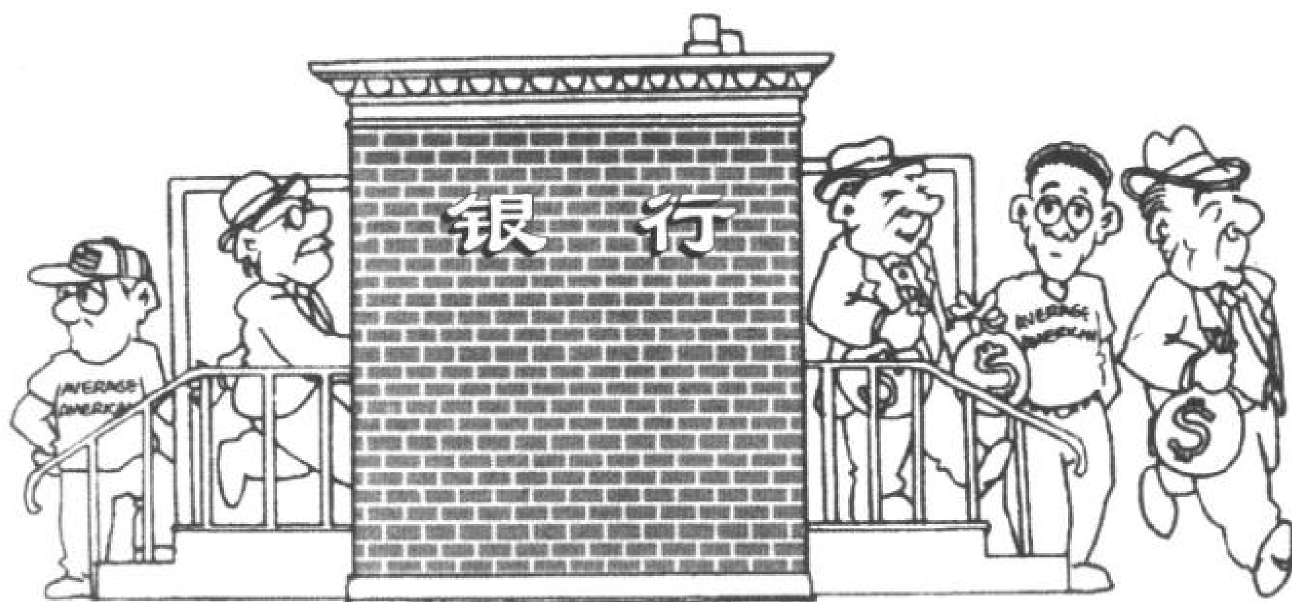


对卢梭来说，人类本质的基础是人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意识。放弃你的自由就是对上帝的侮辱。

乔姆斯基的政治立场常被认为是“左派”、“社会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因此他总是被许多容易把这些词语同最黑暗的邪恶联系起来的人愚蠢地误解。其实，他最捍卫的原则是自由和民主。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民主意味着由人民即大多数人来进行统治。这一原则本身并不是一种制度，但是它可以应用于一种制度。有多种途径把民主的原则应用于公众政治之中。在美国，民主的原则是通过人民对决策者实行投票选举来实现的。从理论上讲，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但实际上，并不是投票人，而是被选出的官员在制定政府政策。



在美国，对国家资源和财富的控制并不决定性地通过民主来进行。相反，美国的财富和资源非常不民主地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威尔海姆·冯·洪堡特
(1767—1835)



乔姆斯基在洪堡特那里，在政治观念和语言学观念两个方面，都找到了与之很亲近的东西。他坚信洪堡特与他自己有着相同的关于生成语法的概念，但是，洪堡特缺乏数学的技巧来完善它。乔姆斯基研究了数学基础，却并没有想到它与语言学有任何关系。

他很快就发现他能够把他的数学洞察力应用于生成语法之上。



乔姆斯基这样来评价洪堡特……



约翰·斯图尔特·密勒的论文《论自由》，以引用洪堡特思想的主导性原则作为开始："以最丰富多样的方式，[自由]在人类进步中具有绝对的基本的重要地位。"洪堡特这样来总结他对极权国家的批判："**我感到自己始终为一种感觉所激动，那就是对人类本性内在的尊严和唯一与那尊严相匹配的自由具有的最深刻的尊重。**"

洪堡特坚信,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本身更有益于人们的自由。他说,只有解脱束缚所有人的枷锁,“我们的每一步才将是一种进步”。如同卢梭一样,他相信人类是创造性的和探索性的存在物。“探索和创造——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核心。”表现这种属于人的品性的自由不仅是精英们的事,也是每个人的事。“放弃人的这种本质,就是放弃做人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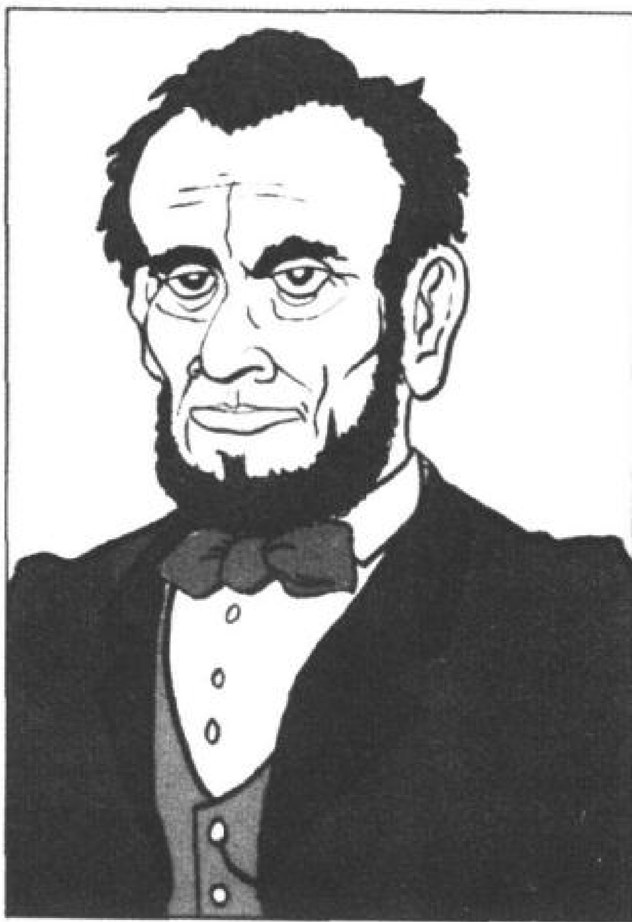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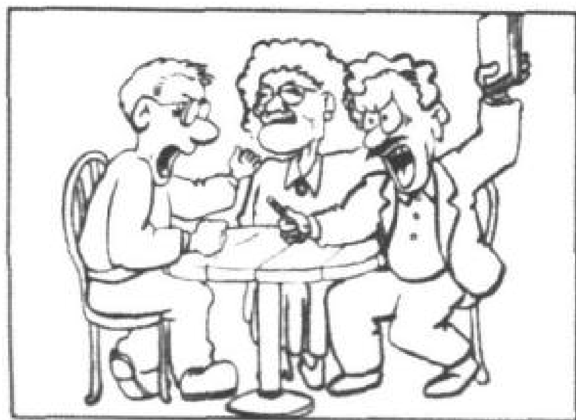
“伦敦——1861年9月18日,比彻尔·斯塔尔夫人致夏夫兹伯里伯爵的信,无论其内在的内情是什么,它都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它迫使伦敦报社的反北方机构,在公众面前公开承认他们反对北方的虚伪理由和对南方的病态而隐蔽的同情。这种态度对那部分完全厌恶奴隶制的人来说看起来是相当奇怪的。他们首要的不满在于目前的美国内战‘不是为了废除农奴制度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因此,那些心灵高贵的英国人,他们常常仅仅根据‘广泛的人道原则’,在他人的战争中克服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能会同情他的北方同胞。



《经济学家》这样说:‘首先,关于北方和南方的争吵是主张黑人自由的一方和主张黑人奴隶制的另一方之间的争吵的假设,就像它的不真实一样,是卑鄙的。’《星期六评论》则这样说:‘北方并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也从来没有假装着要为反对奴隶制而战斗。北方还没有树立起为争取黑人的公正待遇而斗争的这面象征性的旗帜,它捍卫的并不是无条件的废除奴隶制。’‘假如’,《检查者》如是说:‘关于这次伟大的南北战争的真正意义,我们已经被蒙骗,那么,除了联邦党人,还有谁有责任为欺诈作出回答呢?’”



——卡尔·马克思为《纽约日报论坛》和《维也纳快报》撰写的文章



这种观点与乔姆斯基对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的批评是很相似的。事实上,乔姆斯基承认他得惠于马克思。乔姆斯基在纽约的叔叔和婶婶们都是犹太激进分子的成员,他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处理日常事务。

那种团体的许多成员在其早期都是共产党的成员，但乔姆斯基自己则说，他 12—13 岁时，就已脱离了这种环境。许多早期共产主义者后来都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激进分子，并把俄国革命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右翼扭曲。



乔姆斯基从马克思那里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是由经济阶级构成的，以此为基础对社会进行分析，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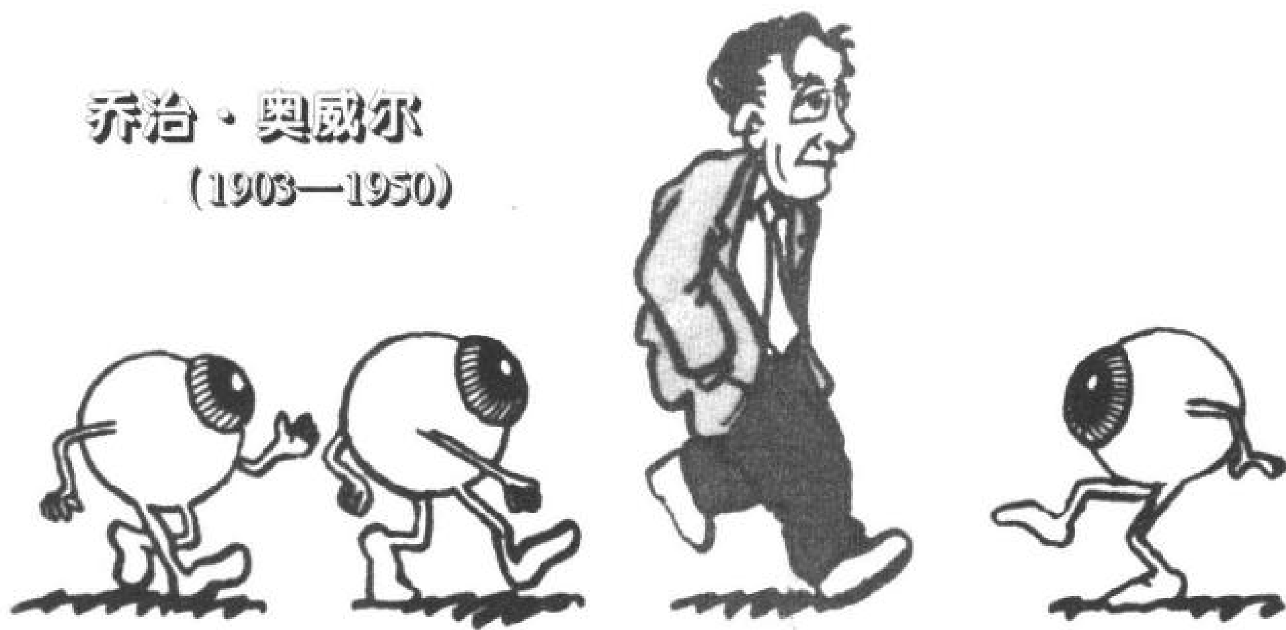


但是，乔姆斯基不赞同马克思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甚至对这些结论在 100 年后能否适用也表示怀疑。他反感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认为苏维埃制度并不受人欢迎，但至于这一制度是否和马克思有多大关系，乔姆斯基表示怀疑。他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是按照其领导者列宁的思想构建的。

在一个试图加入到群众运动中去寻求权力的自由意志论者的信条与一个已拥有权力并试图巩固这种权力的权威主义者的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



乔姆斯基认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而言，这是一种悲剧，即俄国革命虽然被称作社会主义，但是其真正的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语言知识》一书的前言中，乔姆斯基这样问道：为什么有了那么多的事实证据，人们对于他们社会的功能和结构却知道得那样少。他把这种问题叫做“奥威尔式的问题”，并解释道，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独裁制度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它总是向人们灌输一些信念，虽然这些信念与环绕我们的世界的明显的事实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人们还是确实无疑地、广泛地接受了这些信念。



乔治·奥威尔是埃里克·阿瑟·布莱尔的笔名，他1903年生于印度的莫蒂里，是一位英国殖民大臣的儿子。奥威尔创造了一种分析框架，对已变成现代民俗一部分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控制进行分析。



不幸的是，宣传机构的利用者也许比那些作为洗脑目标的人们从奥威尔的分析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奥威尔的著作《加泰罗尼亚的忠臣》(1938年)记述了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以及严重受伤的经历。奥威尔在西班牙专制者弗朗哥的身上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萌芽。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对资源和财富的私人独占，对信息的控制，在军队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投资，对劳工运动和普遍民主运动的压制，扩大恐怖的军事行动等等。法西斯主义是君主统治的自然膨胀，是贵族统治在工业时代的蜕变，并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即它发现战争生产巨大的财富。







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出版于1949年)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主要的超级大国进行着持续的战争,并且不时地更换着自己的敌人。战争对这些国度是必需的,它们通过战争来运行自己的经济和控制结构。

许多来自《1984年》的概念和短语(如思想犯罪和思想警察)已经成为我们语言中相当熟悉的一部分。《1984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温斯顿,他的工作就是每天过滤新闻报道和选择公共记录,目的是为领导者服务。新闻发布就是这样一种语言,政府用它来掩盖其正在做的事情。运用诸如过度简化、委婉的说词、误报、缩写、模糊不清、意义的歪曲等技巧,新闻发布把语言弄得那样毫无意义,以致于它不能用于交流——甚至不是用于让人理解——国家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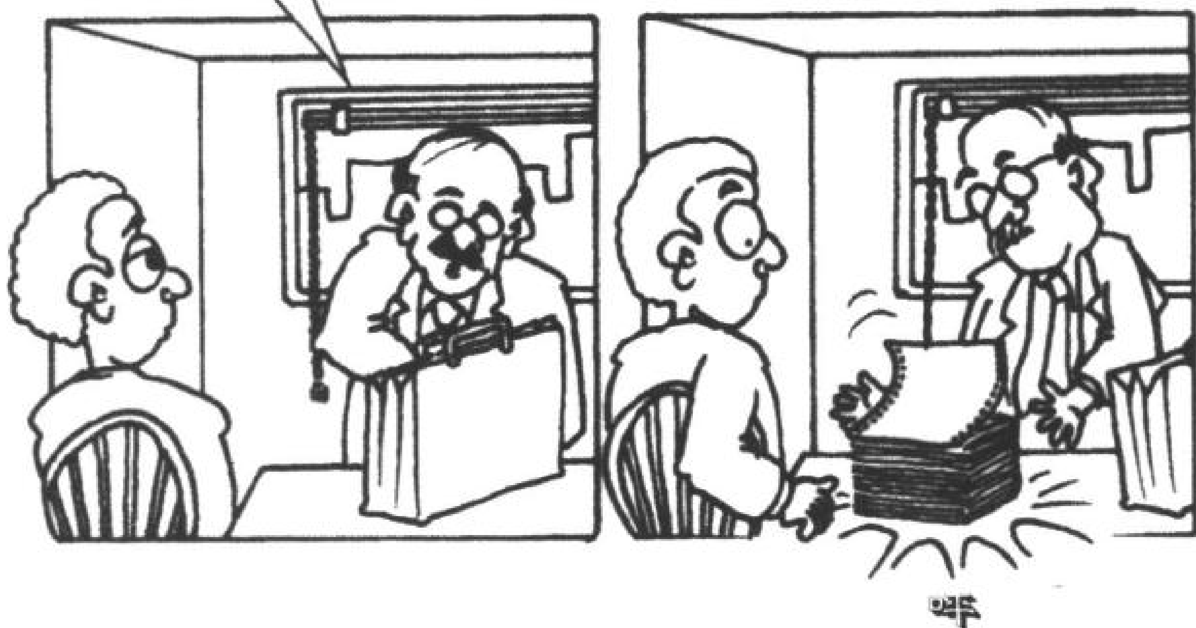


"难道你不认为整个新闻发布的目的就是缩小思想的范围吗?结果,我们将会使思想犯罪在语言上变成不可能,因为到那时将不存在那样的词汇来表现思想犯罪……每一年,思想的范围都会变得更狭小……"



引自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

矛盾的思想和模棱两可的话往往使词语指向其相反的意思，即一种被政府用来混淆他们所做所为的真正含义。例如，“和解”会被用于描述一次入侵。人们难道不记得“税收简化”一词的用法吗？



奥威尔1946年的论文《政治和英语语言》精彩地分析了语言的退化与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在这篇论文中，他描述了语言怎样被用来进行操纵和误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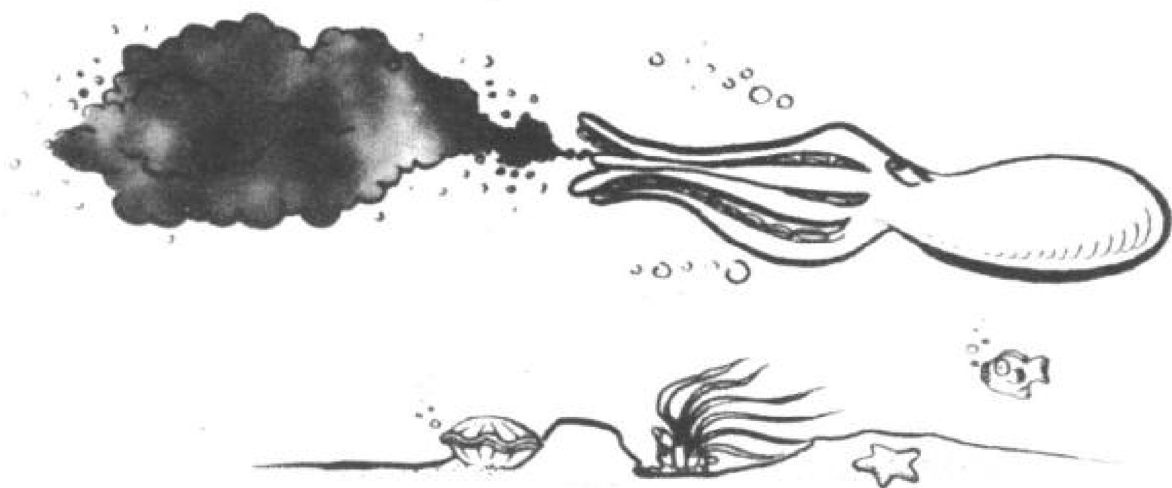
“在我们的时代，政治话语和政治写作大多是对不可抵御之物的抵御，”奥威尔说。这听起来和乔姆斯基后来所说的是一个腔调：**“无防卫的村庄遭到空中轰炸，其居民被驱赶到田野之中，牛群被机关枪扫射，茅棚被燃烧弹点燃，而这却被称为和解。成百万的农民被剥夺了他们的农场，跋涉流浪于路上，除了他们肩挑背扛的之外，一无所有。而这却被称作人口迁徙和支援边疆。**



许多人被囚禁多年而没有受到审判，或从背后被枪杀，或把他们送到北极的伐木营地鄙劣地死去，而这却被堂皇地称作消除不可靠的因素。如此这般的措辞法之所以被需要，只是因为有些人要用这些措辞来给某些事命名，同时又不唤起对这些事的真实记忆。想想那些抵制俄国专制主义的生活舒适的英语教授的例子吧！他不会这样坦率地直说，'如果你能通过杀掉你的政敌而获得更好的结果的话，那么我相信你还是杀了他的好！'因此，他很可能会这样说：



'我们坦率地承认苏维埃政权表现出某些令人道主义者或许会感到痛心的特征，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对政治对手权力的某种限制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并且俄国人民响应号召而忍受的那些艰辛应该参照具体的成就来加以判定。'



当一个人的真正目的和他宣布出来的目的之间存在鸿沟时，他就会本能地倾向于使用冗长的话语，就像乌贼鱼喷出墨雾以遮掩自己一样。"

（请参看本丛书中，由史密斯和莫舍尔写的《奥威尔入门》。）

无政府主义的传统

无政府主义被广泛地定义为这样一种信念，即所有有组织的政府、法律和法制机器都应该被取缔。在乔姆斯基的观点中，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没有有组织的政府，而是一种无独裁的特别组织形式。它以社会组织的自创形式为基础，这种形式能够对集中的国家权力和强制性机构做出有效的选择。乔姆斯基把无政府



主义定义为：寻求“一种自由联合，这种联合既无来自国家也无来自权力机构的强制；在这种自由联合中，自由的人们能够创造、探索和获得他们自己权力的最高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任何社会理论或经济组织的纯粹代表，只存在不同的理论和哲学被应用于其中的现实的生活环境中的社会。

泽林·哈里斯

当乔姆斯基遇见泽林·哈里斯的时候，他正处于从大学辍学的境地，并且对他以前选择并感兴趣的课程灰心丧气。政治学仍是他的热情所在，而哈里斯与他有着许多共有的政治理论观点。正是因为共同分享着许多政治观点，乔姆斯基被引入了语言学。语言曾经也是乔姆斯基童年时代一个主要的兴趣，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语言学教师。







哈里斯作过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导致了对意义进行科学研究的技术的发展，并引发了一场语言学的革命。他把结构主义分析扩展到句子之外，并建立起一些模式以便获取不同句型之间的系统的语言学关系。他把他的模型称作转换。乔姆斯基把转换的概念结合进他所称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也可以简单地称为生成语言学）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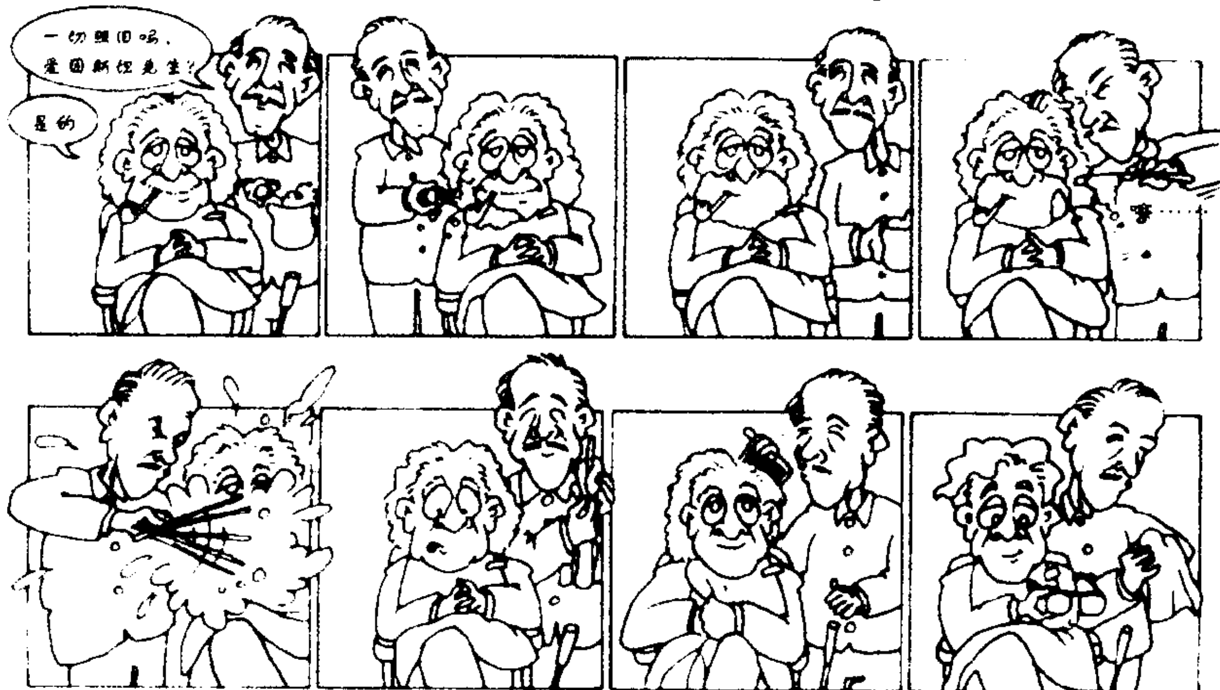


请读者注意：



读者诸君中，如果有谁迫不及待地想阅读乔姆斯基关于政治学和媒体的精彩论述的话，那么可以跳过去，去读本书中讨论那些有趣的主题的章节。但是，如果你真的选择先读其他部分，那么欢迎回来阅读关于语言学的部分。

在乔姆斯基以美国对外政策——以及《纽约时报》的严厉批评者的形象出现之前，甚至《纽约时报》也心悦诚服地承认他作为语言学的开拓者的重要性，并声称他的第一本著作《句法结构》“**已经在语言学领域产生了乔姆斯基式的革命**”。他通常被新闻媒介径直称为“**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乔姆斯基对我们时代的最为透彻的批评的演进是其语言学著作的逻辑的和道义的发展。如果有时乔姆斯基的社会批评太尖锐，以致于有人认为乔姆斯基对人性有一种悲观的看法的话，那么，他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却揭示了他对人类本质的一种类似于宗教的肯定和充满希望的看法。你自己可以从中找到并验证这些东西。



语言学

什么是语言学

语言学就是关于语言的科学。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人们都要遵守一些语法规则，以及一些复杂和细微的语言运用规则，但并不一定明显意识到这些规则。语言学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揭示和建立这些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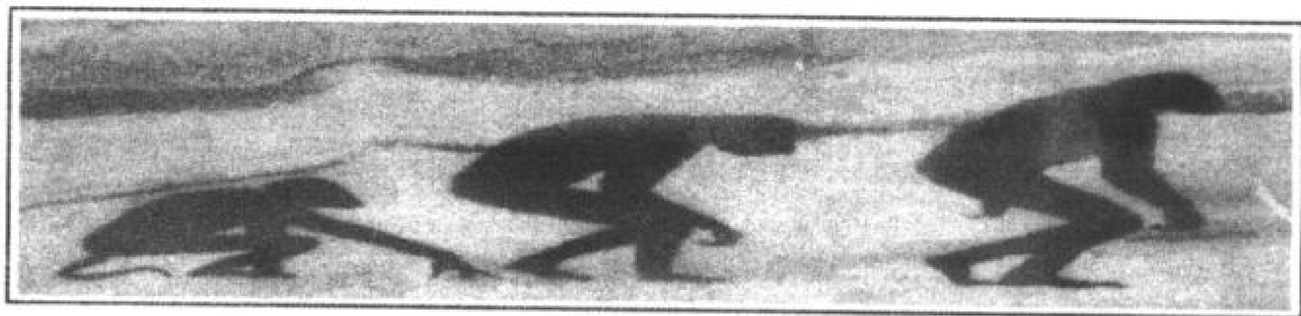
现代语言学是在殖民主义完成、世界性旅游不断增加的19世纪涌现出来的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是在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和语言中诞生的。语言学家在努力研究他们所遇到的在殖民主义压力下正在消亡的诸多语言。

语言学专家常常被呼吁帮助人们尽可能快地学习外语，以便缓解各种文化间的紧张关系。

语言学的其他部分工作是对语言及其语法和语音意义创造公式、语音运用公式进行比较鉴别。如同在其他学科如生物学中一样，这一任务最初的部分是命名和分类。







语言学的演进

在西方，对语言的研究开始于古希腊。对柏拉图来说，语言学就是对字源或希腊语词的起源的研究。**狄奥尼修斯·斯兰克斯**在公元前一世纪时阐明了希腊语详尽的语法系统。这被认为是传统语法学。

罗马语法学家奥伊留斯·唐纳图斯和普里森在公元六世纪时修改了狄奥尼修斯·斯兰克斯的语法系统，以使其适用于拉丁语。这个修正过的系统很有用，因为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世系相关，结构相似。



希腊人的哲学语法学传递给了罗马人。希腊－罗马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并使它能够适用于现代欧洲语言。当拉丁语分支成为罗曼语种——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时诸种语言在结构方面变得很不相同，以致于需要不同的分析方法。应用传统语法就显得很困难了。

某些学者把语言的这种变化看成是古典拉丁语的退化，于是便迫切想要回到古代的语言形式。那种把语言的变化看作退化并要求预以制止的观念被称为语言学的惯例主义。





随着 15 世纪贸易线路的扩展和殖民化的进程，欧洲遭遇到了其他语言，这些语言既不是来自拉丁语或者古希腊语，也不适应于传统的语法学。这刺激了一种去寻找一些基本原理的研究，这些原理应该适用于更为宽泛的语言指称框架。

这种对一种普遍的逻辑规则的探求，导致了 17 世纪所谓的普遍语法。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语法分析扩展到了非欧语言，但是相对来说成效甚微，因为所有的语言都被强行纳入了拉丁语言的模式之中。只是到英国人发现了公元前 4 世纪印度学者潘尼尼的方法，现代语言学才登场。潘尼尼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和语法学描述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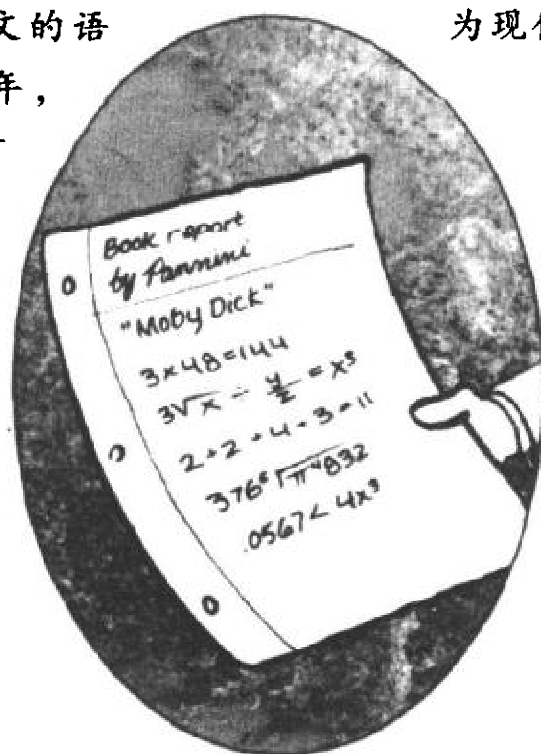
英国殖民主义者 18 世纪在印度发现了一种古代的宗教、哲学和文学语言，即梵文(现在被界定为印度－伊朗语言)。印度人对梵文的尊敬一如欧洲人对待拉丁语一样。语言学家看到了梵文和希腊语以及拉丁语之间的相似之处。

英　　语	mothe(妈妈)	is(是)
梵　　文	mata(妈妈)	sti(是)
希 腊 语	meter(妈妈)	esti(是)
拉 丁 语	mater(妈妈)	eot(是)

一些特别的词是相似的，在语形学和句法的组织方面也是如此。

语形学：语言的形式和结构。
句法：词被联接在一起以形成短语、从句和句子的方法。

印度人研究梵文的语法已经有 3 000 多年，他们的著作从许多方面来看，在哲学构成和分析的完备性等方面都已经超出了西方的传统语法学。印度的被神圣化的文本，即吠陀经，已经被从语法方面研究过了，这些研究的传统被藩尼尼加以整理，这使他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先驱。



藩尼尼把他的陈述建立在他对被分析的实际文本的直接观察之上，并且用一种准数学符号加以表现。藩尼尼的梵文语法学成为欧洲语言学的分析模型。他的方法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未得到进一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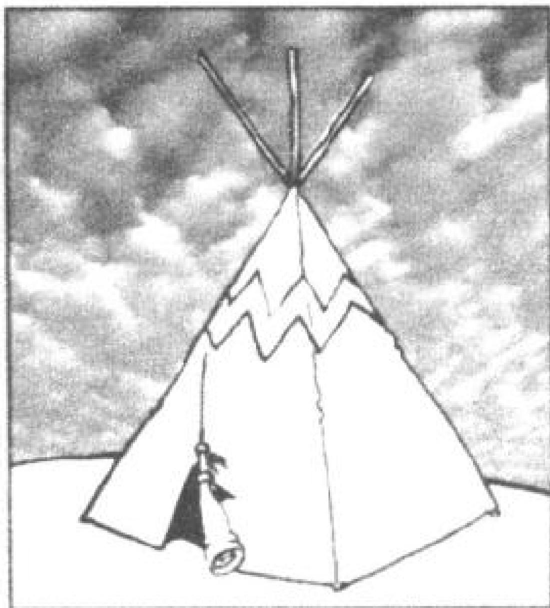


许多欧洲学者曾探寻梵文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相似性，并对这种相似性加以解释。**威廉姆·琼斯爵士**，第一个欧洲伟大的梵文学者。他于 1786 年提出这三种语言“有着相同的起源，只是，这种起源现在也许已经不存在了”。

琼斯的洞见奠定了以后 100 年语言学研究的领域。19 世纪的语言学在体系上来说就是一种历史的和比较的语言学，在这段时间里，学者们寻求梵文、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塞尔特语和其他印欧语言之间的交叉关联和演化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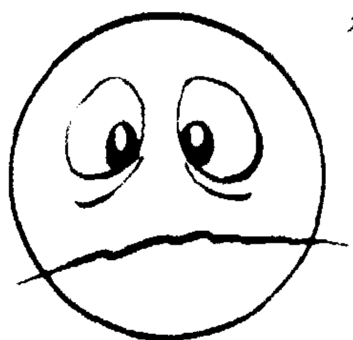


到 19 世纪末，语言学开始把它的注意力从语言的历史和演化转向了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方面。语言学研究的这一分支被称为共时性语言学，即研究现在的语言，与历时性语言学正好相反。这种转变在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得到了体现。这本书在他去世后的 1916 年出版。这两种分析模式在今天都被保留下来，作为语言学研究的相互补充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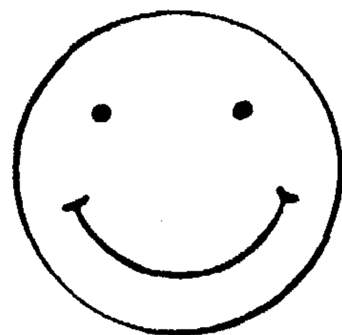


20 年代，共时性语言学在美国被**美国土著语言**的丰富变化的研究所刺激。这个时期的主要语言学家，诸如弗兰兹·包斯、爱德华·萨皮尔和阿尔弗雷德·L·克若伯尔等，同时也是社会人类学家。在 30 年代早期，语言学家从描述性工作转向了理论基础的研究。**列奥纳德·布隆菲尔德**，一个行为主义者，在其 1933 年的著作《语言》中，奠定了美国语言学思想的信条。

布隆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模式被其后的另一代语言学家所完善，这些语言学家是：伯纳德·布劳克、泽林·哈里斯、查尔斯·赫凯特、尤金·尼达和肯尼斯·帕克等，他们发展出来的语言分析理论被称为新布隆菲尔德学派或者结构语言学，同时又被称为美国结构主义，以区别于结构主义的其他派别。



行为主义把它的研究领域限定于在物理方面可加以测量的现象，以使其接近物理科学。所以，意义并不是结构主义者考虑的内容。在5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泽林·哈里斯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导致了对意义进行科学研究的技术的发展。他将结构主义的分析扩展到句子之外，并发展出一些规则来把握不同句子之间系统的语言学关系。他把他的规则称为转换。





转换这个概念给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描述和分析工具，它放弃了行为主义信念的狭隘限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探寻空间。在 1960 年和 1980 年之间，生成语言学处于上升时期，而结构主义在衰落。

作为科学的语言学



按传统来说，语言学家研究的就是不同语言的发音、语法、词汇和言说者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他们创造了一种语言研究的语汇，使其他领域中对语言感兴趣的人，例如辞典编撰者、口齿矫正者、翻译家和语言教师等也能使用。乔姆斯基想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在乔姆斯自己的著作中，他紧扣着科学方法的原理。乔姆斯基的目标是推动语言学研究超越收集蝴蝶标本的阶段，来探索解释的普遍原则，并由此而找到通向人类本性的理解之匙。通过这条道路，语言学从为其他领域服务的徒步式研究发展到更具力量、更广泛、也有更长远效益的领域，就像物理学一样。

社会科学，即对人的研究，能不能被称为科学，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B.F. 斯金纳曾尝试把一种科学的观点应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中，但是根据乔姆斯基的评价，他失败了，因为他**试图把人类像对待无生命的物体那样加以处理。**



乔姆斯基把科学方法带入人文研究之中的方式，并不是把人看作是物理科学研究的那种没有生命的对象，而是只采用分析和逻辑的科学方法。

在他对解释原则的探寻中，乔姆斯基更多地注意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同时，他把他的研究视野缩小在英语和为人所熟知的语言上，而不是分散开来并为许多模糊不清的语言编目。乔姆斯基感到，科学必须试图解释为什么事物按照它们所运行的方式运行。虽然，许多人拒绝人类的行为能够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主题这样一种观念，但对乔姆斯基来说，寻求对问题的解答，努力为“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供答案，都是科学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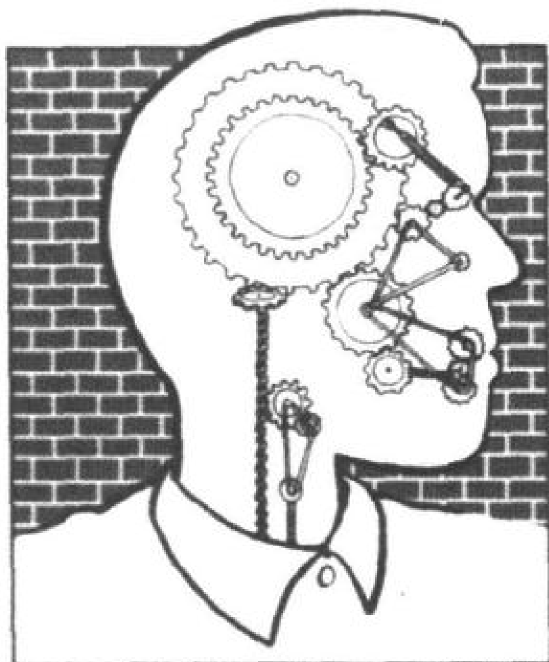


乔姆斯基把物理科学作为一种模型，用来拟想语言学。两者的相关特性是：

1. **寻求解释比只进行描述和分类更为重要；**

2. **缩小研究领域可以产生更为稳固的理论，虽然这样会牺牲意义更为深远的答案；**

3. **抽象和理想结构模型的运用比起感性的资料来能与更高程度的真实性相契合。**



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皮层从生物学上来说不仅与人的说话的生理学方面相一致，而且也与语言自身的组织相契合。把词与词相互组织起来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乔姆斯基说，语言的有序运用是创造性的，并非简单地如行为主义模式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刺激－反应（参看行为主义）。

普遍性的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断定：有一种普遍语法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拥有一种语言的基本构架，这种构架适合于任何具体的语言。就我们所知，这种独一无二的语言能力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对语言的日常使用证明，每一个人类存在物都具有巨大的创造性潜力。



人类在其童年时期，虽然他们只有一点点外部世界的经验或进行理解的参照框架，但他们在学习语言方面都有杰出的才能。这一点使乔姆斯基相信，不仅人类具有语言才能，而且一种基本的语法是与生俱来的。



乔姆斯基说，可以大致确定地说，人并不是生就只适应某一种具体的语言，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儿童生长在美国，就会说英语，如果一个美国小孩被讲汉语的人包围，那就将学会说汉语。根据这一事实，乔姆斯基认为，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即所有的语言结构的背后都有一种普遍的语法。乔姆斯基的下一步工作就是把这种语法的诸规则抽象出来。通过运用一种符号系统，这些语法规则就像数学运算一样不断递加起来。

生成语法之内在性的证据

乔姆斯基说，某些语法规则太隐蔽、太复杂以致不能由具有极少语言材料的儿童抽取出来。因此，乔姆斯基说，[掌握语法规则的那些]技巧是天生的，因为儿童没有学过它们。儿童没有足够的证据把那样复杂的语法系统联合在一起，并用来在语法系统范围内稳步快速地进行学习，儿童也很少被告知语法规则，很少得到不合语法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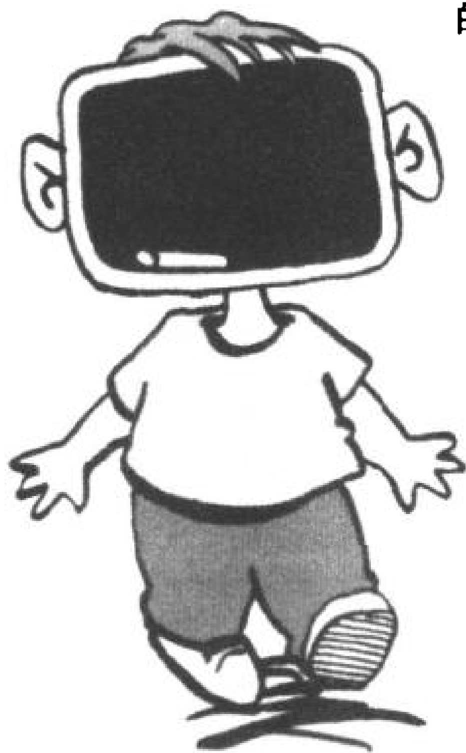




语言学家们把语言的获得与语言的学习区别开来。学习一种语言如同学习其他东西一样是生活中后起的，是语言获得的发展阶段表现出来之后的事。学习语言的学生读语法和词汇书籍，听课，并被教师指导和训练。年幼的儿童在用极快的速度吸收语言和获得外部世界的丰富线索之前是不会说话的。儿童的语言获得过程有如模塑一样，是一种内部的进程，这种进程受外部的刺激所激发时，它就开始沿着确定的路线展示出来。



当一只鸟从蛋中孵出，构成一条与它所从属的庞大有机体的母子纽带时，这被称为模塑。孵卵的过程就是这样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受外部刺激的激发，但却是以一种规范化、可预见的方式自我展现的。这个过程从一个个体到下一个体，是相同的。



本性与习得、遗传所得与由经验与环境所得的对立，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些概念实际上并不能清楚地分割开来。在现实的进程中，这些东西似乎是熔为一体的。所以争论决不可能被清楚地解决。行为主义的观点这样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习得的，人在其出生时是一块白板，可以被操纵和塑造去获得几乎任何种类的行为。



对乔姆斯基来说，这是一种近乎带有罪过的简单化观点，并且与事实不相符合。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但人类儿童在根本没有任何参照框架和只接受少得可怜的形式指导的情况下，却能很容易地在短时间里掌握语言。他们在接触语言时唯一的凭借是去听人们的言谈。他们很少被告知为什么这些句子是正确的，或者给予他们例证来说明什么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进入一种系统的流畅的运用之中，这个系统包括众多的非常复杂的语法规则，对于这些规则，乔姆斯基说，他们则没有获得足够的材料去学习。乔姆斯基坚信：通过材料学习这些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规则对孩子却是有效的。



有两点你必须注意：

1. 乔姆斯对人性的看法是明显肯定性的：“对语言的有秩序的使用是每个人巨大的创造性潜能的证明。”

2. 乔姆斯基在语言和政治学两个方面的特殊天才表明了他这样的才能：能看到事物清晰而简单的真理。乔姆斯基是这样一个人：正是他看到皇帝并没有穿任何衣服。这正是他对我们许多人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一些人将会满足于就此停步——相信语法是内在的，而不是习得的，这就够了。但乔姆斯基不是这样的人，他需要细节。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语法是不可习得的呢？说语法是内在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语法以及它是怎样实际运用的呢？

语法是可以习得的吗？

通过分析平常讲英语的人并不注意的一些微妙的语法规则，乔姆斯基表明，给那些初学说话的儿童用实例演释我们流利使用的规则太困难了。甚至试图去理解首语重复法（一个被广泛使用，但很难解释的语言学概念）是怎样发挥作用的这样的解释，都是困难的，但是一般人在对语言的运用中，却很少有什么错误发生。

（*编者注：如果要证明乔姆斯基的观点，对首语重复这一语法作出解释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决定放弃这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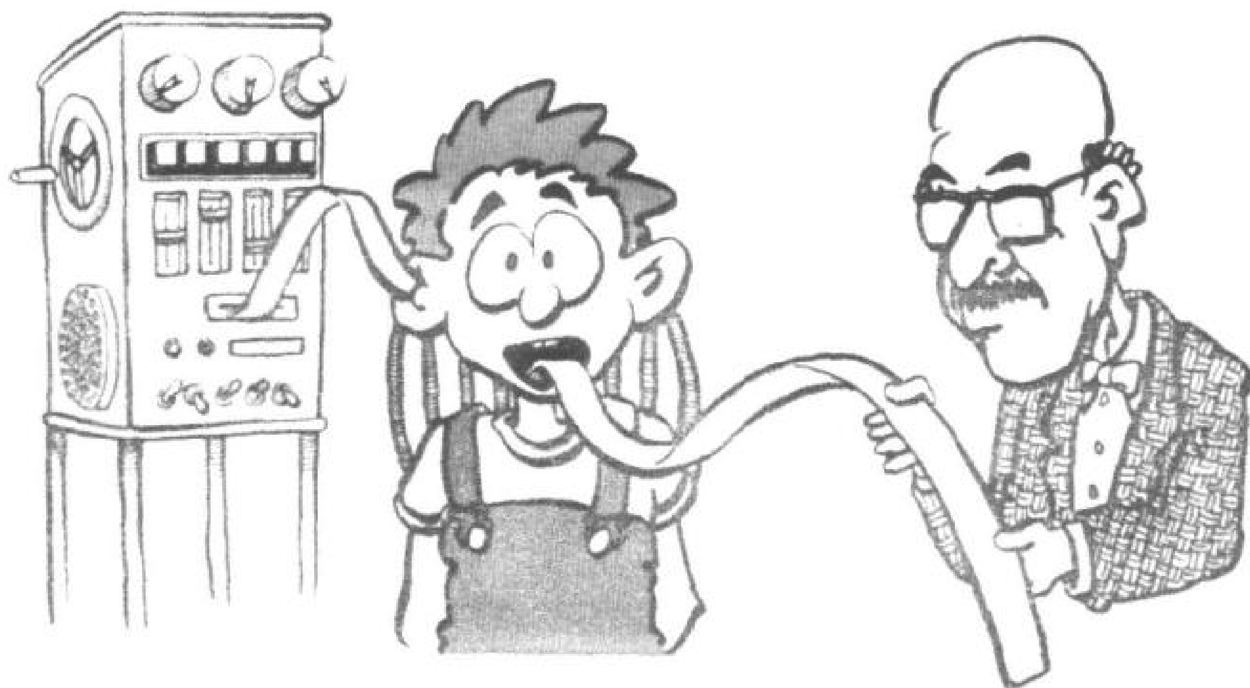


对于职业的语言学家来说，仅仅是去清理出在造一个可能接受的或者组织很好的句子时所参与其中的语法的那些微妙之处，也是困难的，特别是因为句子组合的可能性数量是无限的——有些句子是模糊的，有些却不是；有些通过释意或暗示的关系等是相互关联的。研究一个简单的段落也要求一种相关的、交叉关联的丰富系统，这个系统与所有的语法的微妙系统都是相互关联着的。

大多数从数学角度来看是可能的句子却很明显是不合语法的；同样，在许多情况下，要精确指出某种确定的形式的不可接受性的原因，也是极端困难的。

我重复：语法是可以习得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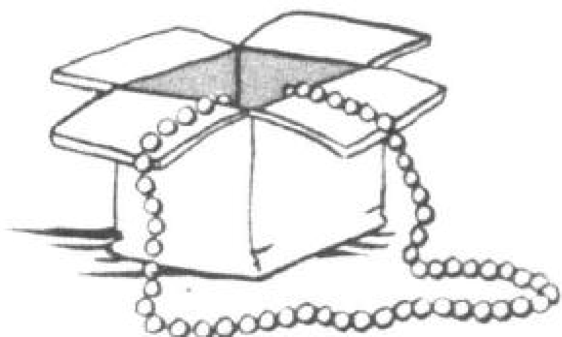
对学习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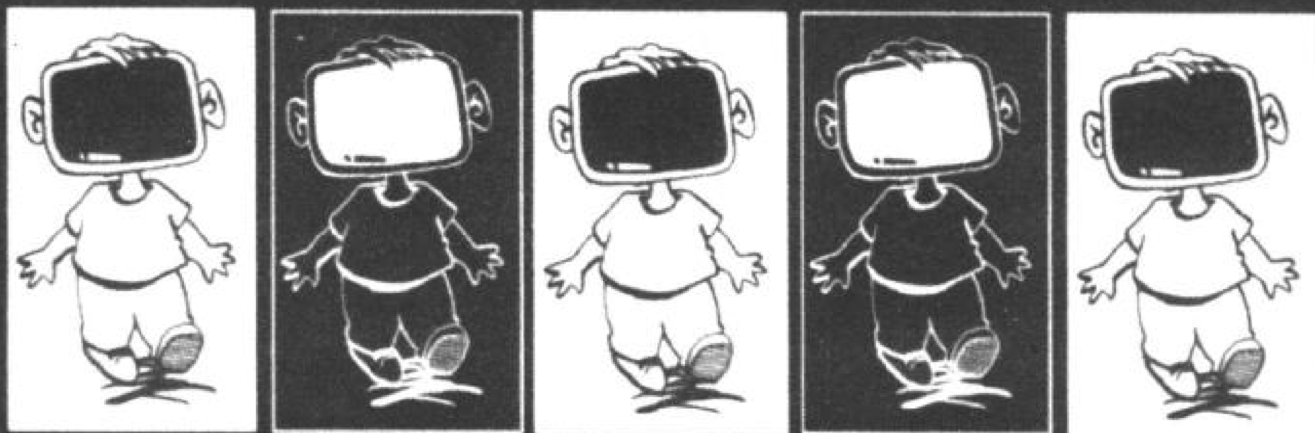
乔姆斯基说，要研究学习，我们有必要来观察一下有机体（儿童）的输入（资料）和输出（语法）。一个没有语言知识的孩子要开始说话，就得根据一定的资料建构一种语言的工作知识。从输入/资料与输出/语法的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开始培养一些关于有机体的精神活动，即从输入到输出的转换的观念。

为了考虑一个简单句子中的语法规则的种类，我们不得不假定一些抽象结构，它们与物理事实（资料）没有直接关系，只能通过一些长长的高度抽象的心理运作链条从那些事实中推导出来。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能说这样的句子："玛格丽特装项链的是什么盒子？"而不是这样的句子："玛格丽特装项链的是什么盒子项链就在那里面？"这正是英语的特性，也可能是所有语言的特性。一些复杂的名词短语，如"在那盒子里的项链"，当你把它变成问句时，不可能把这个短语的意思完整保留下来。乔姆斯基认为，这是语言学的普遍的现象，但却不能从例证中习得。当我们学习语言时，我们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证据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乔姆斯基说，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过程，学习发生的情景并不是刺激－反应模式，也不是行为主义者所描绘的那种人是一块白板的模式。刺激－反应理论只能导向一种习性系统，一种关联网络，而这种系统并不说明我们驾驭我们的语言时，凭直觉就懂得的声音－意义关系。



我们所使用的语法是创造性的，在此创造性之中，语法产生、限定或标识出实际上无限数量的句子。一个言说者能够运用和理解那些同他以前听见过的任何句子都没有物理相似性（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句子。

语言的无限多变性





关于这个问题，韦斯理教派大学的理查德·奥曼教授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向25个人放映了一个简单的卡通片，并要求他们用一个句子把卡通片上放映的东西描述出来。结果25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接下来，这位教授把他的结果输入计算机程序之中，这个程序被设计来决定这25个句子所用的词汇能组织出来多少语法上正确的句子。结果有198亿种不同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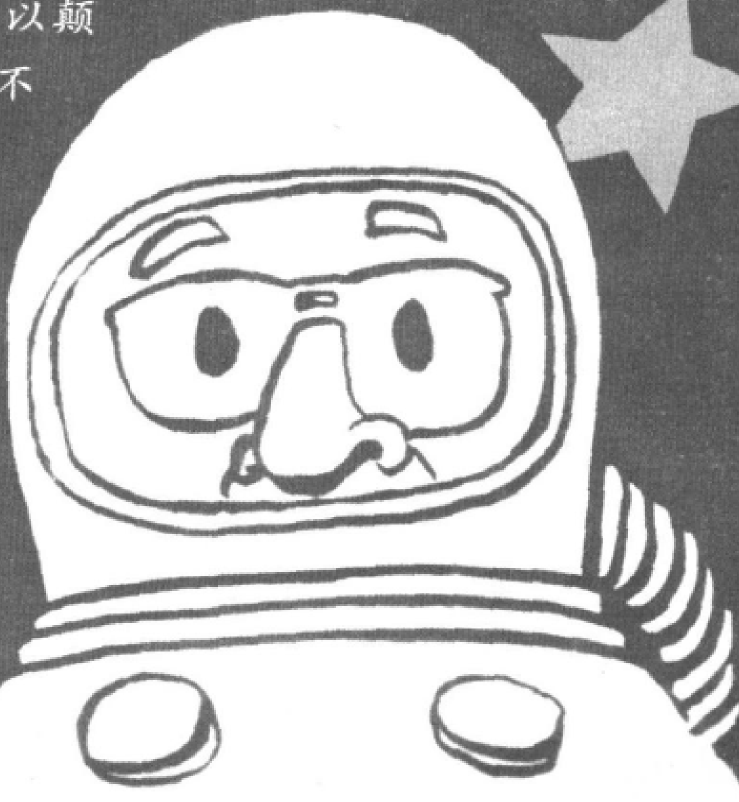


其他计算机的计算已显示，说出所有由20个英语单词所组成的可能的英语句子得花费10万亿年时间——是已估计出的地球年龄的2 000倍。从这一点来看，任何一个你所听到的由20个单词组成的句子过去曾被人说过将是极为不可能的。同样的计算可以针对不同长度的句子得出同样的结论。同样，当一种基本的语法规则被违犯时，说话者并无必要对其进行复杂的系列分析来指出其语法错误，而是马上就能确定这种语法错误。



通过对说话者的输入－输出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人要想推论出他如此自如地使用的微妙而复杂的语法规则是不可能的。

普遍语法，即由生物学必然性所奠定的任何自然语言所共有的一系列特性，是一个丰富的、高度清晰化的结构，这个结构对其自身的使用有明确的操作限定，虽然去想象我们违反这些语法规则是相当容易的。把纯粹数学的操作方法运用到句子之中，我们就能得出任何数量的[组句]可能性，例如颠倒一个完整句子的词序，或者将首尾的词加以调换，这样并不破坏合乎语法的句子。但是，在自然语言中，这种状况并不出现。没有一种语言在结构一个问句时，只是简单地把一个陈述句的词序加以颠倒。但是为什么不呢？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比实际被使用的系统更为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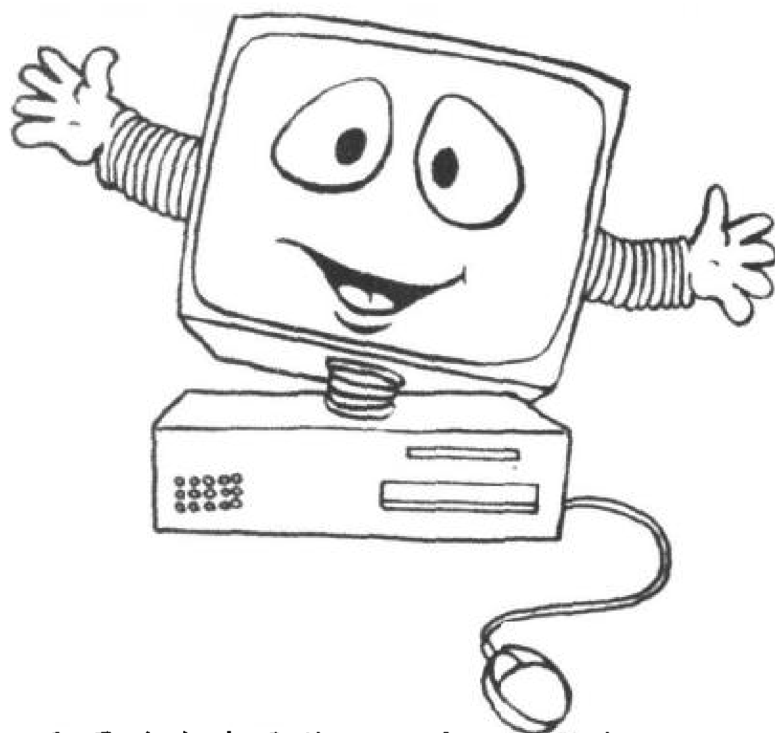
什么是源初状态的本质？
或者什么是人的本质？



一只鸟并不是被教会发出某种具体的鸣叫，也不是被教会在冬季迁徙。有许多具体行为是发展而来的，却不能归之于我们通常使用的含义上的习得这个术语名下。走路就是一个例子。几乎人类所有的孩子，在其最初的两年生活里如果不存在相对少见的无能的话，都有学会走路的能力。这种行为的被获得的方式是以熟悉而规范的公式发展出来的。起先是动用四肢来挪动，然后是爬行，然后是扶着站起来，等等。

人类也不是被教会当他们悲哀时就哭，在高兴时就笑的。性行为也是以相当普遍和可预料的模式发展出来的。在出生时，这种行为并不明显，却与生俱来地存在于生命有机体之中，在适当的时候，它就会按一种必定是预先决定的规划展开。

许多人都会同意语言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内在的东西。但乔姆斯基却坚信基本的语法本身也是内在于人的，它伴随着出生而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遗传物质中的一部分。他相信在我们的大脑区域划分中，有一个自身独立的语言中心。



在这种关联中，“被程序化”一词常被用来描述这种状况，但这样来用可能有些误导。“被程序化”这个词是一个主动动词，并常常唤起这样的问题，即是谁或者是什么在做着这个动作，谁曾执行这个程序。这完全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并不是乔姆斯基讨论的部分。这个词的用法也是当代的特别隐喻，这个隐喻把人和计算机并列在一起。对于那些相信计算机的能动性在本质和根本上不同于有感情的人的能动性的人们来说，这个隐喻可能是模糊不清和令人讨厌的。不用追溯到这种遗传物质的源泉中，这种本能的程序在儿童的发展中就会把自己展示出来。乔姆斯基试图努力通过逻辑来建立这样一个信念：人类的这些行为不是习得的，而是内在的。



从根本上讲，乔姆斯基并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过逻辑得出他的结论。观察是这种讨论的基本要素的来源，正如对儿童怎样通过极端有限的信息来习得语言的观察一样，但是乔姆斯基的主要贡献是从他应用于那些观察之上的逻辑过程中得出的，他提出问题，作出一连串推论，然后得出结论。

还有一些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可以以相似的方式，作为探寻其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成分来加以考查。人类在音乐和艺术，在宗教、道德和社会结构中的表现似乎也有它们自己的普遍本质，这种本质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自身，但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中，它们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乔姆斯基论斯金纳和行为主义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是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和政治观共同遭遇到的一个领域。

斯金纳宣称人类是些白板，完全被外部世界的影响和他们的条件所控制。他用个体环境取代了个体意志。

他说："当一种行为科学采取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策略时，那些其行为被传统归之于它的自主能力的人也就被环境所取代——在这种环境中，族类得以进化，个体行为得以成形并得到保持。"(B.F.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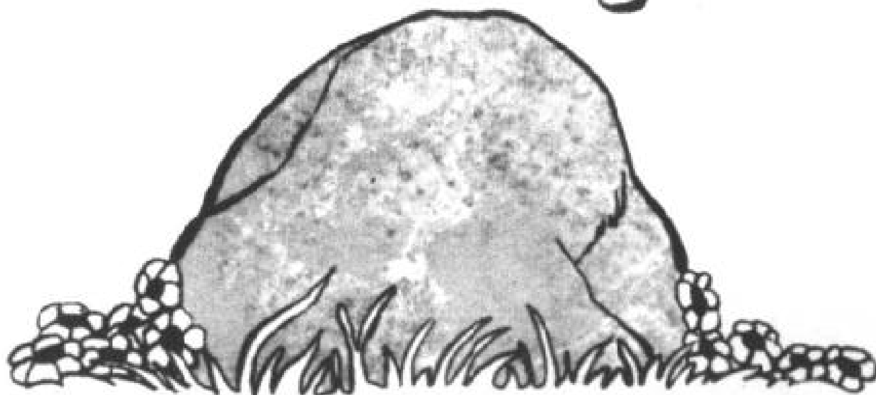


斯金纳陈述说，科学的分析总有一天会证明所有这一切，好像“那是科学探索的本性”；他关于行为是被外部事实的决定的结论也将在某一天被证实。他没有提供这种证明，但是期望你能接受他的观点。他的理论不过是隐蔽在看似科学的术语之下的信仰而已，当然他决不会把它们称为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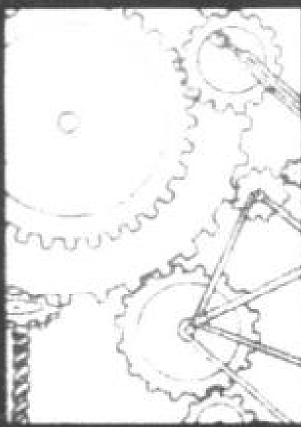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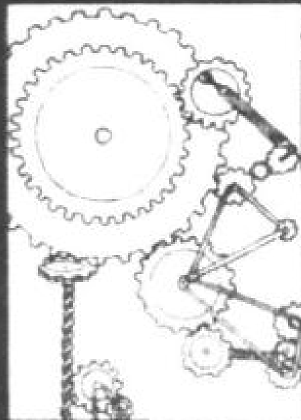
乔姆斯基通过清晰的陈述揭掉了斯金纳的外衣：



“在支持他的信念，即认为科学将证明行为完全是一种在先的事件作用下的产物方面，斯金纳注意到，物理学的进展正在于它‘排除了人格化的事物’，排除了归之于人格化事物的意志、冲动、情感和目的，等等。因此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当行为科学放弃人格的人并避免与‘内在的状况’相关联时，这门学科才能进步。毫无疑问，物理学是通过拒绝诸如石头有一种掉下去的愿望是石头掉落‘行为’的一个要素这样的观念而进步的，因为一块岩石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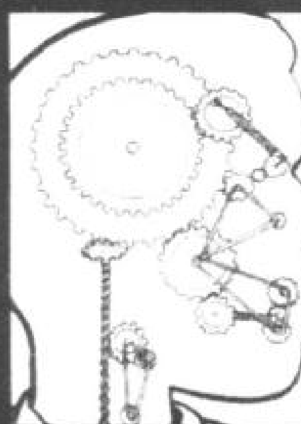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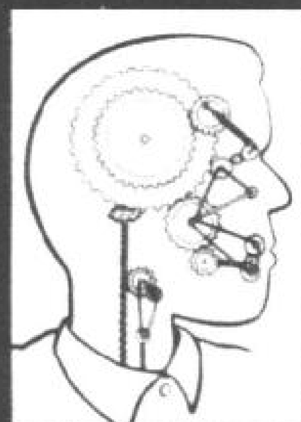


……［乔姆斯基］用了最平易的可想象的英语来结束对斯金纳的评论：

“斯金纳的意见如果要有任何力量的话，他就必须表明人并不比岩石更有意志、冲动、情感和目的的。如果在这些方面人是不同于岩石的，那么作为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就不得不考虑这一事实。”



在驳斥行为主义那种认为人只不过是一架被强制的历史所塑造的单调机器，其自由也不过如同迷宫中的老鼠那样，除了生理的满足并没有其他的内在需要等丑陋的论断方面，乔姆斯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乔姆斯基强烈地倾向于这样的信念，即人类不仅生就具有一种语法的内在知识，而且从本性上就趋向于进行自由创造的探寻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我们是接受乔姆斯基关于我们自己的观点，还是接受斯金纳的辩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是相信被告知的谎言，还是发现一些方法来洞穿它们。

如果我们没有洞穿它们，那我们就确如迷宫中的老鼠一样自由了。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入乔姆斯基对媒体的研究……



诺姆·乔姆斯基和媒体

你能相信你所看到和听到的吗？

为了使民主具有"民主性"，媒体就不得不履行两种功能：

媒体必须不带偏见地、完整地、公正地报告新闻。



媒体必须发挥公众的守望犬的功能，反对权力的滥用。

诺姆·乔姆斯基相信媒体在这两个方面都可悲地失败了。

在乔姆斯基的观点中——对这些观点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非常独特——大众传媒只不过是一种为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建立的公共关系工业而已。它的功能与其说是向公众传达信息，还不如说是在向他们兜售信息。对这一点的观察向我们展示了媒体是如何运作的精确面貌。

但是，媒体正试图兜售给我们什么呢？

必要的幻象：
宣传的科学

在其著作《必要的幻象》中，乔姆斯基向我们表明了未经我们意识的同意，那些设想自己有权控制我们的思想和意见的人们所搞出的宣传、公共关系和其他策略的历史。他提醒我们，虽然电视和报刊杂志持续不断地使用诸如“民主”、“资本主义”、“言论自由”和“平等”等词汇，但是，我们却很难听到任何关于这些词真正意味着什么或者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怎样表现出来的讨论。乔姆斯基不仅为我们撩开了宣传的面纱，而且还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思想习惯中的裂缝，以便使我们能发现有关我们自身的真理。他在做着所有这些时，都带着一颗伟大的科学心灵的理性的谨慎和一位精神领袖的道德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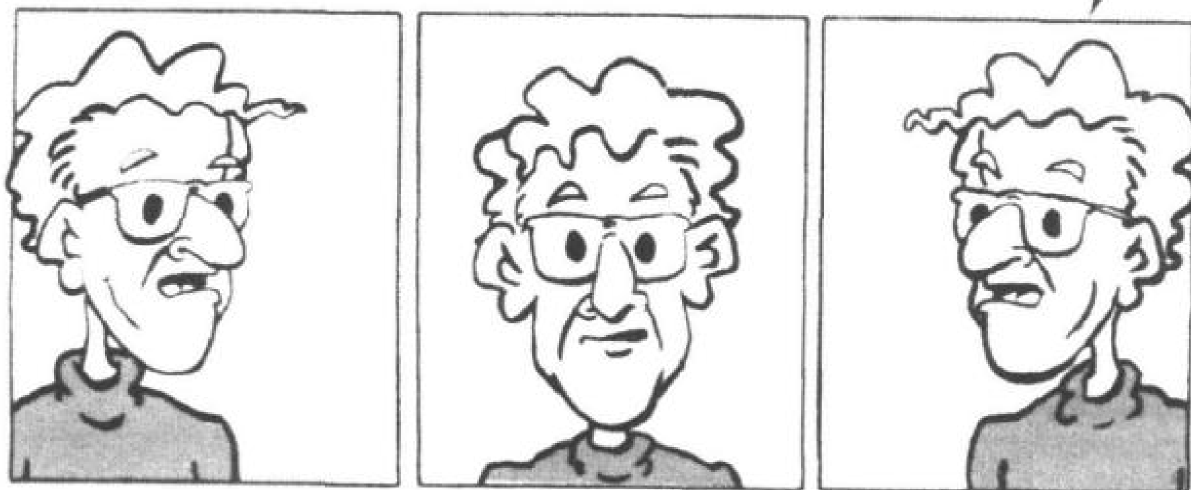


这本书的副标题：
“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
是一个典型的乔姆斯基式的爆炸性
短语，这两个概念碰撞在一起，
在美国并不常见。



我们有自由去想无论什么我所想要的、读我们想读的、看我们想看的，或者去听无论什么我们想要听的。把“思想控制”与民主社会联系起来似乎有点奇怪。

就像任何优秀的科学家一样，乔姆斯基并不随意接受任何东西，他拷问每件事情。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乔姆斯基回溯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在美国，关于什么是民主，以及什么是出版自由，有两种根本上相反的观点。

关于一个民主社会中媒体的角色的一种观点是由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鲍威尔归纳出来的。他写道，民主要求自由接触信息。



"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开他的政治责任来获得他所需要的仅为了知识的信息……"鲍威尔说。"通过促使公众去维护对政治过程的有意义的控制，出版业在影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社会目的方面执行着重要功能。"



在民主的定义中，公民应该有机会去报道自身，去参加探索、讨论和政治组织，并通过政治行动来推进它们的进程。"

这种观点是非常标准的美国信念。

但是，不幸的是——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美国的民主并非如此。



一种可取的关于媒体目的的观点是詹姆斯·米勒很好地加以表述的："媒体的角色就是'训练民众的心灵，使他们有效地依附于政府。'"（这个观点是那样阴险，以至它是值得加以重复的。）

……"训练民众的心灵，使他们有效地依附于政府"。

（……以及，乔姆斯基补充道："使他们更普遍地依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安排。"）



在这种观念中，民主仅仅服务于一小撮上流人物——媒体的任务只是"训练民众的思想"，使他们坚信那些统治他们的精英恶汉们的效能。乔姆斯基说，这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观念更为契合，正如约翰·杰伊所讲的那样：**"谁拥有国家，谁就应该统治它。"**

"事实上，约翰·杰伊的格言道出了一种原则，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合众国才被创立并被维持的，"乔姆斯基这样说。"在其最本质的方面，资本主义民主距离这种模式不可能游离得很远……"

乔姆斯基说，随着这种原则的实际运作，政治就变成了投资人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投资者竞相努力控制国家。



爱德华·伯尔内斯，一位公共关系工业崛起时期的领袖人物，说过如下的话：**劝说是民主进程的最基本要素，“一位领袖通常不能等待民众达到最普遍的理解……民主的领导人必须承担起他们控制性地赞同社会的结构性目标的责任”。**

［控制……赞同……？］

记者瓦尔特·李普曼在1921年出版的《公众意见》一书中这样写道："强制赞同"包含着"民主实践中的一场革命"，并且已经变成"一种自我意识的艺术和所有政府的常规机制"。



[……强制……赞同……?]

李普曼说："共同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完全排斥公众意见，只能由一个特定的阶级加以决定，这个阶级的个人利益超越了地域性。"

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哈罗德·拉斯威尔谨慎地反对这样的信念，即"人们就是他们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的民主的教条主义"。如果社会条件不允许有足够的强力来确保无条件的服从的话，那么由于"群众的迷信和无知"，一整套全新的主要是通过宣传来进行的控制技术就是必需的了。

莱因赫尔德·尼布尔，是吉米·卡特曾承认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乔姆斯基选择来作他的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位重要人物认为，由于“普通人的愚蠢”，他必须给这些人以“必需的幻象”以及“情绪上强有力的高度简化的东西”，以取代真理。







历史学家托玛斯·贝利为在二战之后避免非军事化辩护时说：“因为大众的明显的短视以及普遍地只有在危险已经到了他们的咽喉时他们才能看见危险，我们的政府官员被迫不得不欺骗他们，以使其对他们的长远利益清醒起来。事实上，对于大众的诱骗必须增强，除非我们自愿给在华盛顿的领袖们一只自由行使权利的手。”

乔姆斯基观点提要……



民　主



· 我们的领袖认为我们太愚蠢了，以致于不能判断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

· 他们坚信民主仅仅是为精英们——富人和有权势的人而存在的。

· 他们相信“谁拥有国家，谁就应该统治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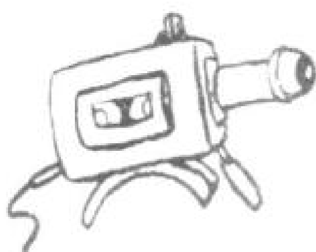
政　治



· 政治学不是关于选举或民主的。

· 政治是那些通过竞争来控制州（国家、地球……宇宙的诸投资者集团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

媒　体



· 大众媒体无非是为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服务的一种公共关系工业。媒体的工作就是去“训练民众的心灵”，以便使他们相信那些统治他们的权势恶棍的效用。

宣传的标靶

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宣传有两个标靶：

1. 政治阶层，他们是大约占总人口 20% 的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的人，在决策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社会管理者，因此必须给予深刻的训练，因为他们的赞同是极为重要的。

2. 另外 80% 的人被设想为执行命令的人——没有思想，只是追随。他们通常是纳税人。

虽然在公众场合，愚弄公众的必要性已经是很清楚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愚弄行为的实施者总是意识到他们在进行愚弄。





在第三世界，美国常用诉诸武力来“恢复民主”，而这事实上则意味着美国所支持的政权——不管它多么野蛮——都会给美国的投资者带来利益。在美国内部，人权传统仍然站在政府暴力自由滥用一边，所以一些精妙的技术手段被采用了：支配赞同，用必需的幻象来操纵公众意见，议会和媒体都不承认的暗中操作，直到他们的阴谋暴露于公众面前，不能不引起批评为止。然后，他们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作丑闻，当作孤立的事件草草了结。他们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办法就是选择几个替罪羊来演出一幕公众戏剧，这些替罪羊在昂贵的公众控诉之后就可以被原谅；或者把几个人关进监狱，然后再把他们释放出来，使他们体面地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或者得到一大笔钱；或者如在奥立弗·诺斯和乔·戈登·里迪的案例中那样，他们把自己的丑闻作为资本投入到新的诸如政客或媒体形象的生涯中去。





一个“丑闻”接着一个丑闻出现，然后又从公众的注意力中消失，直到再下一个偶然事件出现。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被描绘成一种越轨，一种错误的冒险，与高层官员的主流，与宪法原则，与高层整体的正常规则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会怀疑，“丑行”正是常规的事，政府操纵的真相偶然也会透过必要的幻象的遮掩物而曝光。

公众对这一切感到厌倦，他们的感觉被如此多的无意义的灌输所毁坏。他们可能感到那些宣传是虚假的，但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力量对此有任何作为。

民主的威胁

1975年，三方委员会出版了题为《民主的危机》一书，讨论"民主的可统治性"。文章把公众对决策的参与解释为一种威胁，认为决策只能是精英统治阶层的事。文中还说，媒体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的权力资源，对"一种过分的民主"，以及随之产生的"政府权威的削弱"都会有所助益。文章中说，如果新闻记者不遵守"职业标准"，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应该由政府加以规整"。





新闻媒体是一种"被引导的市场系统"——被利益所引导，同时也被政府所引导。它总是表达着同样的东西。那被"引导"着以适应一种议事程序——政治的或者财政的——的信息也是宣传。

宣传并不是媒体的唯一功能，但却是它的主要部分。并且——说得更明确些——在媒体系统内不可能出现任何与媒体拥有者相抵触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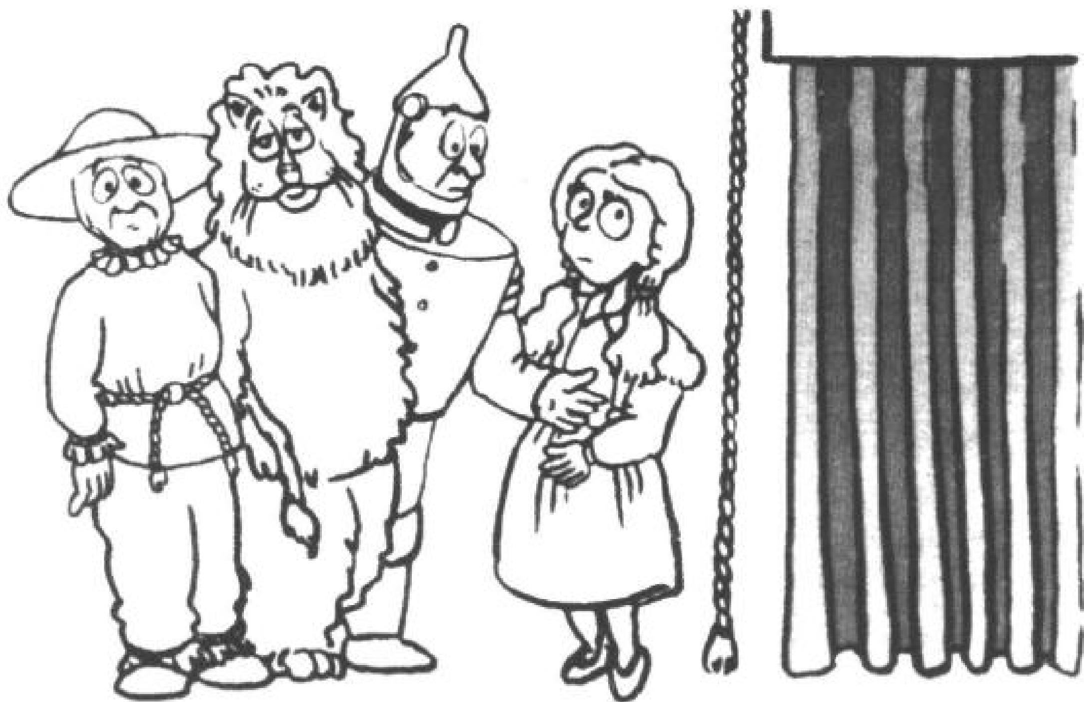


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表述：

所有权决定着[传媒的]内容。

问题在于，媒体拥有者实际上怎样“引导”媒体的内容而不留下笨拙的把柄呢？总的来说，如果媒体拥有者树立起这样的标志：“任何人批评我们的大公司或者过分同情工人阶级，都将遭火烧、枪杀或被送进监狱”，那么即使在我们这个已经变得非常被动的社会中，也会有少数人可能失去我们的头脑和坚定的目标。

媒体的拥有者怎样控制媒体的内容，而同时他们有意保留于其中的所有意旨和目的又不会被察觉呢？



“不要关心帷幕后面正在进行的事……”

宣传的模式

在《强制赞同》一书中，乔姆斯基和他的合作者爱德华·S·哈尔曼勾勒出了被他们称为“宣传模式”的东西，描绘了那种确保大众传媒扮演宣传者角色的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用传播有偏见的信息来代替新闻，甚至在不请示的情况下，做着其主子所做的事。乔姆斯基和哈尔曼说，媒体只是“在维护着那些决定着政府和私人行动的特殊利益……它们的选择、强调、忽略等通常能够通过分析宣传模式得到最好的理解”。





乔姆斯基和哈尔曼的“宣传模式”的核心是他们称之为“新闻过滤器”的东西。这种过滤器共有五层，这些过滤层把每一种“令人厌恶的因素”从任何可以发现它们的地方，从你的居室，从你的心里排斥掉。

过滤层 1. 金钱：媒体拥有者的巨大的财富，它表现为这样的事实：媒体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公司手中，媒体公司，也像其它公司一样，其存在只是为了获利。

过滤层 2. 广告，这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源泉。

过滤层 3. 依赖由政府、企业和"专家们"提供的信息。

过滤层 4. "传声筒"，是规范媒体的一种手段。

过滤层 5. "反共产主义"，是一种国家宗教和控制机器。

（当苏维埃制度解体时，过滤层5也就崩溃了。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新的邪恶帝国在维持第五过滤层。）

过滤层 1. 只有富人才能申请？

在19世纪早些时候，一些代表不为人知的工人利益和观点的自由报纸在英格兰扎根。但是到了那个世纪的中叶，这些小报都销声匿迹了，取代它们的是那些更大的实体。



当报纸市场成长，印刷技术设备也在进步的时候，在更大的市场中，竞争的代价也在增涨。

在1837年，在英格兰建一个全国发行的周报只要不到1 000英镑的投资，6 200英镑的周转金。到1867年，一份伦敦的日报起动资金要达50 000英镑。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报纸公司销售额为6 000 000到18 000 000美元。而要进入当今的媒体市场，所需的资金额就使得上面提到的数字的总和像是一名中学生的午餐费。

第一个过滤层——巨额的资金要求——对于任何一位企图进入媒体市场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障碍。只有富人——大富豪才有资格申请进入。

每一年，媒体都越来越聚集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



问题：存在多少媒体系统或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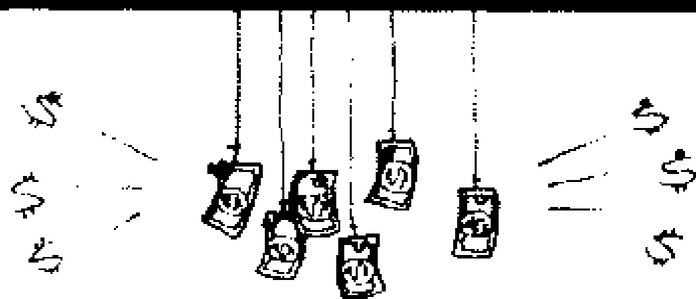
根据本·巴格迪坎于1982年所著的《媒体霸主》一书，美国至少有1 500家报纸，11 000种杂志，9 000家广播电台，1 500家电视台，2 400家出版社和7家大的电影公司，总数超过了25 000家媒体组织。这些组织中的许多是很小的，覆盖面很有限，并转播大媒体和省钱服务网的新闻。

问题：主要媒体机构是什么样的？

29家最大的媒体机构，负责着一半以上的报纸，以及大多数杂志、广播、图书和电影的生产。巴格迪坎把这个精英集团称为“能够设置全国性议事日程的新的信息和文化私有部”。

媒体拥有权正变得越来越集中：巴格迪坎说，在1982年的美国，50家公司控制着主要媒体的大部分市场。到本书出版第四版时的1993年时，这个数字由50家降为20家，并且仍然在下降。

问题：“影响媒体的因素”是什么？



与“影响媒体的因素”最密切相关的是媒体的声望、资源和覆盖面。大约有10—24家媒体公司，再加上政府的有线服务，就可以决定国家的新闻日程，并同时向多数更低水平的媒体公司提供新闻。

1986年的最高排行榜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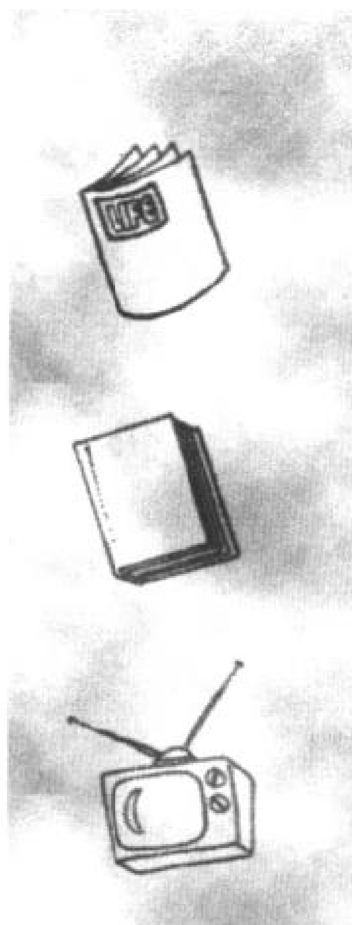
三家电视网：

- ABC
- CBS
- NBC

居领导地位的报业帝国：

- 纽约时报
- 甘尼特
- 赫斯特
- 斯克利普－加沃德
- 轻骑士
- 华尔街时报（道·琼斯）
- 奈特－里德尔
- 华盛顿邮报
- 洛杉矶时报
- 时代－镜报
- 纽豪斯（先驱出版）
- 论坛公司

日报
新闻



主要的新闻和普通趣味杂志:

- 时代杂志
- 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
- 读者文摘
- 电视导报(三角报)
-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一家主要图书出版社:

- 麦克格罗·西尔

主要有线电视网:

- 莫尔道奇
- 脱诺
- 舵手
- 通用公司
- 塔夫特
- 收藏者
- W(渥斯汀豪斯)集团

这 27 家公司被更大的集团所拥有，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些集团又归属于非常富有的人。几乎所有的排在前几位的公司都拥有近 10 亿美元的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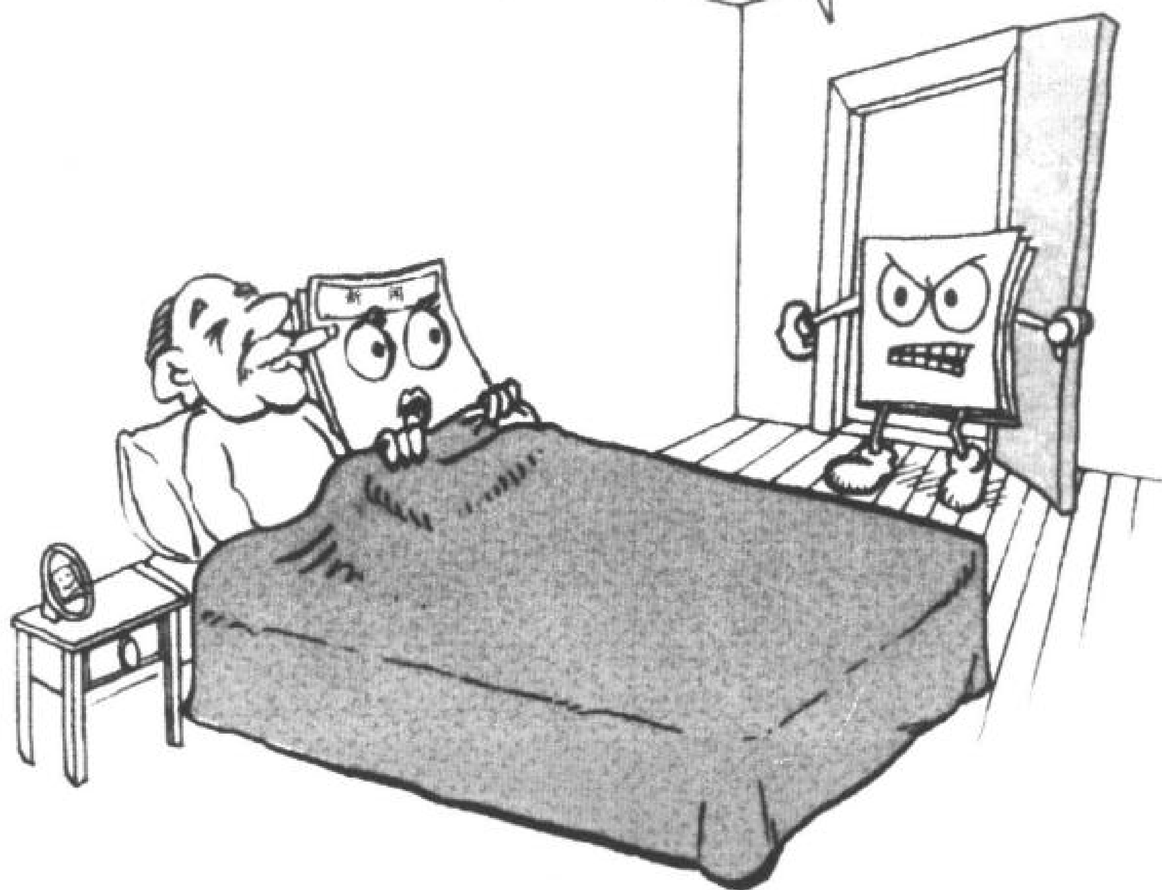
二战之后，伴随着电视的崛起和它的全国网络的建立，进入排行榜的媒体拥有者也越来越稳步地集中化。在电视出现以前，新闻市场主要是地方性的。虽然它们也得依赖排行榜中的媒体来获得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新闻。现在,电视成了公众的主要新闻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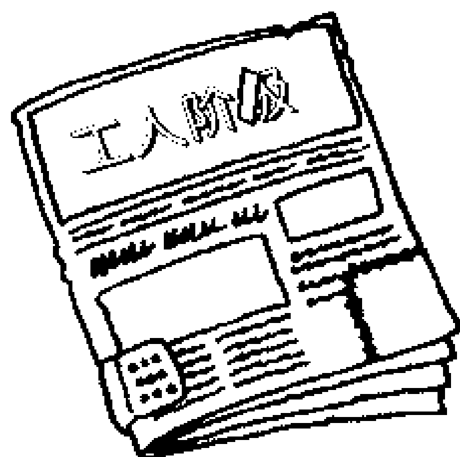
但是随着有线电视的崛起，媒体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了，形成了一种反集约化的倾向。新的电子媒体，从有线服务到传真和电子邮件，可能会使这种反集约化的倾向继续下去，那些垄断者们将很难找到有效的途径来约束新媒体的发展。

当我们接近20世纪末时，金钱仍然统治着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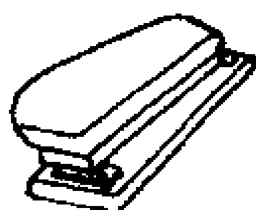
过滤层 2:广告，做生意的执照



在广告崛起之前，报纸价格不得不弥合它的生产成本。但是，随着广告客户送来大把钞票，一份报纸的市场价格可以比它的成本价格还低。这就使得报纸不能在市场之外来销售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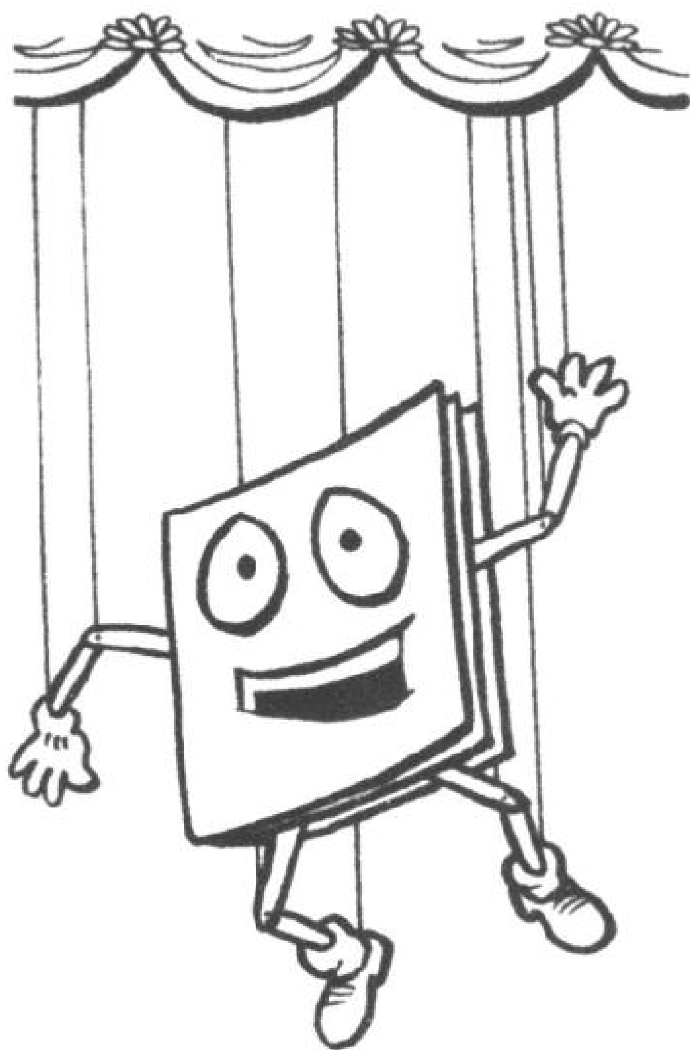
问题：广告怎样、为什么扭曲新闻？

广告使新闻扭曲，因为它使出版物与其说对它的读者负责还不如说对广告客户负责。有广告赞助的媒体可以降低媒体的价格，然后又可以扩大低收入读者的市场。大量的[广告]收入增加了竞争、生产和改进自身的能力。

广告客户从出版物的广告中了解到，迎合富人的需要可以赚更多的钱，因为富人有钱可花。那些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支持其世界观的出版物在广告竞争中是处于劣势的，因为它们的读者是贫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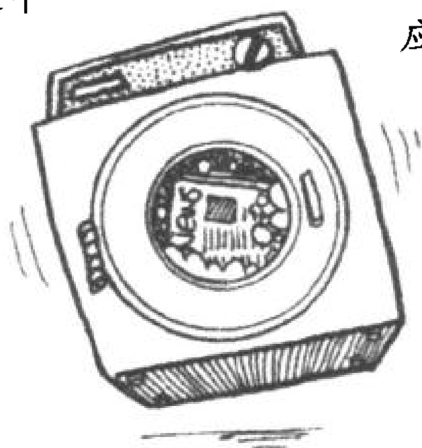
当英国的社会民主派报纸《先驱者日报》于60年代流产时，它的读者群几乎比《时报》、《财政时报》和《卫报》的读者总和多一倍。观察家认为，它的读者对它是非常忠诚的，并且只读这份报纸，而不读其他的报纸。但它所缺乏的是广告。一些分析者认为，《先驱者日报》的夭折原因应归之于劳工党的财务状况不佳，因为不再有别的可选择的参照框架来分析此事。

美国的广播媒体节目和印刷媒体一样，也是由广告客户来买卖的。广告客户对于控制媒体并不感到羞愧。



例证：

海湾和西方公司于1985年抽走了他们在公众电视台WNET的基金，因为这家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叫“渴望利益”的资料片，批评了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一份在WNET的资料说明，他们参与了反对这个节目的行动，“以便尽我们所能把这个节目净化”。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对此节目进行足够的净化，因为海湾和西方公司对这个电视台抱怨说，“这个节目即使不是反美国的，也是恶毒反商业的”，并说WNET的行为是“不友好的”，而伦敦的经济学家则说，“大多数人认为WNET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在各种公司中，一个名符其实的“过滤器”是，要么你读懂你老板的心思，要么你就被解雇。）



那些唤醒人们来关心环境和人权等问题的节目在任何媒体上，甚至在公共电视网上都是不容易被接受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由公司分流制造出来的结果。

电视网知道将什么卖给他们的广告客户，什么不应卖。你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火箭科学家，策划出那种惹恼大企业的节目，吓跑你的大公司赞助人。赞助人也同样不喜欢那种讨论烦人的、复杂问题的节目，因为这种节目可能破坏“购物情绪”。电视观众并没有被看作“公民”，而是被看作消费者。赞助人需要的是“娱乐”，这种节目极少使人不舒服，并能创造一种歌舞升平的气氛。





从媒体拥有者的立场来看，媒体的根本目的应该是销售——与此同时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过滤层 3：新闻来自何处。依赖政府、商业和“专家”提供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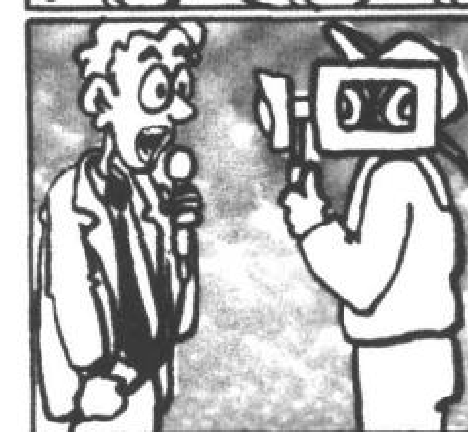


为了用新闻材料填满每日的版面，新闻媒体机构需要可靠而稳定的新闻信息来源。记者不能同时在每个地方都出现，以等待新闻冒出来，所以他们就把其行动集中在那些按常规每天都可能发生新闻的有限的地方，诸如白宫、五角大楼、国会山等等。大企业的领导人也是可依赖的新闻源。来自于这些新闻源的信息没有必要检查和加什么背景。由于提供新闻的人本身的德行，这些信息是笃实可信的。









这样就节约了许多时间、昂贵的搜寻和事实考定。新闻官僚机构与政府和企业官僚机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依赖着这些机构来满足他们在低廉的价格下获得稳定而源源不断的新闻的需要。

许多政府部门在为我们提供新闻时，它们是极有帮助的。五角大楼有一个专门的新闻机构，那里雇佣了数千人并且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

它一家提供的新闻要比那些分散的信息源加起来还要多。





相似的权力部门也在地方进行着运作，市政厅和警察局也是记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政府官僚机构也迎合着新闻机构的需要，通过提供收集新闻工作的方便、更便宜的价格、政府支持以及公司美化等等，来创造一种共生关系。

又有谁关心这些新闻经过所有这些过滤层后是否已经是“被净化了”的呢？

另外，如果你怀疑新闻的“官方描述”，那你可以向专家咨询。当然，专家也可以被大公司或者政府利用，通过诸如资助、赞助和发给他们津贴等方式被买通。



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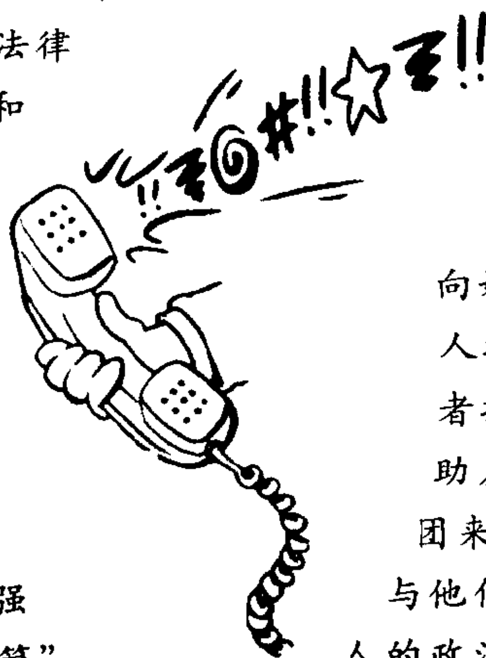
有一项研究专门对1985年1月到1986年1月的“麦克尼尔－莱赫尔新闻时间”进行了追踪。这项研究对那些出现在该节目中的形形色色的“专家”进行了分类。结果是：他们中有40%是政府官员或者前政府官员，有几乎12%来自于保守思想阵营，10%来自学术团体，2.5%是顾问，4.2%是外国政府官员，而其中新闻界人士占去了总数的25.8%。不算记者，政府官员和前政府官员占54%。

换句话说，这些“专家”不过是从原先“透露”新闻的同一个“官方来源”征募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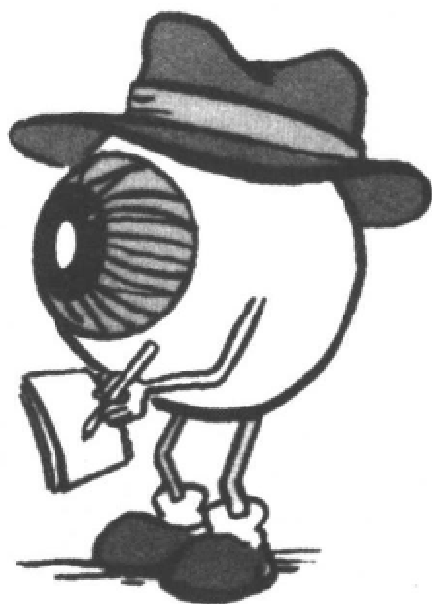


过滤层 4:传声筒

“传声筒”是内部的人用来对媒体的叙述作否定性反应的一个聪明的词汇，这个词常出现在他们的信件、电话、请愿、法律诉讼、演讲、国会提案和其他带讨伐性的行动中。从某一确定点来看，“传声筒”可能使一个媒体组织很难发挥功能。但是，不断生产真正具有威胁性的“传声筒”的能力，是和权力的大小成比例的。强权可以直接生产“传声筒”，诸如从白宫打电话或写信给中坚分子或生产者，从联邦交流委员会发出命令制造与一个特定节目相关的文件，或者使广告代理者提出恐吓或者让大赞助商要求撤去广告等等。强权也可以间接地产生“传声筒”，例如向媒体雇员和股票持有人提出抱怨，用广告或者报纸给媒体抹黑，资助左翼监听或者思想集团来攻击媒体，资助那些与他们的观点相同的候选人的政治竞选以便将来控制媒体等等。



在本世纪70和80年代，公司联合机构主办了美国法律基金会、首都法律基金会、媒体研究所、媒体和公共事务中心以及媒体准确性委员会(AIM)等机构，所有这些机构的基本目的就是制造“宣传”，以抵制那些不屈从的媒体。



媒体研究所资助媒体监督计划、会议和媒体研究。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媒体在准确描绘商业和给予商业视点足够重视方面的失误。它的工作记录，就是约翰·考瑞对媒体的左翼倾向的揭露。研究所1985年的董事会主席是史蒂文·V·西肯斯，这个人本身就是美国医药协会的高层公共关系官员。国家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则是汽车油料公司的赫伯特·希马兹。媒体和公共事务中心是80年代中期作为“非盈利、无会员”的研究机构而创立的，并被潘特里克·布坎南、弗斯·怀特莱斯和当时的总统里根所赞扬。这个中心的杂志《媒体监督》把眼睛盯在媒体的自由和反商业的偏向上。(关于媒体的最为滑稽的事是，尽管这些支持商业、支持政府、支持现状的过滤赋予媒体一种令人害怕的右翼倾向，但是它却总是被非难为有左翼之嫌。)





媒体准确性委员会（AIM）创建于1969年，它的收益从1971年的5 000美元增加到80年代早期的150万美元。其经济来源主要是大公司、基金会和公司机构的继承人的捐赠。赞助者是分布很广的大公司，包括至少八家石油公司。AIM给媒体施加压力以使其追随公司的日程和右翼的对外政策。



过滤层5：反共产主义

1988年，苏联崩溃了，这迫使人们重写美国国家的心病——作为中心宝贵原因的反共产主义，这种反共产主义在美国文化中比起赚钱来，更是一种无可置疑的价值。



尽管美国也是在革命中建立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革命这个词已经与邪恶的威胁成了同义语。俄国、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对进行统治的精英们是极端的威胁，因为共产主义会动摇他们高高在上的阶级地位。共产主义变成了邪恶的鬼怪，一切事物都以它来加以判定。

理查德·尼克松就是通过打击那些被他非难为共产主义者的在职人士而获得他最初的两个政治位置,即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这些人被恐吓所左右，对他的虚假指控也不能进行反对以保卫自己，虽然这些指控从未被证实过,但尼克松的非难所形成的恐惧和怀疑延续了很长时间,并得以把他送入白宫的办公室。虽然这种政治策略已经变得枯燥乏味，但反共产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一直保持到苏联崩溃。



苏联解体之后，宣传专家们有一种困惑,究竟什么有价值的敌人可以顶替这个邪恶的帝国的位置。萨达姆·侯赛因直接被用来为这种目的服务了。或者更可靠也更适应这个角色的形象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或者中东地区的人。他们的一般文化特征被描绘为疯狂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简洁——简洁的状态或性质:



“简洁”是新闻媒体专家给予媒体操作原则的一个名目,这种原则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削减到最小限度,以使其适合“新闻的格式”。

所有的新闻都必须适应这种格式,这种观念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假定。这种格式是美国电视在早期阶段就奠定的。它是应节目赞助人的要求,围绕着每数分钟就来一次的“商业间断”而建立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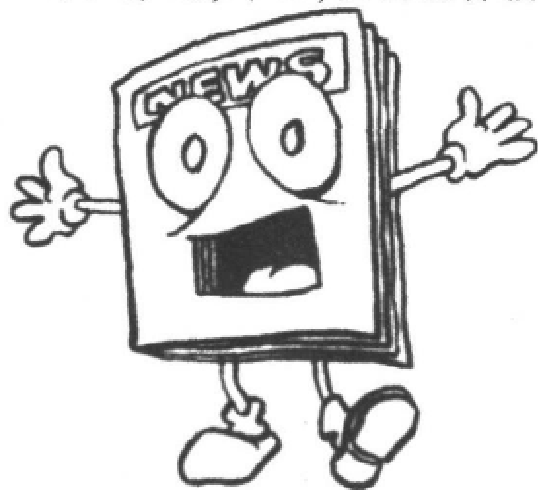
商业间断占去了所有播映时间的1/3，而任何个人要在我们的大众媒体上详细地讨论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午夜热线”的制作人杰夫·格伦菲尔德这样说：**“‘午夜热线’给我们中的一些人提供6分钟的时间来回答问题，给不会说英语的人也给予这种机会，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通过简洁原则，可以确保只有保守的观念能够通过媒体的过滤。因为每个人用心灵获知的观念是不需要证据的。如果你说苏联入侵了阿富汗，那是没有人和你争执的。但是，如果你说美国入侵了越南，那你将被要求为此提供证据。大多数美国人从不认为美国在越南的行为是一种入侵。但是，根据乔姆斯基的看法，这种侵略和对阿富汗的侵略是完全相同的行径。但这种观点与美国媒体居主导地位的观点正好相反。入侵越南，根本就不是美国词汇的一部分。



控制住羊群，使它们规规矩矩

在媒体系统内部，那种牧羊人的本能确保合适的视点被保留下来。记者当然并不是有意识地扭曲新闻。如果他们采纳了那种“正确”的世界观，那么，他们就会按别人期望的方式来写。



无论谁为报纸撰稿，他都必须按那张报纸的编辑定的调子来写。如果走得过远，稿件就会被砍掉。无论谁忽视这种规则，那他就不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不要出错——有规则在。这些原则比起服药的规则和交通法规来，更有严格的强制性。这方面的证据就在那些出版物中。

不要简单地接受乔姆斯基的话——要亲自检验



乔姆斯基将科学的客观性和共通感的明了性加以卓越结合的一个最了不起的例子，就是他用一个新闻与另一个相比较来估量其对媒体的重要性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非常简明，也很优秀：他其实就是估量不同主题的版面和比较相似主题的版面。

你可以以不同的途径来运用这种方法：这种报纸或杂志认为什么新闻报道是最重要的？（是否存在他们重视某种报道而轻视另外的报道的模式？）

报纸“A”怎样与报纸“B”、“C”、“D”……相比较呢？

（了解哪份报纸和期刊在“讲真话”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他们是否把最大的专栏版面用于那些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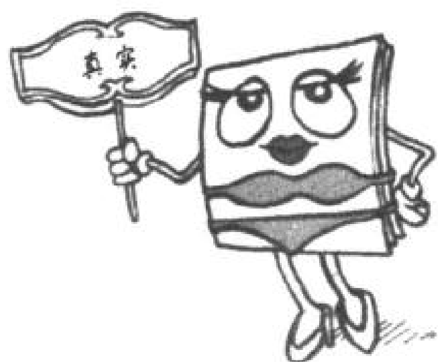


这种方法用于电视新闻也同样有效——你只要计算一下分配给每个主题的广播时间就够了。不妨一试，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让你真正睁大眼睛来看电视网的"真正价值"究竟是什么，去看看（例如）一个主要由军火制造公司拥有的电视网所重视的东西和一个从属于食物和烟草集团的电视网相比较（或者与那个因其把大笔的钱捐给以色列而出名的公司的电视网相比）有什么巨大的差异。"新闻"是非常个性化的，可以"校正"过来以适应拥有者的需要。

那些希望仍然被雇佣、仍然保有为一张大报工作的特权、仍然保有他们的雇佣资历清白无污的人，就会抓住这些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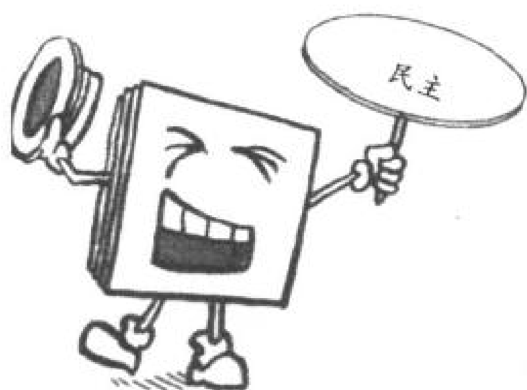
"经过一件又一件事，我们发现保持一致是一条平坦之途，是通向特权和声誉的道路；不屈从则会付出个人的代价。"



我们在这一部分讨论媒体，是伴随着一种觉醒、一种认识和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而开始的。

媒体的功能并不是向公众报道信息，而是向公众兜售信息。

这个真理引申出一个问题：媒体正试图向我们兜售什么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的媒体在兜售如下观点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正是我们掌握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某种充满意义的层次上，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民主社会。最后，它已向我们兜售了一些完全奇妙的幻象：



幻象 1：我们的国家并不被少数富人所拥有、掌握和控制。

幻象 2：我们的媒体不被少数富人所拥有、控制和掌握。

幻象 3(这是最危险的一条)**：**我们的观点是自由形成的，而不是被强迫、被欺骗或者被操纵以与少数富人的设计相一致的。

但是我们漏掉了某种东西。有一些别样的东西，我们的媒体从未兜售给我们：漏掉主要的演员，以及把与现实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一种伪造的历史塞给我们。乔姆斯基一如既往地直率地指出：







那样丑陋的必须用神话来掩盖的历史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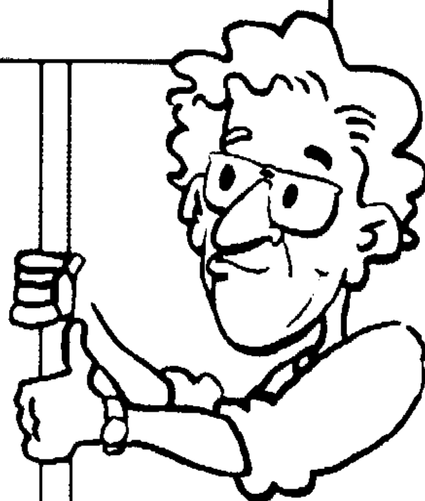
那些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就不会支持它们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的政府那样小心谨慎地隐藏起来的政策究竟是什么？

乔姆斯基论政治



为了清晰和方便起见，本书把论媒体和论政治分成不同的章节——但这本书的观点是：这两部分是不可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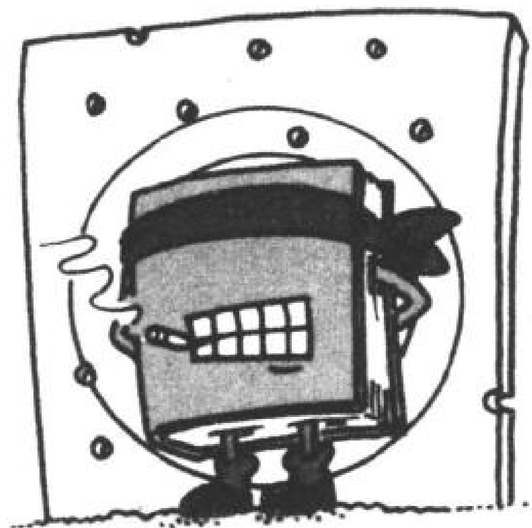
政治性媒体

没有什么能比《反革命的暴力》这本小册子中的故事把这一点展示得更为形象的了。

1973年，克劳德·麦考莱比，一位华纳标准图书公司的出版人，作出了一个决定，认为“水门事件”仅仅是美国整体衰退的一个征兆，所以他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来展示他的观点。丛书中的一本平凡的小册子叫做《反革命的暴力》——由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尔曼撰写。“这本书的主旨是，在试图压制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美国已经变成反对当地人民的主导性暴力来源。”(引自本·巴格迪坎的《媒体霸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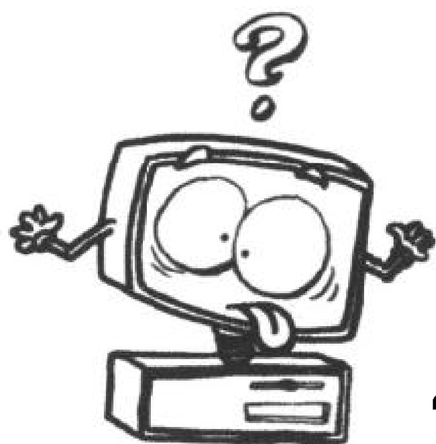
当华纳图书公司的总裁威廉姆·沙诺夫……

在我们讲述沙诺夫的故事之前，先暂停一会儿，来确定一下华纳标准图书公司（本公司正准备出版《微型图书》）的身份：该公司附属于华纳出版公司（而华纳出版公司附属于华纳通信公司，后者在西德和巴西拥有若干个工厂，并在图书、电影、广播、录像、游戏和理查德·尼克松那里获得可观的利润）。



当华纳图书公司的总裁威廉姆·沙诺夫得知在他监管下的一个分公司正准备作广告、印制和出版乔姆斯基-赫尔曼的书，便臭骂了麦考莱比先生一顿，取消了广告，命令解散了已宣布的图书编目，停止了印制，并毁掉了所有已被印制出来的书。

言论自由并没有机会来反对政治、媒体和金钱。



当你听每日新闻报道时，

你是否感到它并未进行“计算”？

它并未特意制造这样一种感觉……就像有些东西被漏掉了？





当乔姆斯基揭露说媒体遗漏了一些东西时，日间新闻忽然做得完满起来。有时候，媒体遗漏一些特别的事（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但更为阴险的是（因为它影响着我们看每一件事的方法），他们忽略掉完整的概念，没有这些完整的概念，我们的世界将是一塌糊涂。被我们的媒体假定为不存在的诸概念中的一个就是这样的现实：西方的民主仍然被分为贵族的和贫民的，统治者的和被统治者的……



在这种现实中，他们喂给我们的是……



无阶级社会的神话



有一个广为流传并贯穿美国史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认为，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民并不分为社会的和经济的阶级，在这里，每个人都是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如果你相信这个传说，华盛顿特区有一座大白房子，我们很高兴卖给你。）曾几何时，我们有过国王；在此之前，我们可能还有过游牧的领袖。社会阶级的分层包括农夫、商人、地主、高贵者，贵族和皇族。今天，我们则有总统、部长们、独裁者、经理们、官员和产权拥有人等等。变化的只是名称而已。无论你把它叫做什么，世界仍然被分成我们和他们。



我们应该把今天的统治者称作什么呢？在你认为美国是个好地方的时候，好好想一想，你就会发现……













在美国，自本世纪60年代起，中产阶级有萎缩的趋势，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经济繁荣和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普遍在下降。那些从中产阶级队伍中掉下来的人被迫急剧勒紧他们的裤带，但是对那些不再参与经济系统的增长着的低收入阶层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处于度日如年的生存挣扎之中。

假装我们处于一个无阶级社会已不再可能。
抱定那样的信条就是选择被蒙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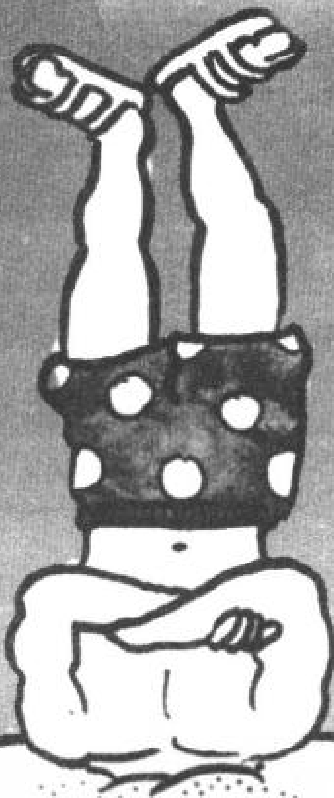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把今天的统治者叫做什么呢？他们可能并不是昨天的贵族的遗传继承人（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但他们确实是贵族的历史继承人。他们倾向于进行统治。



对许多人来说，“统治阶级”这个短语听起来有点过份的马克思主义味，或者请上帝原谅，有点共产主义味。无论你怎样称呼它们，今日的统治者，当你把闪光灯对准他们，他们就神经紧张。他们知道媒体的力量。有些人倾向于认为不存在统治者，并把这个问题从他们自己的内心中排斥出去。但如果所有的美国人并不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在我们接受来自政府的利益方面也不平等——念头闪过你的心灵，你就能认识到在社会中存在着阶层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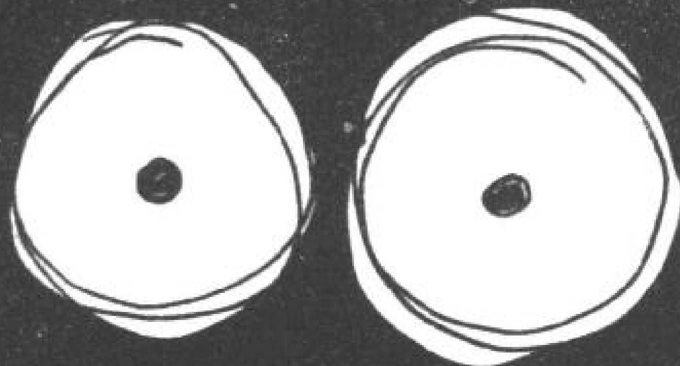
如果是这样，那么从定义上来说，就有一个精英阶层。如果这个词是冒犯性的、太马克思主义味或者太别的什么味的话，那随你高兴替换什么都可以：老板、大人物、操纵者、上等阶级、主人，等等。



（或者，你选择把你的头藏在沙子里，并不想给他们命名，继续假装他们并不存在，那也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讨论他们，那我们就不得不给他们命名。统治者这个词比任何别的词都要恰当。

这些统治者是谁？



他们是投资银行家、董事会、政府办公室的掌握者。世界权势的中心是在美国，但绝不意味着它完全是美国的。它是一批国际精英，它是现代世界的贵族。圈内人物主要是秘密地进行操纵，同时在政治舞台上安排迷惑人的活动。在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方面，他们是极端有权势和极端训练有素的。

但是他们并不是万能的。他们也只是人。

在美国，仍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个人自由。统治者只是极少数。他们所害怕的是那沉睡的巨人，公众——人民——这沉睡的巨人即将醒来，并如奥威尔所说的，取得对“两耳之间的空间”（即思想——译者）的控制权，并切实地使用他并不知道他拥有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统治者要对宣传投入那么多努力和金钱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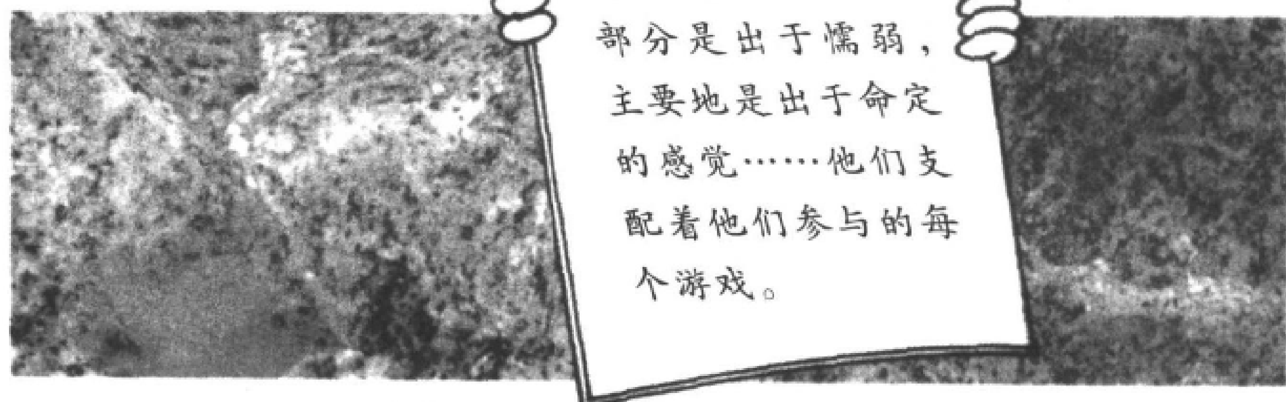




他们知道，如果公众弄懂了他们的游戏，他们就完蛋了。

无论控制系统有多么巨大并压倒一切，它也是由人创造的，并不是万能的。它很自然地从历史的逻辑中，从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从殖民地时期国家和企业的同伙人那里成长起来。

当然，也从贪婪中生发出来。



为了富人的福利

自由市场制度的神话



在美国，“自由市场制度”被作为一个神圣的原则加以对待。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被说成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功能加以救治，也就是通过自然竞争，可以产生最好的生产，最好的价格，并使改良成为普遍盛行的。自由市场总是导致最好的选择并将流行于最完善的社会。但是如果对经济系统怎样发挥作用，谁在付税以及税款是怎样花掉的，谁得到资助而谁又没有等问题进行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自由市场不过是一种理论——它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

在自由市场中，税法的复杂系统、公众钱财的政府操纵、诸多的规则以及其他变化多端的富于魔力的技巧会确保某些企业将会昌盛，而无视自由市场是否支持它们。



换句话说，自由市场制度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

美国的经济，说白了，也不过是暗中操纵而已。

自由市场的观念，用于经济学教科书和蒙蔽公众，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是真正的(经济)设计者已经很长时间不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只支持某些工业的原因。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公开进行的。资助，经常是很大数目的资助，被以多种方式隐蔽起来，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保护"的项目来进行的，仅此一项就占去每项税款的一半。此外，通过一些税收结构的微妙的渠道，税款流向主人想让它们去的地方。



为富人谋福利——它是怎样运作的



在其执政的第一年里，克林顿总统在波音公司对工人们发表演说，他告诉那些兴奋不已的听众说，波音公司是“全美国公司的一个典范”，是“美国与亚洲关系新视野”的好例证，“现在，仅中国就在这家公司所生产的每六架波音飞机中购买一架”。与此同时，克林顿宣布了一项决定，冒着违反国会法律的风险，向中国出售克雷(Cray)超级计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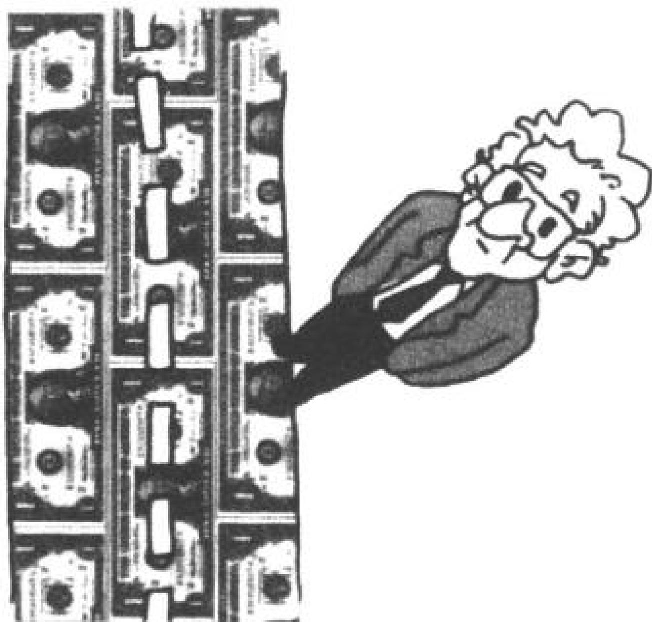
克林顿用来庆贺自由市场体制成功的这个例证是可笑的。因为，飞机制造和计算机工业是建立在(并依然依赖于)高税保护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为富人谋福利。波音公司和克雷超级计算机公司的幸存，有赖于巨额的政府资助。农业也是被保护和资助的。高技术工业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受到五角大楼的资助。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有一个使美国郊区化的项目，乔姆斯基说：

“在保护的掩盖下，建立起了现代汽车和空中运输工业这样的经济核心因素，而公众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数以万亿元的税款被用于这项庞大的政府社会工程计划……”



1944年、1956年和1968年的联邦高速公路法案，耗去了数亿美元的税款，建立了一个国家高速公路网，而这个法案不过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主席阿尔弗雷德·斯隆头脑的产儿。这项计划使得美国的经济依附于以汽油为动力的运输上，赋予石油工业一种实际的能源独占权。这种依附性甚至导致了像海湾战争这样的事件，这个事件使数万伊拉克人丧生，目的是确保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控制。



美国的郊区化并不是为了产生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的自由市场驱动的结果。它是那些控制我们国家的大公司运作出来的。例如，在1936年到1949年之间，国家城市运输网公司就是一个由通用汽车公司、汎世通橡胶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赞助投资的联合公司，它买进了包括纽约、费城和洛杉矶等在内的45个城市的100个地面电车运输系统，并把它们拆除掉，然后用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面包汽车取而代之。



1949年，通用汽车公司和它的合伙人被芝加哥地方法院起诉，指控他们在这项计划中共谋犯罪，并处以5 000美元的罚款——这甚至还不如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轮胎外侧的保护盖上掴一耳光更有效果！但是事情并没有改变。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面包车畅行无阻，而电车却成了历史。（这种不光彩的调换术的粗俗滑稽，可以由下面的事实得到充分的展示：在过去的20年里，通用汽车公司的每次车展都要用到电车的形象——以展示“未来的趋势”。）

向石油产出国出售军火也是一项设计，以支持由公众赞助却由私人经营的波音公司，克林顿却把这样的公司称为“自由市场的典范”。



“公众赞助”、“政府资助”……？
这些术语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真的，其实很简单。

“资助”一词只是一个婉转的说法，其实就是由一个大公司来操纵，以便为富人谋利益。

这些“政府资助”确保了一项制度，通过这项制度，来自石油生产的利益会流向美国和英国，而不是石油生产地区的人民。让我们回顾一下 1977 年 4 月向伊朗出售先进武器的努力吧。《纽约时报》说：“向伊朗出售先进武器的主要原因是，五角大楼要确保波音公司生产线的畅通。”

当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总统乔治·布什 1989 年参加一次秘密会议，以确定萨达姆·侯赛因的另外 10 亿美元的防卫债务（虽然，财政部和商业部都说过伊拉克没有信用价值），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国务院坚持说，给萨达姆增加贷款是公正的，因为伊拉克“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和平进程是有影响的”，是“确保这一地区的稳定、给美国公司提供重大商业机会的关键”。



除了在世界统治者的利益方面维持“稳定”的一种特殊形式外，五角大楼还必须继续为纽特·龚里奇和他富裕的选举提供更为丰富的东西，当然是通过资助高技术工业来进行了。自战后初期至今，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因为企业界认为飞机制造业是由公众资金和战时暴利的所得建立起来的。在一种纯粹的、无竞争力的、无资助的“自由企业精神”的经济中，它是不能完全存在下去的，这样，政府就成了它们唯一可能的拯救者。（引自《商业周刊》）



蝾螈*叔叔的双重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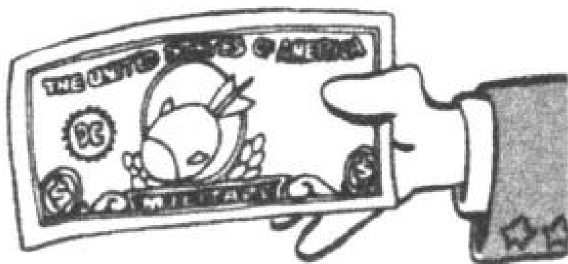


纽特·龚里奇的“与美国结盟”是一项计划，此计划是为了从“自由市场”的双重原则中获得好处而设计的。公众资助富人，这是自由市场为穷人定的原则。纽特叔叔的计划就是寻求削减社会开支，包括教育、低收入住房，补贴租赁（他对居民轻蔑的称呼），拒绝帮助“未成年母亲”的孩子，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福利——但同时却为富人不断增加福利。

*：纽特（Newt）在英语中的意思是蝾螈。



为富人谋福利，源源不断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意向鉴定”优惠（仿佛“意向”已使资本减少似的），还包括投资资助。增加的财产免税、减少健康和安全常规税，更多的减价预留折扣，以及当然，还有“增加的年费开支”——明显地是财政预算中最大的项目。



［《克林顿的视野：一份近事录》，Z 杂志，1994 年］

乔姆斯基说："国家防卫是一个病态的笑话。美国没有面临威胁，却仍然花费着比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的'防卫'费用"。





如果美国并没有面临威胁，但仍然在"防卫"方面花费比全世界的防卫费加起来还要多的钱，那你或许感到好奇：

五角大楼把这些该死的钱
都用到哪儿去了？



新殖民主义……
友好的独裁者……
顾主的国家……
换句话来说……



我们推广民主！

殖民主义——过去和现在

在今日世界运行的权力结构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的直接后裔。控制今天的我们的制度，只是500年前把当地居民逼入屈从境地的控制制度改良后的翻版而已。或者更精确地说——因为进行统治的精英集团从未做过他们自己那肮脏的工作——控制今天的我们的制度只是操纵、控制、诱骗一个国家的没有权力的公民去强迫另外一个国家的没有权力的公民进入屈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之中。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一位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他于1776年写道：“美洲的发现和经好望角而形成的与远东的通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也最重要的两大事件……”

斯密诚实地相信，新的交流设施的建立——观念的，文化的，贸易的，人类能量和创造力的——将给旧世界和新世界双方带来好处。”

但是，没过多久，斯密就认识到他是大错特错了。



“欧洲人野蛮的不公正制造了一个事件，它本该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却几乎把那些不幸的国家给毁灭和解体了。对于东印度和印第安的当地居民来说，那些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商业利益在他们偶然遭遇的可怕的不幸中沉没和消失了。”

那么欧洲人从这次事件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斯密说：**“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势，他们可以在这些遥远的国度，不受惩罚地执行任何形式的不公正。”**



谁称谁为“野蛮”？

但这都是已经过去的可恶的时代了。

在那样的时代，善良的人也会被腐蚀。

那时的人们不像我们今天的人那么文明，对吗？

对外政策：友善的独裁者和顾主的国家

1979年，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尔曼写了一本叫做《华盛顿的关联与第三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的书，描绘了从1960年到1978年在拉丁美洲18个国家所进行的军事接管。这本书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使读本书的任何人确信，美国政府在这些军事接管的每一次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



美国的"对外政策"——如果你相信媒体散布出来的谎言，那你就不可能理解它——很清楚有其自己的模式。

但是它在推广民主方面却什么事也没有做。

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不仅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伊朗、希腊、菲律宾，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只占极少数的几个国家），美国都支持过野蛮的、压制民主的军人独裁政权，其目的在于建立和保护"顾主的国家"。



乔姆斯基和赫尔曼这样来定义"顾主的国家"这个词：

"基本的事实是，美国在赞助和保护的名义下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主要由恐怖分子统治的新殖民主义的顾主国家体系，以服务于一小部分地区、外国商业和军队精英的利益。其基本信念和意识形态伪装则是，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和人权，虽然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偶有失误。"

真正的新世界秩序——它是怎样开始的

现在的世界格局是二战后，当美国发现自己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大地位时凝结下来的。美国逃脱了那场毁掉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战争的巨大灾难，而战争的刺激使美国的生产增加了三倍。自然，任何试图利用它新建立起来的强权的计划，美国都不会放弃。



1948 年，乔治·肯南，一名国务院的计划人员，写下了《政策计划 23 条》，解释了自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所保持的军事的"顾主的国家"制度背后的基本理由。

这份文件说："我们有了世界财富的 50%，但只有世界人口的 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成为嫉妒和仇恨的对象。在即将到来的时期，我们的任务就是设计这样一种关系模式，这个模式将允许我们保有这种悬殊……要达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抛弃同情和白日梦，我们的注意力不得不随处集中在我们的急迫的国家目标上……我们应该停止讨论模糊不清……和不真实的目标，诸如人权、生活标准的提高和民主化。"



1950年，在给驻拉美国家的大使的任务讲解中，肯南警告外交官说，外交官必须防止一种危险观点的传播，这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对其人民的生存负责”。为了同这种观点斗争，肯南说：“在当地政府的警察施加压力之前，我们应该毫不犹豫……最好是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制度，而不是一个沉溺的、松散的，被共产主义者所渗透的制度。”任何持有政府必须为人民负责这种危险观点的人都被美国高层官员视为共产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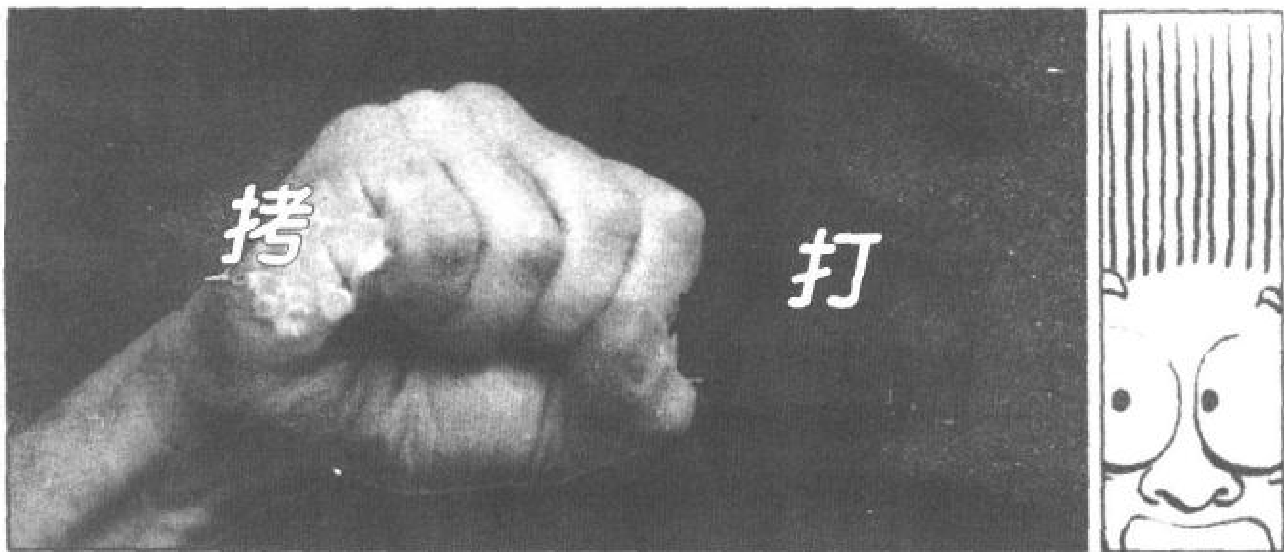


新世界秩序的真正目标

其实，真的很简单：美国只有世界6%的人口——但是却拥有世界财富的50%。如果它需要保持自己的利益，或者最好是不断增加它的财富——那么美国就不得不强迫世界的其他地方接受它的压倒一切的统治。自然，当战后许多国家在重建，许多不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时，在财富方面保持占上风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很清楚，唯一保持其财富的途径就是“殖民主义”这条老路。



（这条消息正在导致一种更清醒的认识吗？）



拷打

残忍的暴力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最丑恶的一种就是拷打。在过去的300年间(如果不计算黑人或者妇女的苦难的话)，拷打在西方是相当流行的。一份1975年大赦国际组织的“关于拷打的报告”中列举了26个国家，这26个国家都把拷打作为“管理的基础”或者作为“统治的主要模式”。

这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是他们对于拷打的偏好却是这26个国家与美国在军事援助、警察训练或者军队人员管理中唯一的共同之处。

拷打不仅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被美国的“利益”所容忍，而且美国政府还训练和装备人们去实施它。

它把他们训练得很好……

1973年，美国在智利支持军事政变后，大赦国际派人了解受损失的情况。大赦国际的报告中陈述到：“许多人被无休止的鞭打、拳击、脚踢和来福枪托击打等拷问致死。狱中的犯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就连头部和生殖器官也被打伤。犯人们的尸体在里约·曼普考被发现，有些尸体毁形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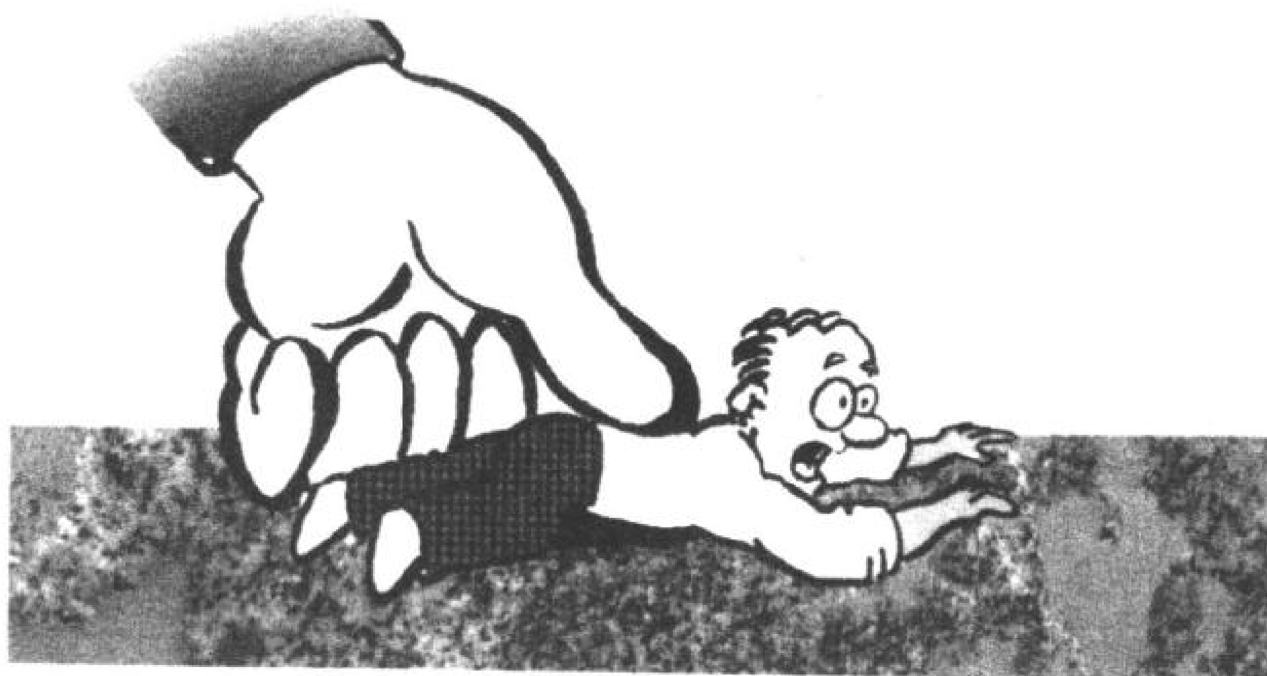
我们不断听到的这些"美国利益"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美国的利益既不是你的利益,也不是我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公司,这些公司拥有着其他民族国家的资源。

……如果你问:"你怎样才能拥有其他民族国家的资源,什么给予你那样的权力?"

……如果你认识到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残忍的暴力",

……那么突然间,这条消息开始使你醒悟许多。



美国"公司的利益"是以美国军队的武力为背景的,这个背景同时也为那些拥有其他国家资源的美国投资者的利益服务……对于这些国家的当地居民来说,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他们的土地和资源被外国人所拥有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当外国人的所有权归结到近于奴隶的劳动力,强迫性的劳动条件和充满罪恶的贫困时,那是不可能保持和平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以想见,反抗会遭遇到最为残酷的镇压。















因此，在这些极为方便的价值体系下，美国被判定可以使用最极端的暴力……来“恢复民主制度”……

……因为“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我们被告知，共产主义是民主制度的对立面，自由的对立面。

但是，是谁的自由？

是那个国家自身的大多数人的自由？

还是极少数美国投资者的自由？

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中，我们的领导人判定拷打、恐怖、暗杀、敢死队……是正当的。

他们有良心吗？
他们质问过他们自己……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为"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死去呢？

美国对外政策的这方面——我们的广泛的屠杀和对他国当地人民的冷酷——是我们的媒体不愿去张扬的。



但是这样的借口就足以使人忽视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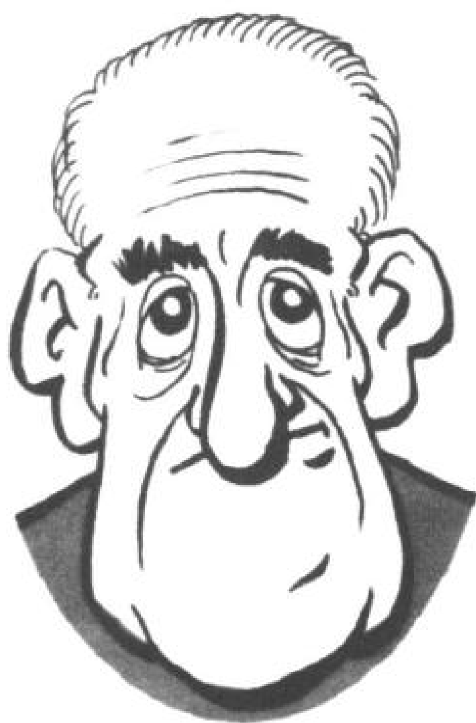
在某种意义上，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去证明它，甚至对它采取行动吗？



如果你被冒犯的话，那好……
从没有人说乔姆斯基很安逸。
乔姆斯基说出了真相。



历史：
他们忘记告诉你的二三事



乔姆斯基对历史的解释，是不同于那种出现于中学教科书或者《纽约时报》上的官方历史的。被他们加以广泛讨论的事实是相同的。但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在本质上却是不同的，不仅如此，还有许多事实是你在《时代》杂志上从来读不到的。

例如，当《纽约时报》的记者莱斯利·吉尔伯说到约翰逊总统“1965 年圆熟、决断、成功的接管和对多米尼加共和国重新民主化”时，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上中学时，你可能被教诲应该对你的课程相当熟悉，所以最好是不要提问并暴露你的相反的看法。

但是对“重新民主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提出疑问是不是就太过分呢？

特别需要追溯一下“接管”这个词的历史。

那么发生的究竟是什么？乔姆斯基在他的《扭转潮流》中，比出现于主流报纸上的东西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如果你愿意超越每日摆在你面前的新闻的话，那么这些事实就能得到确定。在大众市场之外，有许多书和杂志的信息是可靠的。许多事实也可以通过主流渠道泄露出来，但是，你必须去阅读诸多的材料，然后把所有这些材料和事实加以总结，以便发现那些媒体内部成员不愿意向你指出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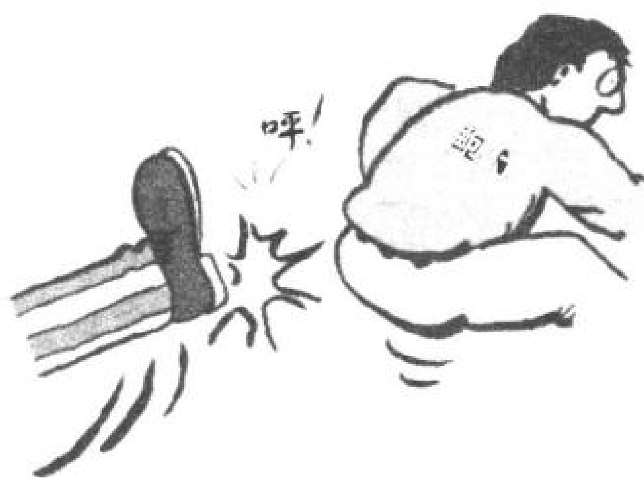
例证：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多米尼加共和国被它的总统特鲁吉罗和少数公司所统治。特鲁吉罗拥有该国家经济的65%—85%，远远大于他的同盟者所占的份额，他的同盟者对他越来越厌倦……所以他们便派一些坏人去暗杀他。特鲁吉罗是一个未成熟的花花公子，他给肯尼迪政治的完美的修辞风格带来了一些困窘……所以肯尼迪派中央情报局去谋杀他。这件事很快就完成了，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他，但的确是某些人安排杀了这个贪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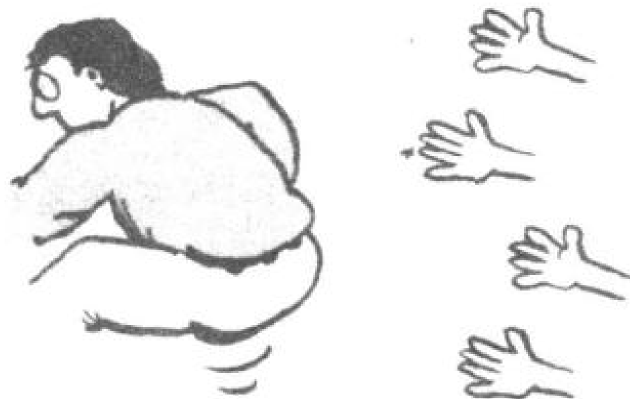
1962年，该国进行第一次自由选举，**琼·鲍什**被选为总统。鲍什制定了一部民主的宪法和一个法律体系，以反对腐败，保卫公民自由，迫使警察收敛，削减高层官员的薪水，杜绝官府的跋扈作风。鲍什的改革在帮助其人民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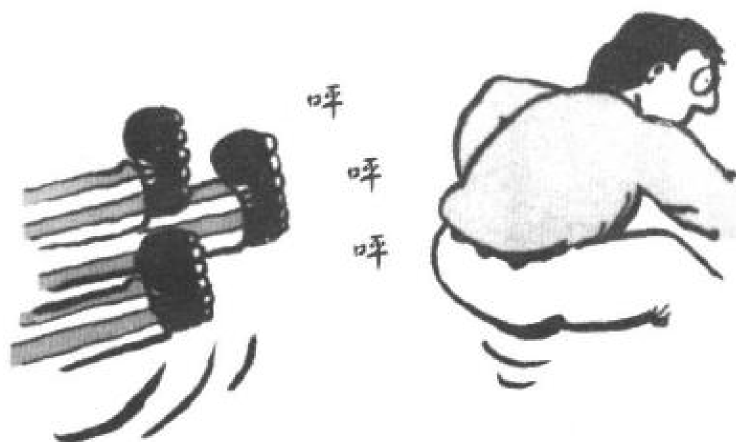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这些却激怒了“美国的利益”。在鲍什执政七个月之后，军队推翻了他。美国决定（正如美国大使所表达的那样）“让他流放”。通过调整对被推翻的民主选举的政府的厌恶情绪，美国给军人政府以全面的支持。一度在那里受到民主的威胁的美国的利益，现在再度得到了安全保证。

为民主而保证世界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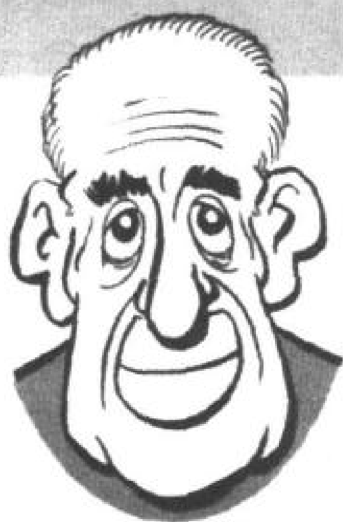
腐败卷土重来，经济衰退，在你能说“美国利益”之前，这个国家就恢复到了鲍什改革以前的那种赤贫和腐败状态。当然，没有人看透这样的事实：即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民尝到了民主的滋味，不会让所有这一切顺利进展。人民站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推翻了残暴的军人制度，并且恢复了鲍什的权力——民主重新回到了这个国家。这是一个极为精彩的故事。



但是此后，美国派去23 000名士兵，帮助腐败的军人政权镇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民。



多米尼加共和国选举的政府再一次被推翻了。对美国商业利益的威胁被搬掉了，世界又一次对于贪婪者变得安全。



乔姆斯基说："结果是通常的那种：敢死队、拷打、镇压、广大人民的那种不断增加的贫困和营养不足、奴隶般的劳动条件、大批的难民，以及给美国投资者提供的卓越的机会。美国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控制达到了新的高度。"

而全美国的报纸则叫嚣说，约翰逊总统派遣23 000名士兵"去寻求和平"。

这本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美国在整个第三世界政策的范例。

危地马拉

雅各伯·阿尔本兹是1951年危地马拉被选举的总统。他的土地改革为农民增加了生产，提供了食物和金钱，并且在该国400年的历史中，使他们第一次参与到政治制度之中。但是阿尔本兹在适应其美国伙伴方面是过于诚实了。

他试图征用联合果品公司掌握的土地，以便能给予无地的农民一些土地。阿尔本兹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以便不欺骗任何人，并把征用税付给联合果品公司。但艾森豪威尔的副国务卿是一个不可能被



愚弄的“聪明的家伙”，他说，危地马拉通过容许共产主义者的公民权来玩“共产主义者的把戏”。在阻止共产主义掌权的借口下，表现颇佳的老中央情报局推翻了危地马拉民主选举的政府，恢复了军人统治。

“土地改革被撤销了，它的利益被剥夺了，农民合作组织被解散了，民主的进程被挫败了，经济崩溃了，劳工组织被毁灭了，而杀戮开始了。”



这里的屠杀被鼓励、被资助，美国为此持续付了许多年的钱。危地马拉的主教会议说：“我们的国家从未达到过如此极端的程度，暗杀已经沦落为种族灭绝。”

乔姆斯基论尼加拉瓜

一位尼加拉瓜北部的法国牧师和护士训练者向国际法庭证实，在尼加拉瓜，一个残废人“杀人取乐”，强奸妇女取乐，并把尸体的眼睛挖出来；一个年仅 15 岁的姑娘被强迫在洪都拉斯的康特拉军营作妓女。他还证实，康特拉通过掠持、强奸、谋杀和拷打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



对此，《波士顿环球报》只用了 100 个词的消息来报道这项证言。

而《纽约时报》则只字不提此事。

“由美国掌握的康特拉武装力量在尼加拉瓜的所作所为，或者我们的恐怖代理人在爱·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一般的屠杀，最主要的是残忍的、虐待狂式的拷打——把儿童摔打在岩石上，把妇女的双脚吊起来，割掉她们的乳房，把她们脸上的皮剥掉，以致她们流血死去，把人们的头砍下来然后插在树干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击败独立的民族主义和可能会把有意义的自由带回来的民众的力量。”



乔姆斯基论诺列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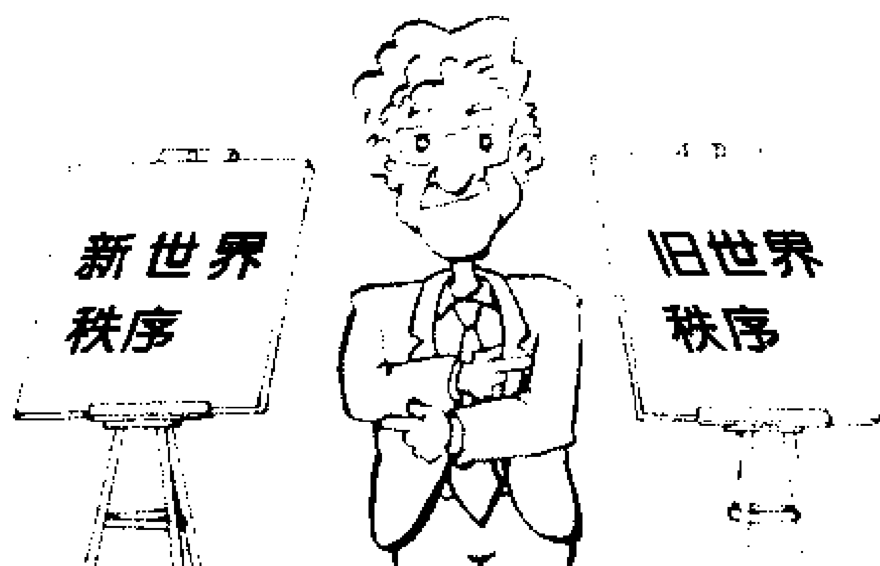
“诺列加的生涯揭示了一个普遍的模式。这是很典型的，当美国支持的恶棍和盗匪在他们的生涯中变得过于独立和过于贪心，以致超过了他们的利用价值，就会有像诺列加那样的结局。除了掠夺贫民和维护商业环境之外，他们开始干预美国的自然联盟、地方商业和寡头政治，甚至直接干预美国的利益。达到了这样一点，华盛顿就开始动摇；我们开始听到过去一直被忽略的对人权的侵犯等消息，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在某个时候把他们搬掉，甚至试图暗杀他们，就如同在特鲁吉罗的例子中那样。在 1986—1987 年间，问题仅仅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把诺列加干掉……”



乔姆斯基论中东和恐怖主义

在“新的世界秩序”（它其实和“旧世界秩序”一样）下，必须确保石油储藏的财富流向西方，而不是流向那些生产石油的中东国家——更确定地说，是不要流向生活于这些国家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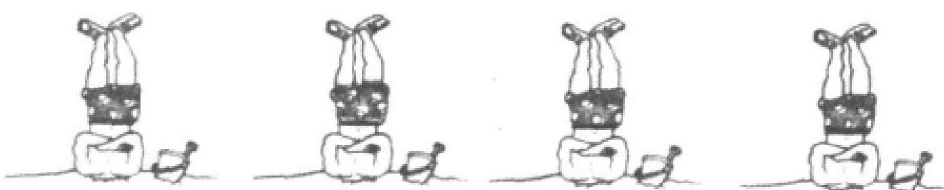
这种“安排”——如同“外部利益”从土生土长的人民的资源那里获取巨大的利益，而与此同时这些人民自己却生活于水深火热的贫困之中的每一种情境一样——被实际地加以保护，以使其延续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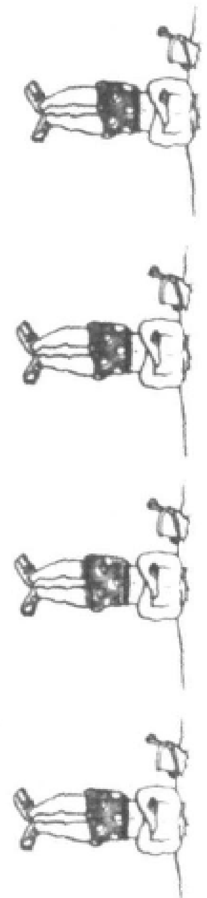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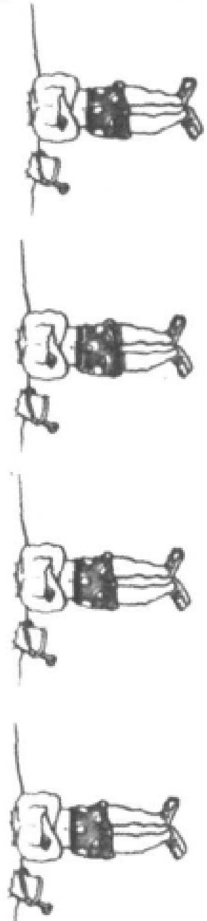
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实际上所有美国政策的标准判断是共产主义扩散的威胁。今天，当这个替罪羊失去之后，政府正在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戏剧脚本来演。乔姆斯基说：“在现实中，‘对我们利益的威胁’总是中东地区或任何地方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这一事实不仅在内部文件中，而且有时在公开场合得到强调。”

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增加了他们自身的特殊问题。以色列站在它自己的立场上，挑拨和激化美国与伊朗、美国与伊拉克、美国与叙利亚——美国与每一个阿拉伯、穆斯林或者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乔姆斯基说：“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宣传竞赛也有其滑稽的因素——甚至抛开将美国文化与伊朗在其原教旨主义基础上进行比较的事实。世界上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是与美国联盟的沙特阿拉伯。或者说得更仔细一点，在像‘阿拉伯面纱’一样的家族专制的后面，美国有效地控制着阿拉伯半岛。”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有当它变得“超出了控制”，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或者“过度民族主义”时，才成为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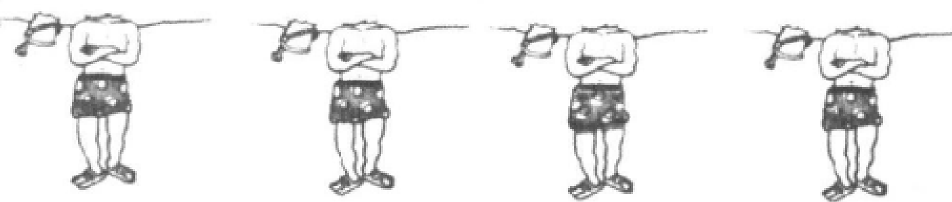






恐怖主义。这个被美国权威所使用并被媒体追随着加以接受的概念的定义扼要来说即为当别人来做时是恐怖主义，我们来做时则不是。拷打、残害、炸弹、用刀把许多家庭赶入带刺的铁丝围栏中……这些都不是人们喜欢去考虑的事实。

我们越不愿意了解这些事实，他们就越容易被掩盖。



一个难缠的问题……

如果暴行、残忍的杀戮，以及其他反人类的罪恶是由你的政府执行和资助的，那你愿意知道吗？



"对一个人自己的社会的本质和行为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常常是困难的和不愉快的。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答案往往是隐蔽的；之所以不愉快，则是因为答案往往是丑陋的……而且是很痛苦的。要了解这类问题的真相，就应该诉诸于行动，而这行动却是不易承担的，并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个人代价。相反，平易的路则是去屈从权势，避免探索问题，接受由宣传系统锤炼得炉火纯青的教条。这无疑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易于取胜的主要原因，因为，一般的倾向是保持沉默，或者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和它的盟友的行为，而与官方的教条保持友好的接近……同时去责难国家的敌人们的真实的或臆断的罪恶。"





在其被暗杀前不久，马丁·路德·金曾作过一个令许多人心动的讲演，他说："最大的暴力供应商正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乔姆斯基赞成这种观点。在一本接一本的著述中，乔姆斯基细心地积累了许多应该直接归因于美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的例证——这些罪恶是用你的税款支付的。



美国残忍的"对外政策"对每一位还有点良心的个体都是一种伤害。它使美国所企图支持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一种嘲弄……在此过程中，它几近于毁掉一度非常强大的美国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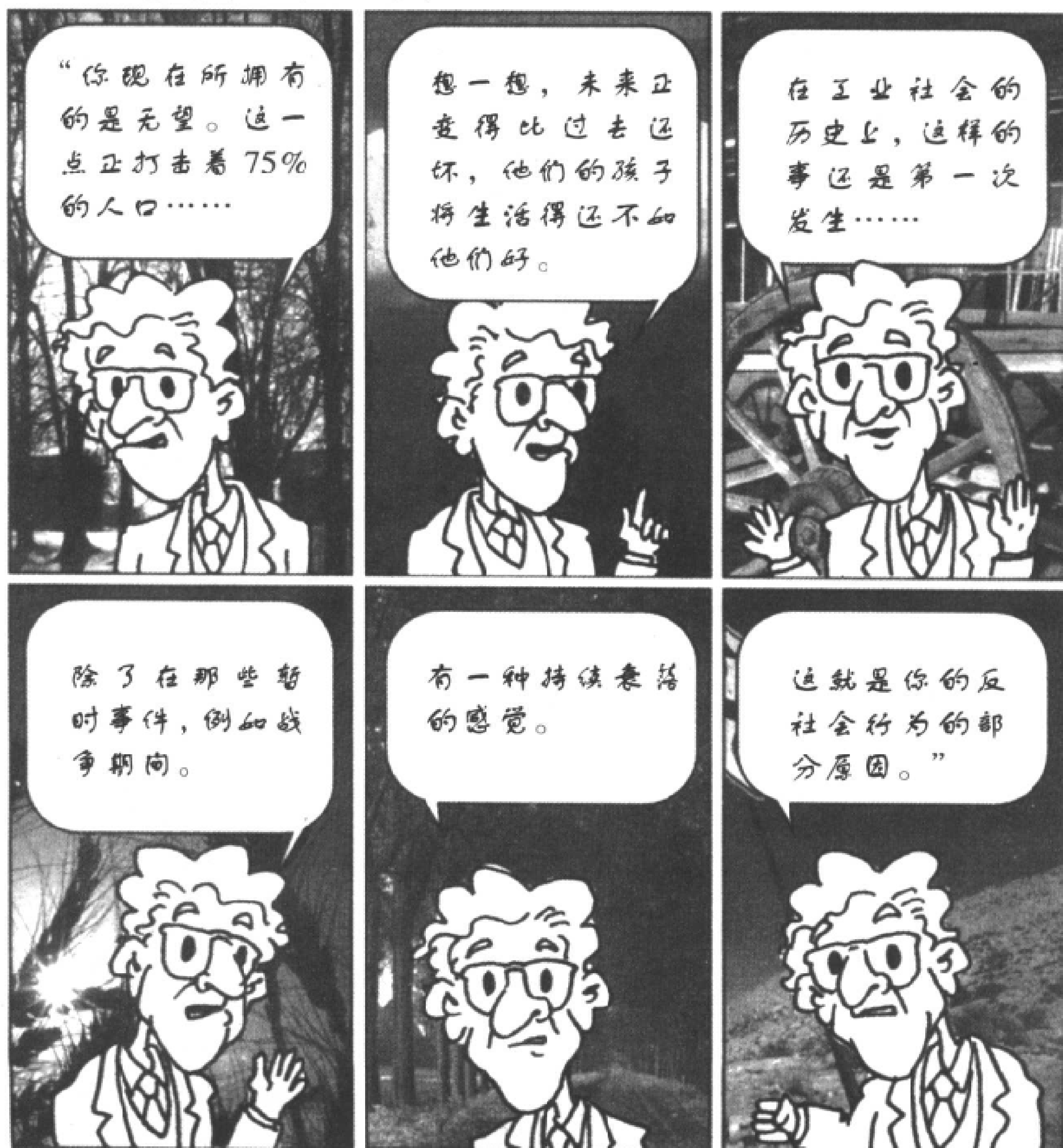


战后的美国是工业社会中经济增长的一个典范，它引来了遍及世界的嫉妒和竞争。中产阶级在50和60年代持续发展，这看起来像是资本主义能够怎样发挥作用的范例，并且似乎把大多数人与资本主义产生的繁荣关联在一起。与此同时，里约·格兰特岛的南部和墨西哥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例证。那里只有很少的富人阶级和庞大的生活极端穷困的阶级，而几乎没有中产阶级。战后美国的承诺就是：自由市场体制将产生出如此巨大的繁荣，以致这种繁荣将会把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带动起来共享繁荣，或者富人的财富会“慢慢减少下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美国的经济结构看起来越来越像第三世界的那种。



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的资源越来越多地通过潜在的渠道流入少数最富有的人的手中，这已是一种不断加速的趋势。今天，借助于国际贸易协议，少数富裕地区在利用贫穷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方面变得越来越自由。在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工作机会正在流向海外，一种与第三世界相似的阶级结构正在得到巩固。

（在紧接这一章的采访中，乔姆斯基对这一重要问题有更详细的论述。）



[《乔姆斯基采访手记》，斯宾，199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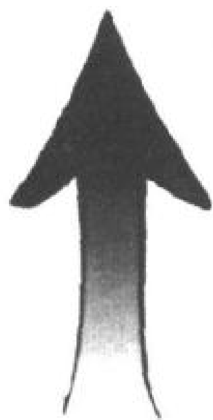
乔姆斯基论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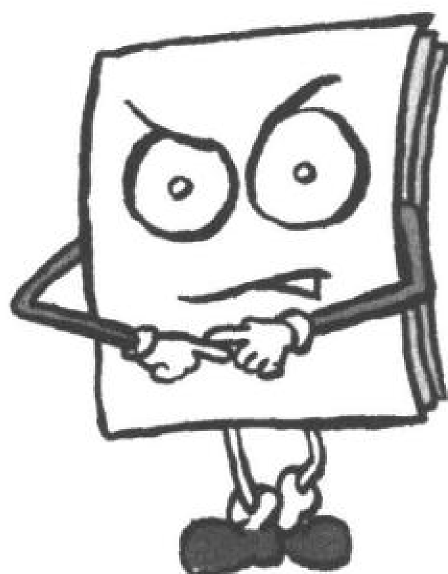
个人能做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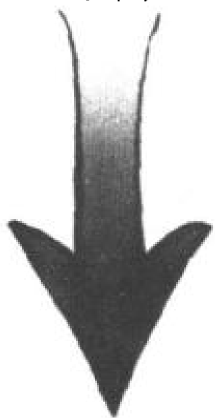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诺姆·乔姆斯基用一个陈述句洞析了这个充满着复杂性的世界，帮助那些想在这个复杂而危险的世界上正确行事的人们抵抗那种笼罩在头顶的无望，这就是：

“你要为你行为的预期结果负责。”



如果你不反击，“你的行为可预料的结果”就会更是如此：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并且这种状况会不断加剧。富者和有权势者仿佛在执行着上帝的命令，杀戮着第三世界的民主和人民，扶植那些能与美国利益做生意的独裁者，用由你付款的武器和军队去掠夺、拷打和枪杀无辜的人民……并且，他们将利用媒体来谴责那些牺牲者，以致于





我们也谴责那些牺牲者，甚至当那些牺牲者和我们同属一个祖先，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和朋友的扩大的家庭成员时。

思想自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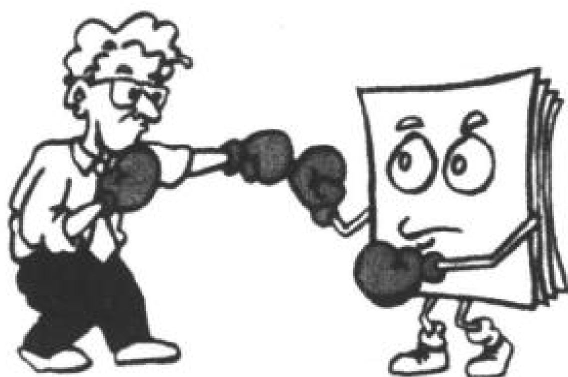
最重要的事情是训练你的心灵，使你不致受骗。练习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提出质疑，被动的接受是一种危险的习性。

质疑一切……



每一天都给你提供了练习你的批判能力的机会。注意什么是被说的，什么是真正发生的。你经常要与媒体的形象相遇。如果你注意你所听到的，并留心是谁在为“由××带给你”的东西付账，那么你就能读懂那些字里行间的东西。





最终，你的生存可能依赖于你怎样对你所看见的一切进行解读。人类生就具有可敬畏的感知和理解他们的环境的能力，这些能力只有参与到生存中，才能更强有力。当你发现你的生存受到威胁，你的能量就会聚集起来。

常常冲你而来的零敲碎打的思想模式强化了片断的思维，并且打断寻求某种结论和探索现象背后的东西的思维训练的尝试。但它并不妨碍你在心灵深处对事物的思考，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能假设你正在被告知真理或者那些你内心里最感兴趣的东西。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样的假设是过份天真了。

如果你仔细倾听，并锤炼你的批判能力，你就会大大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或者，你可以选择仅仅玩世不恭，这样你可以与权力掮客们保持相安无事的关系。但是，谁又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成为被遗忘和被抛弃者呢？



诺姆·乔姆斯基访谈录

1993 年 9 月 14 日

[考格斯威尔] 问：你认为是什么东西使你的观点在不同层次的公众中都那样易于被接受呢？

[乔姆斯基] 答：有一种紧密的相互作用——总是这样——一方面是所谓的教育或讨论或谈话，另一方面是组织。它们总是相互刺激。

接近人的主要问题是，从定义上来说，那些对既定的机构和它们的所作所为持批判态度的人们，除非在某些边缘地带，不会从既定机构中获得资源，也不会由既定机构达到目的。它们（机构）总是不会自我毁灭的。由于这种情况，你不得不去建立可选择的机构，而这个可选择的机构就是指组织。看看这个片子。（《制造赞同：诺姆·乔姆斯基和媒体》，由马克·阿克巴和彼特·温通尼克制作。）我没有看过它，但我推测它是谈话影片，这样的交谈是可能的，因为它有着普通的组织结构。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这种复杂而不断增加的团体，在所有种类的话题上做文章，围绕着这些话题把人们聚在一起，他们既需要谈话者，同时也为谈话者提供机会。这样的场合，如果做得恰当，就会激起更多的兴趣，得到广泛的听众。小报纸成长起来了。团体支持的电台发展了。在行动和组织中，人们之间有了相互作用的机会，包括谈话、写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对这种相互作用给以更多的刺激。这是历史上每一次运动的发展途径，不管它是美国革命的背景，是废奴主义的背景，还是民权运动的背景，随你自己挑选，这就是它发展的途径。

问：你是说你还没有看《制造赞同》这部片子？

答：实际上没有。我看过副本，但没有看过片子。

问：很遗憾没有把它纳入系列片中。

答：噢。除了美国以外，在我旅行过的许多地方，它都得到了很多的放映。去年我有幸访问了许多地方，在我去的许多国家，人们告诉我，他们在自己国家的电视台上看到了这个片子。

关键在于，如果人们是以个人的方式，或者以一种孤立的方式接近的，那肯定收效甚微。在美国有许多有趣的事，甚至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一方面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因而只有很少一点政府控制，事实上，用比较性的标准来衡量，政府控制也明显很少。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社会，人们的独立达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程度。这是一种控制技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独自一人坐在马桶前，那你想什么是无所谓的。

问：你曾经说过，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关于我们政府机构的本质和我们的历史黑暗因素的知识有了巨大的进步，例如，关于历史上对美国土著居民的集体屠杀。你认为这种公众觉醒仍然在发展吗？

答：此时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短时间来看，去年或者过去的两年，以我的观点来看，是令人相当压抑的。但是长时间来看，例如30年，我想是在发展。历史总是有升有降。

问：你对去年的选举的意义有什么看法？以你的观点，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吗？

答：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去年的选举是一次投票对抗。克林顿在美国近来的历史中，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克林顿的得票，不仅仅指百分比，就是投票人的社会经济奉献也和1968年休伯特·汉弗莱相似。没有任何原因来制造任何幻象，他是相当诚实的。他把自己作为一个保守性的人推出来。他正成为他们所称的“新民主党”。他不是那种被关于居住、权利、福利、社会问题以及诸如此类

的自由幻象所俘掳的人，但他企图成为一个商业候选人，一个商业集团候选人。他对此也直言不讳。

问：可以这样说，他是你所谓"假想的叛逆者"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代表一个被想象的选择。但是，处于狭隘地划定的游戏领域，它确保了掌管美国的真正权力不受任何威胁。

答：你不能谴责他不诚实，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有实业倾向的保守派，他也就是这样的人。我想，之所以缺乏广泛的支持，支持率很低……是因为，我想你知道，许多人不喜欢布什，所以有许多否决票。但是我想人民正在寻求某些东西。

从这方面来说，佩罗的参选是非常有趣的。当佩罗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那是1992年春天，他连一个讲演台都没有。他只是说："看着我，我是个富翁，并有一双大耳朵——投我的票吧！"但在之后的一到两个礼拜，他已经和主要候选人平起平坐了。我认为他们投的是米老鼠的票。根据对公众观点的研究，甚至那些投克林顿票的人也是非常不满意的。

问：你对多尔怎么想——他是以军事集团为背景、并被认为支持环境保护的吗？

答：多尔是另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例如他非常讨围绕在新共和党周围的人们的喜欢。我的意思是，他有话可说。我并不知道关于环境的话题背后是什么，但是也不过如此。克林顿的军事计划是布什的军事计划的一个自然的扩展，没有多大的变化。

问：克林顿的对外政策与布什相比怎么样？

答：基本相同。我的意思是总有一些变化会发生，但这是因为世界在变，经济也在变。专心国事的人们与过去相比，在支持军事干预方面的愿望锐减。布什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问：你认为海湾战争对这次选举有什么影响？

答：好。你知道，海湾战争激起了一股军国主义的浪潮以及极度的恐惧。这是一个被惊吓的国度。这一点很有趣。正是在这段时间

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我到了这个国家最军国主义的和保守的地方。在那里，我仍能得到邀请，并看到了那里的人们是多么恐惧。这在欧洲已经被注意了很长时间。欧洲的旅游工业每两年都要衰退一次，因为美国人害怕到欧洲的城市去。其实在那里，他们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安全100倍。关于这一点，有许多的笑话和幽默，并且很奇怪。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海湾战争期间，人们真的感到了威胁，以为萨达姆就要来了，要把他们逮起来。但这次战争之后，这一点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次战争可能对美国是有利的。也就是说，德国、日本和海湾国家为这次战争付出的钱要远远多于美国支付的。但我想棘手的问题在于，海湾战争的后果是非常难对付的，如果你看到了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话。那里有着巨大的灾难。海湾的专制和独裁制度仍然稳握权柄，一点也没有转向民主化。萨达姆·侯赛因权力稳固。他正在屠杀他自己的人民，而美国却站在背后默默称赞。这次战争之后，从根本上说，在伊拉克将有人权方面的大灾难在发展。可能会有多达10万的儿童死于此次战争后的制裁。这并不是一幅美妙的图画，不得不很快使其平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及时撤退，并开始极力宣传中东和平进程的原因，其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那里引开。海湾战争留下了一个苦果。人们看到了被制造出来的恐惧和歇斯底里。人们不得不在这次战争之后认识到，我们正在与一个没有防范能力的第三世界国家打仗。而要压制这种认识是非常困难的。

问：关于卡特派军队去印度尼西亚，帮助印度尼西亚政府屠杀东帝汶土著居民的事，你曾经写过书和发表过讲演。这确实与卡特那种普遍认为的平易、寻求和平者的形象相抵触。他是不是一个伪君子？或者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他所做的事的结果？这一行动是合法的吗？

答：这是卡特的首创。他们不仅大幅度增加流向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而且后来成为副总统的瓦尔特·蒙代尔在1978年就曾经飞往雅加达。这是最为残酷的历史时期——这已经偶然地变得广为人知了。我的意思是说，新闻界并没有报道这件事，但是有许多其他的消

息来源。确实，美国知识界知道所有这一切。蒙代尔去过雅加达。他得到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给华盛顿发回电报，要求他们应该派更多的直升飞机去那里。但卡特不能这么做，因为议会法律委员会禁止将直接的军事援助给予人权的侵害者，所以他们通过以色列用船把美国的直升飞机运往印度尼西亚。这就是白宫的首创精神。

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答：他的动机就是"稳定"以及一些司空见惯的目的。当你问卡特是不是伪君子，我没有清楚的观念。你不得不进入他的头脑把你要的东西找出来。或许他相信他做着正确的事情，谁知道呢？以我的看法，这里并没有有趣的问题。大多数人，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不是通过阅读历史来建立我们的判断模式的话，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建立判断模式，来选择什么是你想去做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中间没有人会是圣徒，在其生活中没有干过丑陋的和不愉快的事。例如，当你还是儿童时，你或许曾经从你五岁大的弟弟那里夺过一个玩具，等等。重要的是追问你自己。任何人都可以质问自己，我就经常对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但是，这确实是我所喜欢干的。"但这样做的人却极少。按常规来说，你建立起一个判断模式，这个模式确保你所做的事是正确的。这正是信念得以建立的途径。

动机是一种隐蔽不见的东西。如果你是诚实的，你可以深挖下去并把它们找到，但是更为容易和共通的经验是去建立一种判断的模式，去选择你自认为感兴趣的事。政治策略常常就是这样制定出来的。所以，一个人是不是伪君子这样的问题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卡特的动机是直率的。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有丰富的资源向外国公司开放并供开发。苏哈托，这个国家的领袖，一直在控制着这个国家。如果你想得到动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观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在一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做《501年》，其中的一章回顾了西方对1965年那次使苏哈托登上权力宝座的政变的反应。自政变之日起，苏哈托就立即实施了大屠杀。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但可能在四个月里，就有7万到8万人被屠杀。一场巨大的血

洗，《时代》杂志称之为“沸腾的血洗”。被杀的大多数人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它摧毁了这个国家中的民众组织，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它主要是个农民党。最有趣的是西方的反应，那完全是欣喜若狂。《纽约时报》把它描绘为“亚洲光明的闪烁”。《新闻杂志》则这样描绘：“它是一个曾经没有希望的地方的希望”。《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为这件事我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认为这件事是伟大的。越是沸腾的血洗，就越是沸腾起他们对这血洗更多的爱。这一点是相当公开的。这是相当有趣的插曲，关于它有许多的细节，而观点是直截了当的：这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做了辩解。事实上，美国的自由派人士这样描绘道：这次事件证明，我们有权呆在越南，因为在越南我们建立了一个保护基地，以便鼓励印度尼西亚政府做一些必要的清洁其社会的工作，并使它向西方的强盗开放。它确实是非常开放的。请看看我的引文。我在书中做了一个非常有理解力的回顾——非常令人愉快。越南战争之所以要打的主要原因，就是要防止这个区域受造反的传染。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所支持的是残忍的独裁政权，同时，我们也支持这个区域周围其他国家的独裁和政变，例如在泰国，在菲律宾支持马科斯政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所以可以确定，这就是动机。

问：你通过什么途径来断定，目前美国人对此类事件的认识进程放慢了呢？

答：首先是（美国人）贪图安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盛行。在一种可观的程度上，人们说着同样的事，想着同样的思想，你听到了同样的虚构之词，等等。而批评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就流行的趋势来考虑，我认为他们分散了更多的精力在内部事务上，这样的人很多。在我的观点中就有许多自我消解的东西。

以暗杀约翰·肯尼迪为这类疯狂事件的例子。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谁暗杀了他，而且我也不关心，但是它带来了什么变化呢？这并不是任何一般政治兴趣问题。有很多的精力和努力都投入了这件事之中。

如果有人能够从这次暗杀分析出一些普遍的意义，例如它改变了政策，或者那里有高层的参与，

或者其他东西，那么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就和杀了任何其他人没有区别。很自然，你也可能遭到枪杀，但它为什么会比新近赫波肯街上的暗杀对于流行的趋势更有意义呢？

左派——我使用概念不够严谨——流行趋势的整体趋向和反叛组织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这就是一个例证。当然还有别的例证。

问：在你的《反思卡姆劳特》一书中，你做了一个有力的陈述，以反击那种认为肯尼迪的死是因为他倾向于从越南撤军的理论。

答：这本书并不是真正关于肯尼迪被暗杀的。它是对越战进行分析的。关于这场战争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因为新近有了许多关于它的文件，这些文件清晰地表明了那里发生的事情。肯尼迪只是实施了对越南的打击，而没有在有限胜利时就结束战争的一点意向。同样有趣的是，至少我认为有趣的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研究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报告，看这些报告是令人震撼的。在这段时间里，阿瑟·施莱辛格或诸如此类的其他人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所有这些回忆者，在1968年那次使这场战争变得很不光彩的台特反击之后，完全修订了他们的叙述。美国的公司精英们在那时决定这场战争是不合算的，代价过大，让我们撤军吧。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每个人都成了这场战争的反对者，因为从上峰来的命令认为你应该反对这场战争。而从此以后，每个单独的回忆者都大幅度地修订了他们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故事。这些人都虚构了这样的故事：他们的英雄，约翰·肯尼迪，在其被刺之前，曾经真地打算从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中撤退，但是约翰逊改变了他的计划。如果你看看早年的回忆录，你就会发现没有这种迹象，我的意思是说文章上的记述。就连施莱辛格的长达940页的书中关于撤军的事实记载也没有《纽约时代》所说的那么多。它并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出现，没有。如果有什么新的信息的话，那就是他从来没有撤军的考虑。但是战争变得不受欢迎了，所以，人们不得不重写他们的故事。而且他们这样做时，都留下了令人迷惑的痕迹。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事你也可以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找到，不过这事也发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

问：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是最有意义的？人们能做什么才会使事情变得不同？

答：有许多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认为有任何真正的公式。参与到政治选举中有时是非常重要的。我本人几乎总是参加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常常会带来变化。以我的观点，国家政治常常并不带来许多的变化。有一些集团，例如新党，一些政治团体，我认为他们有一些头脑清晰的计划。他们寻求在政治选举中最终成为有权力的力量。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影响地方政治，支持任何地方的更为进步的候选人，并把他们的选举参与作为一种组织战略来加以使用。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选举上——无论它是有意义的，或者在这方面只是一种辅助。这种参与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以创造更为持久的组织，而这些组织能把人们聚集起来，并在选举之后开展系统的工作。主要的是在选举之后也要坚持工作。如果你只是参与选举，然后你按一下按钮就回家去了，那你按那按钮也不会使事情有什么变化。

问：你认为未来是乐观的吗？

答：一个人是感到乐观还是悲观，是与他们对自身人格的评价有关，而与情趣无关的。你可以发现乐观的迹象，也可以发现悲观的迹象。你怎样来评价它们，取决于你自身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没有一条客观的途径来做这件事。重要的是，尝试使你自己把乐观的东西变得更为真实可信。假设你认为，有 99% 的可能性，人类的文明将在下一个世纪走向毁灭，只有 1% 的机会不会毁灭，而这 1% 可能提供机会去做一些事。那么好啦，你可以使自己按这 1% 来行事。

问：你怎样从讨论组向无政府一工团主义过渡？

答：仅仅有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就够了。让我们不要给予它任何迷惑人的名字。一个在大的跨国公司和机构控制下的世界，只能迎合它们，而不能成为一个民主的世界，即使你有选举权。

问：你看到一些新的技术了吗，这些技术是否有助于增加信息量，成为权力分散的力量，并使社

会变得更为民主？

答：在富裕的国家确实没有。以美国为例，这是非同寻常的，和其他的富裕国家一样，美国是在保护主义的高墙下发展它自己的经济的。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国家干预，并用这种办法来保持它。例如五角大楼系统，其自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政府项目，目的是用税款资助来发展高技术工业。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与自由市场相抵触了。事实上，甚至被称为自由贸易系统那样的东西，例如世贸组织，也不是自由贸易系统。因为从一方面来看，它并不只处理贸易事务，另外，它也不是自由的。世贸组织有着极强的保护主义因素，这是那么多美国工业支持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重要的事情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并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这主要是指由通常所谓的民族经济大幅度地变为国际化经济。让我们以美国为例：30年前，国际贸易问题并不是一项很大的事务，因为民族经济与贸易相比是那样巨大，以致无人太关心贸易。也不会有关于贸易政策的大型辩论。现在，情况变了。国际经济更为庞大。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贸易。其实，所谓美国的贸易，其中有40%是在大的美国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这意味着，例如，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把它的东西运往另一个子公司，而这个子公司只是在海外而已。40%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况且它是遍及全世界的。但是在每一事件中，经济正在变得更为国际化。现在要把资本运往海外更为容易，这意味着，产品可以更容易地在任何地方的低工资区和（或）高工资区之间流通。这也意味着把第三世界的居住模式升到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的水平。而这则意味着，这些国家自己也在滑向一种第三世界的模式之中，在这种模式中，有一个财富和特权的阵营和一个基本上是多余的、不断增长的人群。这群人无论是对于生产者的利益还是消费者的利益都是不必要的。你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进行更廉价的生产，并且市场能够更容易地变成国际财富的汇聚区，而你则可以坐在洛杉矶的中南部结束你的买卖。这种事情正在越来越多地发生。所有这些会创造更为巨大的变化，而更重要的变化则是，投资的决策权掌握在私人手里。这并不是一条自然法则：私人企业系统，自然是由国家赞助的，公开地资助私人企业系统。就其本质来说，这在深层次上

是反民主的。这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基本决策已经超出了民众影响和控制的框架，而这并不是一条自然法则。

问：托马斯·杰斐逊，作为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无疑是美国民主精神的一个象征，对于那些感到后来的领导者离开了开国者的理想轨道的人来说，他是一位英雄。但是在你的书中，你引用了一些文件，说明杰斐逊派遣士兵踏平了切罗基族人的全部村庄。难道没有正面的例子可以引用吗？

答：我们不应该寻找英雄，我们只应该寻找好的观点。这两者总是被混在一起。杰斐逊对民主的态度一般来说是好的，他对宗教自由的态度则是非常好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却并不特别好，更不必说土著人口灭绝的问题。这些人也是人类，就像我们每个人是人类一样。如果我们能诚实地看透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发现一种奇妙的混合。